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一九四九－二〇〇四）

ZHONGHUA RENMINGONGHEGUO JIANSHI

金春明 著
Jin Chunming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1949—2004)

金 春 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金春明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0
ISBN 7-80136-511-9

Ⅰ.中… Ⅱ.金… Ⅲ.中国-现代史-1949～
Ⅳ.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949 号

书　　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04)

作　　者:金春明
责任编辑:李亚平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威远印刷厂
开　　本:大 32
字　　数:285 千字
印　　张:12.5
印　　数:3001-7000 册
版　　次: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36-511-9/K·441
定　　价:2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6,82517244

目　　录

第一章

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的金秋，在世界的东方，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1]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而这伟大转折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

中华民族的百年苦难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百年史，是一部中国从独立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亡国痛史，是一部中华民族被侵略、欺压、奴役的血淋淋的屈辱史，当然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革命史。

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优秀的民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不但在经济上、文化上，而且在科技上，处于

---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人类文化的高峰。可惜，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残酷统治和其他原因，而在近代落后了。当西方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依仗雄厚的商品经济为基础，而向全世界扩张时，老大的中华帝国仍固守着闭关自守的封建自然经济，做着“天朝物资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因此，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带领下，以船坚炮利的先进武器为手段，以鸦片的非法交易为先导，撞击神州大陆的国门时，昏庸腐败、内部危机重重的清朝统治者，先是妄自尊大，疏于防范，接着又惊慌失措，举棋不定，终于在兵临城下的压迫下，割地赔款，屈膝投降。

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都攻打过中国，强迫中国政府签定了数不清的各种不平等条约。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签定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赔款白银 2100 万两；开放广州、福州、上海、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取消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实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帝国主义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而且要求愈来愈苛刻，索赔愈来愈多。1900 年，英、美、日、俄、德、法、意、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签定的辛丑条约，共 12 款，外加 19 个附件，规定十分恶毒。如：清政府向各国赔款 4.5 亿两白银，年息 4 厘，分 39 年还清，本息共计 9.8 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 2000 多万两，合计白银 10 亿两，吸尽了中国人民的膏血；拆毁大沽口炮台及大沽口到北京沿线所有的炮台，沿线 12 个战略要地外国驻兵，但不准中国驻兵，这样就使中国的首都处于无防御的地位，而且北京的使馆区外国也有驻兵，使中国政府随时处于外国武力的威胁之下；清政府承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组织，违者处死，清政府官员如果不镇压人民的反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如此等等。这哪里还有一点

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味道呢！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多次英勇的反抗。从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二万多箱和三元里人民狠揍英国侵略军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其中包括席卷半个中国延续十五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资产阶级改良派拥戴光绪皇帝推行的百日维新，遍及北方各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皇朝的辛亥革命等等。正是中国人民的这种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反抗斗争都没有能取得胜利，都没有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因此，中国各族人民的最大的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谁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一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就拥护谁，这成为近代中国人心向背的一道准则。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那么，谁——哪一个阶级及其政党，能够担负起历史的重托，实现各族人民的最大、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呢？这只能经过历史实践去选择。

中国人民最先选择的政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其前身是同盟会）。它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它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曾经给了人民群众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因此，曾经一度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社会现实，却很快就使人民大失所望了。封建军阀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还不满

足，又当了83天皇帝。辫帅张勋复辟清帝的闹剧，南北军阀的割据与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帝国主义在一次大战结束后的加紧侵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议会的种种丑闻，如此等等，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及其倡导者国民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此种情形连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1918年写的《建国方略》自序中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益不聊生矣！”他甚至为此而感到绝望。他说：“惟自民国成立之日，则予之主张建设，反致半筹莫展，一败涂地。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去作新的追求。就在这样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西方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丑恶面目的再现①，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新世纪曙光，这两件大事都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民的选择。

1921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而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绝不是外国势力扶植的产物，而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中国社会中一种崭新的政治力量，它从诞生始，就以其正确的纲领路线和党员的模范行为，逐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聪明的孙中山看到这一点，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改组了国民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和会。中国政府派当时的外交部长陆徵祥率代表团参加。会前，美总统威尔逊发表14点主张，表示尊重各国的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提出公理、正义等口号，当时不少中国人曾抱有幻想，希望能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但结果完全失败。事实证明，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正是这个事实，直接激起了北京青年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

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倡议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北伐战争，打败了北洋军阀，给困顿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但是，1927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右派的首领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联合昨日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向自己的盟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举起屠刀，把中国投入十年内战的血海之中。同时，也把国民党逐渐变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残酷屠杀盘剥工农大众，对外卖国投降，充当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丑恶面目很快就暴露无遗了。有一本1934年出版的书，名叫《国民政府的政绩》，其中作了一些颇能发人深思的统计。例如：

国内公债，1927年至1934年共发行12.95亿元。南京政府7年比北京政府16年发行的公债总金额还多4倍。

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以1930年南京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例，军费占43.7%，偿还内外债占40.6%，政务费(包括外交、司法、教育、农矿、内务、建设等各方面)仅占4.92%。还有一些其他开支。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搜刮的人民血汗主要是干了两件事：一是用于打内战，二是用于孝敬帝国主义。

南京政府打内战是创历史纪录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以内战连绵而著名的。16年当中，与中央政府有关的内战共11次，每年平均不到一次。而南京政府当政6年中，却打12次，每年平均2次。除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性质有所不同之外，其余的内战都是蒋介石同他北伐时的战友们打的。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共有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分别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除蒋本人外，后边三位总司令都参加过“倒蒋”战争。参加过北伐的军长

共56人，后来参加过“倒蒋”的有45人，占80%。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战争，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拱手葬送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大片国土，陷三千多万同胞于殖民地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国民党政府却置全国各民族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于不顾，不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而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方针，屠刀向内，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

共产党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它没有因为同盟者的背叛和突然袭击而被吓倒，如毛泽东所说：“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 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创建了人民的军队，举行了武装反抗，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它战胜国民党的多次围剿，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西北建立了抗日基地，并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在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遍布神州大地的十多块抗日根据地。近一亿军民的解放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光明前途和希望之所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生气勃勃，战绩昭著，同国民党统治区连连败退，民不聊生，成为鲜明的对照。

新中国在炮火中诞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在战争与和平的十字路口。饱经多年战乱，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6页。

要求有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共产党代表人民意愿，真诚地要求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毛泽东为此而亲自赴重庆谈判，并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和平姿态。在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督促下，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与停战协定。这就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最后一次希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召开政协只是一场骗局。

依靠美国援助和支持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卖国独裁的统治，不惜背信弃义，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又一次把中国人民投入战争的火海。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率领广大人民，用人民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的进攻。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当时国民党政府有军队430万人，其中有22个美械师，又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并获得美国军事和财政的大量援助，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而人民解放军只有120多万人，其中正规军只有61万人，装备很差，没有外援，解放区人口只有1亿多。占有物质和数量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疯狂进攻。攻占中原解放区，攻占延安和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2、543页。

家口，从苏北打到山东，从山海关一直打到松花江边，一时嚣张已极。蒋介石宣布，三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国民党的这种强大不过是表面的和暂时的。人民解放军在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从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7 月的内战第一年里，共歼灭敌军 112 万人，初步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1947 年 7 至 9 月，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强大兵团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在此前后，其他战场的解放军，也相继转入进攻。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内战的第二年里，捷报频传，共歼敌 152 万人。除少数几个孤立大城市之外，解放了东北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使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这就为主力决战打下了基础。

1948 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三次大的战略决战。首战是辽沈战役，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开始，11 月 2 日结束，历时 63 天，共歼敌 47 万余人，解放了全东北。接着是淮海战役，从 1948 年 11 月 6 日开始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结束，历时 65 天，全歼国民党主力 56 个师，共 55 万余人。1948 年 12 月，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后，与华北解放军协同作战，开始了平津战役。天津、张家口等地守敌被歼，北平守敌 20 余万人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 52 万余人。三大战役合共歼敌 154 万人，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殆尽。

1949 年上半年在粉碎了蒋介石、李宗仁的“和平”攻势之后，4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达渡

过长江、向全国大进军的命令。东迄黄海，西至戈壁大沙漠，人民解放军自北而南，又自东向西，以秋风卷落叶之势，横扫残敌，追奔逐北，解放了大片国土。南京国民党政府落荒而逃，先迁广州，后迁台北。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炮声，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奠基礼。

隆重的开国盛典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开国盛典。这一天，新中国宣布诞生。

根据毛泽东卫士李银桥的回忆，当日大典是这样进行的：

毛泽东下午 2 时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会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会后，集体出发，在 3 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红旗飘卷，队伍静候。他的肩膀和胸膛微微起伏一下，于是，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便如隆隆春雷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话音才落，礼炮声惊天动地鸣响了。……按照预定程序，他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接着就是阅兵式。朱德下达阅兵令……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引导，四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由东向西缓缓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一阵一阵由主席台前的

白玉桥通过……震撼大地的雄壮步伐声在天地间回荡，人民空军也第一次展现了自己的雄姿。阅兵式进行3小时，直到黄昏。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成立的，表达了全国各民族和各阶层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1948年初夏发生的两件事，成为十分鲜明的对比。一件是国民党政府3月29日到5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所谓“行宪”的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讽刺和嘲笑。5月4日，上海学生就举行抗议游行，当众焚毁蒋介石像，作为“庆祝”，表明了中国人民要把这个所谓“行宪政府”及其制造者送入坟墓的强烈愿望。另一件事是，就在这个“行宪国大”闭幕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自己的时局主张。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迅速得到海内外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侨胞等纷纷发表声明和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随后，各方面的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等通过各种途径陆续到达解放区。1949年2月26日，在解放不久的北平举行了欢迎民主人士大会。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分别代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讲演。他们认为：“这一大会显示着全国各革命阶层的最广泛和最巩固的团结。”一致表示，愿意在“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而贡献其可能贡献的力量”。至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件成熟了。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

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重要的准备。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通过了《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他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常务委员会，下分6个小组，分别进行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共同纲领》，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方案，起草宣言，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等各项准备工作。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对正在筹备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她的对内对外方针作了阐述。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文章构成了以后通过的《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在经过这样充分准备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方面代表662人参加。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著名民主人士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为副主席。会议决定首都在北京，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会议于30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宣告："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中国的第一个宪章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立国之初就不能不研究和制定一个根本大法，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政治准则，规划发展方向。这个根本大法应该是由全国人民（或其代表）通过的宪法。但在建国之初，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但国家又不可一日无法。因此，当时就采取了一种变通办法。由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和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政治活动的依据。同时，也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份据以认识新中国的公开纲领。

这份重要文件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大宪章。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方面的基本纲领。

在政治方面：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保证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同时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在经济方面：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人民政府扶助合

作社经济，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在军事方面：建立统一的人民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部队。

在外交方面：总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以上规定说明：(1)中国当时是一个以国营经济为主导，而有多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关于中国的发展方向，虽然《共同纲领》中并没有写明，但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占支配地位，保证了新中国必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第二章

新政权出手不凡

新中国成立了，但是面对的却是一个烂摊子：连年战乱，满目疮痍，农业衰败，工厂停产，商店倒闭，经济破产，失学失业，民生困苦。人民对新政权的期望很高，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如何不辜负群众的期望，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迅速开创一个新局面，成为对新政权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解放全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许多方面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消灭各地残存的蒋军，尽快解放全中国。

经过三大战役和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消灭殆尽，蒋介石一伙也逃去台湾，但国土的近三分之二的地区，仍有待解放。特别是，当时在华南和西南，以白崇禧和胡宗南部的武装力量为主的国民党残部，仍在企图顽抗。因此，从 1949 年冬到 1950 年初，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湘粤、广西和西南三次比较大的战役，全歼了白、胡两部之主力。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其他部队纷纷宣布起义。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邓锡

侯、潘文华，西康的刘文辉等都在12月9日宣布起义，西南、华南各省获得解放。

新疆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国民党军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于9月25日通电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胜利进驻迪化（即乌鲁木齐）。

在不到半年的追歼战中，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共歼灭敌军170多万人，解放了包括18000万人口的5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5月1日全部解放海南岛。5月又解放了舟山群岛。西藏问题，经过多次谈判，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大陆的完全统一。这是维护领土主权的一大丰功伟绩。以战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历史阶段，已经基本结束。

制止通货膨胀

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长期的战争破坏，使整个中国大地千疮百孔，工农业生产破坏严重，物资极端贫乏，人民生活困苦，经济濒于崩溃。1949年与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农村破产，厂矿关闭，投机猖狂，市场混乱。特别是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大量发行纸币的掠夺政策，使物价疯狂上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十二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增加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用形象的比喻说，1937年抗日战争

爆发前，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5年抗战胜利就只能买两个鸡蛋，而到1947年就只能买一个煤球，1949年解放前，100元法币据计算可以买50万分之一两大米，也就是说甚么都买不到了。物价不仅天天涨，而且一天涨多次，经济一片大混乱。因此，全国人民最迫切要求的首先是稳定物价。很显然，不把物价稳定下来，扭转通货恶性膨胀的局面，不但不利于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安定人心并进行任何经济建设。

解放后物价仍不断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为了支援解放战争，而不得不增发的货币；有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留下的严重后遗症；也有部分资产阶级疯狂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因素等。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资产阶级先后掀起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风，影响恶劣。前两个因素是不能一下子消除的，而后一个因素却是可以马上解决的。因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开展了打击投机资本的活动。

一位当年参与这次打击投机活动的干部，回忆了查封投机资本的指挥部上海证券大楼的经过。这篇题为《魍魉末日》的回忆录说：有一群不拿枪的敌人盘踞在九层的证券大楼里，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暗地里操纵着市场，使上海才解放十来天，白银和黄金就暴涨三倍多，闹得物价摇摇直上，人民币的威信大受影响。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不胜利，新的人民政权就难以巩固，上海就谈不上繁荣经济。为此，上海市调集了一部分解放军与公安人员配合，作好充分准备。6月10日上午，以四个连的兵力，突然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奉军管会的命令，前来逮捕你们这些不法奸商。""手里捧着银元和金条的'黄牛'，望着公安人员，两腿直打哆嗦，正在打电话的'大肚皮'缓慢地转过那肥胖的脑袋，看到了手枪，话筒啪的

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穿西装戴鸭舌帽的‘银牛’拔腿想溜，一开门，看见门口站满了人民解放军，只得垂头丧气，老老实实地站在原来的地方。几分钟前还是神气十足，大搞投机破坏的不法奸商和投机分子，这时候，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瘪瘪地，哭丧着脸，站在那里。惟有无数的电话机仍在发疯似地响着，全市各个据点，还在等待着这个‘司令部’发出命令哩。”全楼400多个房间，共有300多个交易所经纪人和各种证券号、金号、银号、商行……有1000多部电话。在一些房间的保险柜里，不但堆满着金条、银元和美钞，而且还藏有反革命密件。共抓住2100多人，经过检查凡是混饭吃的小银元贩子，均予以教育释放，当场获释的共1800多人。“同志们各个精神饱满，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在经济战线上，打了一个重要的胜仗。”①

对付像上海证券大楼这样不法奸商的大本营可以采取行政手段武装查封，而对付分散在各地的投机资本家主要的是靠经济手段。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在四川也有同投机资本家作斗争的纪录。

“我们入城两三个月，在经济上碰到的困难的确很大，最主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操纵了银元市场、米粮市场和棉纱市场，甚么东西都跟着银元、米粮和棉纱涨价。……我们虽然明令禁止了银元黑市，抓了一些银元贩子，可是幕后的操纵分子却没有打击到。人民币继续贬值，米粮价和棉纱价几乎一天几个样，银元黑市猖獗，搞得人心惶惶。贺老总领导区党委开了不少的会，我也参加了。大家都明白，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东西太少，银元市场掌握不住。光靠

① 刘德胜：《魍魉末日》，《星火燎原》第10集，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01－402页。

行政上的打击是不够的;必须在市场上按价值规律同他们斗一斗,把投机倒把分子的势力打下去,才能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发展生产。于是我亲眼看见贺老总带领区党委在市场上和资产阶级斗了一回法。……贺老总命令一批军用卡车开到重庆,把重庆的大批棉纱暗地运到成都来。军用卡车上都作了伪装,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然后我们在市场上按他们哄抬起来的高价抛出去,棉纱大王们照例都吃进去了。他们想:你们的老底我们清楚,只要几天吃光了,我再抛出去,我爱涨多少就涨多少,他们把一件棉纱的价格从 400 至 500 万元(当时 10000 元后改为 1 元)哄抬到 1700 至 1800 万元。这时,我们在市场上继续大量抛售,棉纱大王不惜高价吃进,他们的资本都陷进去了。……我们便叫人民银行把银根抽得紧紧的,叫他们借不到凭以投机的人民币。他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搞来这么多棉纱,开始吃不住劲了,不得不停止吸收。这时,我们才开始降价抛售,1600、1500、1400,一直压价。他们慌了,不得不跟着往外抛。我们便以较低的价再买进来,接着继续压价,1200、1100、1000,一直压到 700 多,600 多,看趋势我们还要压价抛售。他们怕再降价,带来更大的损失,便惊慌失措地把存的棉纱,以 500 万元左右的低价抛出来。我们全部都收买了。这时银行逼他们还本付利,几头挤压,那些大王不得不宣布破产。我们把他们掌握的棉纱抓了过来,稳定了价格,其他跟着棉纱涨价的东西也涨不上去了。后来听说贺老总又下命令,仍然用军车悄悄地把棉纱运回重庆,再去和那里的大王们斗法。"①

这场全国性的经济战是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

① 马识途:《英名永留天地间——我所认识的贺龙同志》,《红旗飘飘》第 21 期,1981 年 1 月,第 83—84 页。

云指挥的。全国共筹备布210多万匹、棉纱41000多件、粮食6000多万斤，于1949年11月下旬开始抛售。这次全国统一的平稳物价行动共进行半个月，取得良好效果。由于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始终掌握着主动权，指挥艺术之巧妙，收效之迅速，连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也为之叹服。上海一位大资本家荣毅仁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①] 就这样，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双管齐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投机资本基本上被击败了，为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

全国财经大统一

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晴雨表，是病状而不是病根。因此，打垮投机资本对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来说，只是打了一个前哨战，后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他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而且越来越表现在经济上。""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加以统一使用。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决不应该把眼光放得很小，凌凌乱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在当时"落后贫困"的经济状况下，集中一切财力，统一使用到最急需的地方去，应该

① 转引自《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52页。

说是可能选择的最佳方案。

根据这次会议提出的意见，3月3日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统一规定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等的编制，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清查所有仓库存货，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全国各地所收公粮、所有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一切收入，除批准的地方税外，全部归中财委统一调度使用；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等等。《决定》还指出：不遵守、不实行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反党纪国法，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必要的制裁。

在政务院发出《决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专门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通知》。指出：过去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态，已经完全改变，全国在地域、交通及物资交流与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不作统一的管理和有计划的使用，则非但不利于国家的财政统一，且将严重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妨害国家的恢复与建设。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用一切办法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

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人民政府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公布了《关于出口货物统购统销的决定》，宣布对钨、锑、锡和大豆、猪鬃等物资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规定一切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的现金及票据，除准予保留规定的限额外，必须存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各公营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使用转账支票等。各地清查仓库的成绩很大，共清出各类机器20000多部，钢铁196000吨，电动机5800多部，汽车近8000辆等。另外，还发行了相当于43亿斤

粮食的折实公债。

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当时也是力争外援的。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这种外援只能从东方阵营争取。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去苏联访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于1950年2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由苏联提供年息1%的低利贷款3亿美元。虽然金额不算多，但在苏联本身急需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情况下，这种雪里送炭之举也是可贵的。

这样，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国家总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好转的趋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形势险恶的市场物价稳住，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加强财经治理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各省委书记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43人，共105人。这是建国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主题是经济问题。以经济问题作为党的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发言，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也发了言，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

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毛泽东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的情况是，战争已

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在广大新解放区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社会秩序也还没有完全安定等等，因此，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还不能说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根本好转了。

怎样才能使国民经济根本好转呢？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三年或者还要多一点的时间。为此，需要做好下列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于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必须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迁就主义倾向；(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号召：

“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这个报告得到了全会的一致赞同。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建国初期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和策略方针，把中共的工作重点从革命战争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方面来，对巩固革命成果，并有步骤地继续前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章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6月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闭幕。正当中国人民准备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好转而奋斗的时候，6月25日，却爆发了朝鲜战争。

重要的决策

朝鲜南北双方内战的爆发，既是国内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冷战发展的结果。

朝鲜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统一国家，1910年被日本吞并变成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苏军和美军占领。三八线本是为解除日军武装而划定的一条临时分界线，可是却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而变成两个世界冷战对峙的前沿，成为长期割裂一个统一民族的鸿沟。1948年8月，在美国操纵下，朝鲜南部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9月，朝鲜北部人民在平壤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宪法，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举金日成为政府首脑。南北双方变成了对

立的两个国家。李承晚和美国签订了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在美国支持下积极扩军备战，叫嚣要“北进”，企图武力统一全朝鲜，并多次进行军事挑衅。金日成也希望用革命战争统一半岛。双方矛盾日深，终于导致战争的爆发。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命令美军参战，支援南朝鲜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组织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这样战争的性质改变了，侵略矛头明显地指向中国。杜鲁门声明发表的第二天，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并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发表政府声明，抗议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宣布中国人民必将为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8月1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示威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邻邦朝鲜。从战争一开始，中国的态度就非常鲜明，随后又多次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并作了必要的准备。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解放了汉城，一直打到南部的大邱、釜山。但是，美军纠集各仆从国力量，大举反扑。他们集中300艘军舰，500架飞机和5万陆军，于9月15日从朝鲜西海岸中部的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使人民军遭受重大损失。接着美李军又向北推进，直逼中国边境。同时，他们多次派飞机侵犯中国领土，对我城市和村庄进行轰炸、扫射，杀伤中国同胞多人；还派军舰在公海上炮击中国商船，把战火烧向中国。

中朝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朝鲜遭到侵略，中国不能置之不理，何况美军的侵略矛头就是指向中国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公开叫嚣，鸭绿江不是国家边境，只不过是一条水。他们以为中国的长期内战刚刚结束，落后贫弱，不敢抵抗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头号国家。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

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提出中国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全面分析国内形势，经过周密的研究，决定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为了不给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以口实，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

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行动。宣言说："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要出兵打仗，战争就成了第一位的任务。这个突然来临的重大变化，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确定全部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把财政经济工作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战争第一；第二是应该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简称为"边打、边稳、边建"。这个方针得到了会议的通过和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边打、边稳、边建"实际上成为这几年全国各项工作安排的总方针。

连战告捷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说："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简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10月25日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

一个经历了长期战争破坏、经济落后的弱国，去同号称世界上最富强的头号国家打仗，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中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承晚的军队30多万，美军40万；海军舰艇数百艘，飞机1000多架，武器装备大大优于志愿军。美军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了胜仗，武器装备又好，十分骄横。志愿军虽然人数不少，但既无飞机，又无军舰，坦克、大炮很少，主要武器仍然是步枪、机枪和手榴弹。但是，由于进行的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士气高昂，英勇善战，又有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加上指挥英明、正确、果断，所以接连打了胜仗。

第一仗，抓住冒进到鸭绿江边的美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经过十二个昼夜的苦战，把美军驱逐到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大灭了美军的嚣张气焰。第二仗，历时一个月，歼灭对方36000多人，收复了平壤。第三仗，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然后主动停止追击，防止美军从侧后海岸登陆夹击。第四仗，在汉江两岸展开了惊天动地的阻击战。在大量歼美军之后，主动后撤。这一仗历时三

个月，歼灭敌军 78000 人。在连吃败仗之后，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当了承担惨败责任的替罪羊。美军上将李奇微继任总司令。第五仗，志愿军主动发起春季攻势，历时一个月，歼敌 4 万多，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这样，从 1950 年 10 月底到 1951 年 5 月，半年多的时间里五战五捷，共歼灭敌军 19 万多人(其中美军 8 万人)，把对方军队打回到三八线附近，改变了战争的形势，迫使美国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建议。

谈谈打打 直至胜利

1951 年 7 月，美国被迫坐在谈判桌边。但是，这次谈判并不是任何一方被打败的结果，而是双方力量暂时相对均衡、战场上呈胶着状态的结果。因此，美方的态度十分狂傲和蛮横。他们对停战谈判毫无诚意，企图用政治讹诈夺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这样就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局面。

毛泽东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接受了彭德怀等的建议，及时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将运动战转为阵地战。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粉碎了美军的多次大规模战役进攻，粉碎了美军依仗空中优势发动的交通绞杀战，也战胜了可耻的细菌战。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上甘岭那样空前残酷的大规模战斗。在志愿军只有两个连防守的不到 3.7 平方公里的山头阵地上，美军动用四个师的兵力，冲击 90 多次，投下了 190 万发炮弹和重磅炸弹，整个山头被削低二米，岩石被炸成一米多厚的粉末。可是，志愿军阵地屹立不动。以至美军称上甘岭为“伤心岭”。美军虽然使尽了各种手段，动用了各种先进武器，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但始终不能改变战场上的局面，不能前进一步。在这样

的情况下，1953 年 7 月 25 日，美国终于被迫在板门店的会议桌上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 109 万人，其中美军 39.7 万余人。美军的伤亡总数超过他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伤亡总人数，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伤亡的人数多一倍。中国人民志愿军击毁击伤敌机 12000 多架、海军舰艇 259 艘。美国动用 1/3 的陆军，1/5 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消耗 7300 万吨作战物资，花了 200 多亿美元，结果还是以惨败而告终。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投入兵力达 130 多万人，伤亡人员达 36 万余人，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中国人民也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支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粉碎了美国吞并全朝鲜，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野心，为中国争取了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其次，破除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暴露出它虚弱的本质；再次，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破除恐美、崇美、媚美的旧思想，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有不少人担心，打起仗来，国内的形势会不稳，各项社会改革难以进行，经济建设将无从谈起。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捷报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并转化为推动各项社会改革和加速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 四 章

经济迅速恢复的奇迹

现代中国饱经战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经历战乱的时间长，战争破坏广泛而又严重，恢复经济的步伐又比别的国家晚，但仅仅经过三年时间就基本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个别工业部门还有所超过。战争灾害重，恢复时间短，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不合理，是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根本障碍。所以，《共同纲领》上明确规定："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接着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土

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说明,阐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就从1950年秋冬开始,在3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中开展起来。

土地革命的基本目标和总的方针政策,同建国以前是一致的,都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分别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与40年代时期的土地改革相对比,又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有关法令,由派出的工作组领导土地改革。这就使这次土地改革进行得更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有效地避免了过去土改中曾经发生过的乱打乱杀,侵犯中农利益,破坏民族工商业等偏差和混乱现象。

(2)对富农由征收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转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策略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能够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缩小打击面;能够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保持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在经济上有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3)组织全国规模的强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不仅在城乡普遍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而且组织各方面的人士,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广大知识分子下乡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同时,把许多同封建土地剥削有联系的资本家,也吸收到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来。这样,既是一次最实际的反封建教育,又有效地扩大和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

到1952年,新解放区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整个中国大陆都如期完成了土地改革。新老解放区共有3亿多无地

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和大批生产资料，从此免去了每年缴纳给地主的3000万吨粮食的苛重地租和其他贡赋。

土地改革的完成，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这几年农业连年增产。1950年农业生产值384亿元，1951年420亿，增长9.3%。1952年484亿元又递增15.5%。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同时又为实现农业合作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根本性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一百多年中，以各种方式豢养了大批压迫敌视人民的买办或汉奸；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多年，又建立了庞大的军事、政治、党团、特务等各种反动组织，参加这些组织的大多数人残留下来。其中有些人改过自新、愿意接受改造、为人民服务；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顽固分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成了与新中国政权极为对立的分子。加上各种封建残余势力：恶霸、土匪、会道门、封建把头、帮会头子、流氓地痞等等，数量达数百万人之多。美国出兵侵朝后，这些人以为时机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了，于是又猖狂活动起来。广西1950年一年内有7000多名干部和群众被上述的反革命分子杀害，烧房25000多间，抢劫耕牛20多万头。其他各地也有不少破坏活动。甚至在首都北京，有几个美国特务竟准备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轰天安门检阅台，并已经画好地图，准备了迫击炮，可见气焰之嚣张。客观情况使人民政府不得不把镇压反革命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可是，有不少地方出现右的偏向。有些干部以为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剩下几个破坏分子没甚么了不起，产生太平麻痹思想，对破坏活动丧失警惕；有些干部错误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片面强调宽大，以致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镇压不力。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这种情况，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对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各地认真贯彻中央指示，迅速纠正了右倾偏向，很快在全国掀起一场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过大规模的宣传动员之后，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动或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到1953年5月全国共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150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50万人。加上群众管制等各种方式处理的，总共解决了约300万人的问题。经过两年多，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被基本上扑灭，消灭了大批特务、恶霸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虽然也产生过少数偏差，但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及时作了改正。从整体看，镇压是及时的、正确的、必要的，成绩很大。首先，是显著提高了中共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其次，由于清除了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党、政、群各级组织，减少了不安定因素，有力地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第三，由于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并领导少数民族群众打击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民族

团结。

“三反”、“五反”运动

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支持革命的，是革命的同盟军，建国后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国之初，长期的通货膨胀被制止，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在人民政府统筹兼顾的方针下，经过工商业的调整，私营工商业不但从停工歇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一些资本家损人利己，惟利是图的阶级本性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于是，产生了种种问题。例如一些资本家不遵守《共同纲领》，不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采取卑劣的手段，肆无忌惮地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罪恶活动。少数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甚至干出破坏抗美援朝的罪恶勾当。他们把一穿就断底的胶鞋，臭牛肉作成的罐头，腐烂棉花作成的急救包，以高价卖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致使志愿军指战员遭到不应有的伤残和牺牲。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慨。

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下，中国共产党内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被拉下水，甚至极少数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也堕落成腐化变质分子。曾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的张子善，就是这种恶劣的典型。他们都是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但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而堕落了。他们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的工

资，任意挥霍浪费，还把大批公款交给奸商倒买钢铁木材等，犯下了严重罪行。最后被开除党籍，判处极刑。他们当然是最恶劣、最严重的典型，但类似的问题，并不是极个别的。例如北京市检查某区消费合作社，发现132名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39人，占30%。沈阳市在工商局各专业公司系统发现有3600多人有程度不同的贪污腐化行为。这种情况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有变质灭亡的危险。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危险，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2月29日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群众，协助政府同犯罪行为作斗争。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和全体工作人员，"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5日和9日，周恩来又在政协全国常委会和中央、华北及京津两市干部大会上，就"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此后"三反"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并进入高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也在全国开展起来。

经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依法处理和思想组织建设三个阶段，到1952年6月，"三反"运动结束。全国约有900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参加了"三反"运动，有各种问题而受到组织处分和法律处分的

约占4.5%。对“五反”运动中揭发的问题，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的五项原则，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作了处理。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约占参加运动的私营工商业总户数的5%。

“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十分深远。第一，纯洁了干部队伍，清除了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和变质分子；第二，批判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思想，有力地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教育国家干部和广大人民提高了觉悟，产生移风易俗的重大影响；第三，加强了国营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群众的监督和部分参与管理，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有利条件；第四，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涨，为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了准备。

除了上述四次大的运动之外，还进行了以党员八项标准教育为中心的整党运动，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等等。总之，这几年的政治运动和各项改革涉及全国各民族、各行各业和各方面的人士，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虽然在大运动中错误和偏差总是难以避免的，但从总体上看，方针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成效之显著也是前所未有的。

著名的英国记者费里克斯·格林在30年前写下的一段访问新中国的观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中国大陆的状况，他说：“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57年，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在美国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假想和恐惧，我想我会看到一个极为贫困、极为肮脏和疾病丛生的国家，我以为那里的人民会因为警察国家的高压统治而怨声载道。……我的想象和我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不同，开始的时

候我曾感到迷惑不解，也感到焦躁不安。只要在中国呆几个小时，谁都会感到这里有一种简直可以摸得到的勃勃生气和强烈的乐观情绪。我在中国人民的身上看到欢乐和信心，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在我一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第一次访华那样使我深受感动。”“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我离开中国时得到的印象是，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①

经济恢复的成果

到 1952 年底，经过长期战争，满目创伤的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基本恢复，并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77.5%。钢产量，1949 年只有 15.8 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是 92.3 万吨，而到 1952 年已达到 134.9 万吨。煤，1949 年产量是 3000 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量是 6100 万吨，而 1952 年已达到 6300 万吨。棉纱，1949 年产量是 180 万件，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244 万件，而 1952 年已达到 361 万件。

交通运输事业迅猛发展，特别是铁路交通事业的恢复和铁路的新建，都进展得十分迅速。比如成渝铁路（成都到重庆），从清朝末年就开始筹建，路权之争曾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但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一公里铁路也未修起来。而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把这条长达 500 公里的铁路修通了。

主要农产品都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粮食产量达 3278 亿斤，比

---

① 《觉醒了的中国——美国人不了解的国家》，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 页。

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17%。棉花产量2607万担，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多53%。

教育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总人数，1952年比1949年增加一倍还多，其中大学生增长65.5%。全国各县普遍设立了医院、建立了文化馆，在农村、工矿设立了1100多个流动电影放映队。科研机构和人员也有较大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职工平均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60%以上，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比1949年增长97%。

数字可能显得枯燥，但它却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指标，说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迅速恢复。

第五章

经济建设的开端

当今世界上对计划经济是否有优越性这个问题，议论纷纷。但从五十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先发展急需的基本工业，却是可能采取的最适当的选择。

“一五计划”的准备和制定

为什么1953年能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呢?这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创造了必备的基本条件。

从国内看，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已经实现。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工商业作了合理调整。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快，城乡贸易日益繁荣。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已经好转。1952年全国财政总收入189.3亿元，总支出163.2亿元，收大于支，结余26亿元。经过整党和其他各项政治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更加严整，民众的建设国家的情绪高涨，社会秩序日趋安宁。这一切都说明，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国内条件，已经基本上具备了。

从国际上看，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战火已接近熄灭。中国的周边局势处于僵持的相对稳定状态。同时，中国争得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1953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定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到1959年为止，包括新中国建立以来已经帮助设计的50个企业在内，苏联共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141个（后增至156项）大中型项目，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厂、电站等，总值约30到35亿卢布。这就是说，中国虽然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禁运和封锁，但由于有苏联的援助和较安定的国际环境，国际条件是比较有利的。

制定一个全国性的长期发展计划，对中国来说，是毫无经验的。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曾谈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说："1950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莫斯科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以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好一点。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3000辆汽车，电力就需要24000千瓦，西安只有9000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要五六年以后才能搞起来。木材要20000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到东北。"陈云得出结论说："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所以，制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不花费较长的时间。

1951年，中财委组织力量着手五年计划编制的准备工作。陈云和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1953年初，把经过修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送苏联国家计委征求意见，他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1954年6月30日，陈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体轮廓就基本上确定下来。由于"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定》。同年7月，李富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获得了一致通过并正式公布。

五年计划编制了五年，到正式通过时已经实施了大部分。它一方面说明，学习和掌握一件新事物是多么不容易；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正在实践中逐步学习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

"一五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基本任务，概括说就是建立三个基础：一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限额以上是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而规定的一个分级管理的投资数量界限。当时的规定是：钢铁、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等工业，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工、水泥等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站、采煤、石油、机械、纺织等投资限额为500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医药等工业投资限额为400万元；陶瓷、食品和其他轻工

业投资限额为300万元。凡在限额以上的，都是国家直接投资的重大项目)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二是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三是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投资是766.4亿元，这个数字今天看来并不算多，但在当时却是非常了不起的，按当时币值，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

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98.3%，即平均每年增长14.7%。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按计划要求到1957年，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将得到一个相当惊人的增长。请看下表：

品名(单位)	1949年前最高年产量	1949年年产量	1957年计划产量	比1949年增长倍数
钢 (万吨)	92.3	15.8	412	26倍
发电量(亿度)	59.5	43	159	3.7倍
煤 (万吨)	6187.5	3098	11300	3.6倍
水 泥(万吨)	229	66	600	9倍
棉 布(万匹)	4500	3017	16372	5.4倍

农业生产及副业在五年内总产值将增长23.3%，即平均每年递增4.3%。其中粮食指标是1957年达到1.92亿吨，比1952年增长17.6%。棉花3270万担，比1952年增长25.4%。

五年计划中对社会主义改造进度的规定是：到1957年，私营工商业要基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其中私营工业产值将有一半要转变为公私合营。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将达到1/3左右。

五年内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将有相当的发展。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生要求达到43.4万人，比1953年增长127%。小学生要求达到6023万人，占全国学龄儿童的70%以上。科研事业要有较大的发展。仅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就要求增加23所，研究人员增加到3400人。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社会文化等事业，也要求有不同程度的比较快的发展。

五年计划对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了适当规定。五年计划增加就业人数420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33%，兴建住宅4600万平方米，国家支付劳保福利费、医疗费和其他福利费共50亿元以上。

如何认识“一五计划”

有人可能认为，虽然增长的速度惊人，但实际的产量并不高，比如钢产量也只有400多万吨，远远落后于英、美、日等国家。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李富春在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报告时，曾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全文抄录如下：“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一百年，我们工业发展的历史比他们落后了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我国在1870年才建设起第一个汉阳钢铁厂，当年的钢产量只有8500多吨。到1933年，全国钢产量也只有

25000吨。1936年全国钢产量超过40万吨，但其中36400吨是由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北产生的。我国历史上钢铁生产的最高年份是1943年，出产生铁180多万吨，钢90万吨，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日本侵占下的东北。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年，即1949年，全国生铁产量只有264000吨，钢产量只有158000吨。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承担起来，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哪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有人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帮助，速度快决定于100多个援助项目。这样说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不必讳言，苏联当时的援助是一个重大的有利因素，但是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速度的，并不仅是这一批工业。这一点，当时陈云在向中央作的报告里就讲得十分清楚。他说："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41个项目，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至六。141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起作用。包括141项在内，全部新建工业厂矿，五年内能投入生产的，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占百分之二十五，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1] 把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小部分的企业说成是对整个工业发展速度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22页。

前进中的一个曲折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得比较顺利。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完成较好。1955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对加速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宣传，使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加快，到1956年初，三大改造已接近完成。

但是，在捷报频传的大好局面下，1956年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这主要表现在：基本建设不断追加项目，扩大投资。基本建设项目，1956年上半年增加15.3%，投资总额比计划预定数增加40亿元。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矛盾：一是基建投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56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增长62%，而财政收入同期只增长5.7%，造成财政紧张。二是基建投资增长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造成供求关系紧张，出现基本建设所需各种物资供应不足，施工现场停工待料现象，影响工效。不仅基本建设要大上，其他各行各业也不甘落后，都要加快速度，结果造成齐头并进，互相挤撞，欲速则不达。当年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队伍增加过多过急，超过指标230万人；工资总额超过定额，比上年增加27亿元；财政信贷突破了原定预算。这样就造成"三个紧张"：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出现赤字；物资紧张，挖了国家库存约20亿元；市场供应紧张，动用商业库存约17亿元。这样就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去平衡，造成了一种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陈云等首先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及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意见。在1956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的向大会提出的经济工作报告中，既肯定了经济建设的成就，又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由周恩来提议，并经中央同意，《人民日报》在6月20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党内反对错误倾向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才能正确地前进。第二，克服急躁冒进倾向关键在领导。指出：“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第三，纠正急躁冒进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第四，克服急躁冒进情绪是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偏向；对党的“多快好省”方针，农业40条纲要等，要坚决地加以执行。

在发表社论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如压低了工农业生产指标，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170亿元压缩到140亿元），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等。

实践证明，1956年的反冒进是及时的必要的，是建国以来在经济方面纠正错误倾向、保证健康发展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可惜，这次成功的经验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和继承，反而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以致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这个教训是值得很好记取的。

“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提前完成的情况，将在下面分别叙述，这里只谈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巨大成就。

第一，五年内全国完成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达550亿元。其中对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492亿元，超过原定计划

的15.3%。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0000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原计划增加327个。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中，有138个已施工建设，其中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像飞机、汽车、重型机床、无缝钢管等有代表性的工业产品，中国都可以生产了。

第二，工业总产值1957年底比1952年增长128.3%，手工业总产值增长83%，均超过原计划的增长率。46种主要产品中，钢、煤等27种提前一年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原油、植物油、糖、卷烟等6种产品没有完成原定计划。

第三，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5%，超过了原计划指标。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产量均超过计划。五年内扩大耕地面积5800万亩，新增加灌溉面积21800万亩。

第四，全国交通运输事业也有巨大发展。铁路通车里数比1952年增加22%，共达1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比1952年增加1倍，达25万多公里。工程异常艰巨的高原动脉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皆相继通车。

第五，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零售额有巨大增长，比1952年增加71%。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提高34.2%，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30.5%，农民收入平均增长20%左右。科学、艺术、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改变了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是众所公认的，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了一个好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和某些已露出苗头的缺点很好地分析总结，以致后来走了很大的弯路。

第六章

人民代表大会与宪法

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暂代宪法，只能是特殊条件下采取的过渡性的办法。因此，建国后党和政府就积极从各方面创造条件。经过认真准备，1954 年 9 月，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正式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宪法。

准备工作的完成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宪法，有许多准备工作必须完成，包括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其他有关法律、法令的通过、宪法的起草和广泛征求意见等等。因此，从 1952 年就开始做准备工作。1952 年 12 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提议，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作为政协的建议提交中央人民政府。1953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第 20 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式启动。

为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两项准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

一是选民登记和选举代表，二是起草宪法。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22次会议，听取了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关于选举法草案的报告，并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了保证选民的合法权利，使所有公民都能依法参加选举，就必须首先作好选民登记工作。而选民登记，又必须以人口登记为依据。旧中国从来没有搞过全国性的准确的人口普查。清朝末年宣布的中国人口4亿是个大概的估计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宣布的全国人口47500万人，同样是个估计数。为了准备选民登记，也为了给有计划地经济建设提供准确的人口资料，政务院决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全国人口调查的计算标准时间，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调查结果是，中国大陆人口总数为601912371人。这是首次得到的准确的人口数字。全国选民总数为323809684人。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采取间接选举的办法，首先由选民选举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逐级选举出席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3年下半年，各地都开展了选民登记和选举工作。占登记选民总数85%以上的人，参加了投票选举。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5669144名。在基层选举的基础上，各地分别召开了县和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选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运动，也是中国

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与这项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宪法的起草工作。1953 年 1 月 13 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先由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提出草案初稿。1954 年 3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并决定在两个月内完成对初稿的讨论和修正。随即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 8000 多人，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经过改革后的宪法草案，由中央人民政府于 1954 年 6 月 14 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全国人民讨论了两个月，共有 1.5 亿多人参加。选民们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再度作了修改，并经中央人民政府第 34 次会议讨论通过，正式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全国人大

1954 年 9 月 15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说："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号召全国人民努力工作，虚心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

五年计划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他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坚定地宣布："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这次会议开了14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审议和通过宪法。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报告中，论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斗争的基本历史经验，简要地回顾中国制宪的历史，指出宪法草案就是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他还对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和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作了说明。大会经过讨论，于9月21日一致通过了这个宪法。随后又通过了有关的各项组织法。

9月23日开始第二阶段，审议和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建国五年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并根据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报告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和取得的巨大胜利。报告也提出了政府工作的缺点和改进办法。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9月27日开始第三阶段，进行选举。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并通过了国务院的组成人选。这次人事组成上的重大变化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不再担任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

副总理，而集中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28日大会结束。

宪法的主要内容

这部宪法，包括序言和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国家机构，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共一百零六条。

序言，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既指出它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特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又指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总任务就是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同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的重大不同点，也是中国社会前进的重大标志。宪法指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是：(1)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2)国内各民族的友爱互助和团结；(3)中国同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好团结。

第一章总纲，阐明了国家的性质和在各个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二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总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既承认存在着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又指明整个社会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逐步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前进。

第二章国家机构，内容较多，分为六节，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任务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是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权的惟一机关，它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大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整个国家机构的全套机器中，好比是个发动机。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推动和运用全套的国家机器来为人民服务。

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充分肯定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渴望并为之奋斗的各种自由权利，都给予了宪法的明文保障。宪法特别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宪法规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全体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忠实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并对任何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进行斗争。

这部宪法有什么特点呢?对此，毛泽东总结了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①

第一，这部宪法总结了历史经验，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以后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因此，中国的宪法优越于资产阶级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6页。

第二，这部宪法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性主要是两个：一是民主原则。中国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原则贯串于整个宪法之中。二是社会主义原则。中国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也是不能动摇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形式多样。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

第七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启动的，还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空前深刻而广泛的大变动，这就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提法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需要有个过渡时期。这想法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确定了。早已是大家的共识。但作为一条正式的总路线的形成和提出，却有一个过程。

在争取国民经济好转的任务接近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本着他

一贯坚持的不断革命思想，开始设想下一阶段的任务。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据刘少奇说，当时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1953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给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报告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内容做了比较完整的表述。随后，又在一些文件中对总路线的表述做了一些修改，使之不断完善。

为了组织全国人民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经过毛泽东两次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28日，批准并转发全党。本节开头所引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提法，就是在这个提纲中确定下来的。

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而具有法律效力。这样，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成为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准则，并为整个国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农业合作化大展开

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演变为商品化的大农经济，其经过的道路可以有两条：一条是剥夺广大农民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条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里，中国共产党就倡导把农民组织起来。建国前

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明确规定对农业实行合作化的根本方针。195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发给各地试行。1953 年以后，随着全国规模的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当时在党内普遍认为，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速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1953 年 10 月，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他认为"确保私有财产"，雇工、借贷等"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而不利于广大贫雇农的。他强调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规定：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工作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积极性的轨道上，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列举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十个优越性，要求各级党委更多地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前进。《决议》要求：在一五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 80 万个，参加农户数目，争取占总农户的 20%。从此，初级农业合作社从试办阶段进入大发展阶段。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粮食的产销情况，正式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稍后，又对油料和棉布实行了计划供应。特别是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结果使合作化运动来势很猛，发展迅速。到 1954 年底，全国已建立初级社 48 万个。由于有些地方工作

粗糙，部分农民怕财产归公，因而出现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中共中央在1955年1月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希望通过整顿使合作化运动能顺利开展。

不适当的“反右倾”

1955年4月，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致开幕词。他肯定了1954年农业合作化的成绩是主要的，同时认为合作化存在三个问题：(1)原定的发展60万个社的计划大了一点，原因是对主观力量估计过高，对群众觉悟估计过高，把办社看得太容易了。(2)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在土地评产，土地劳力分红比例，耕畜树木入社等问题上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3)有些工作没有走群众路线。这些问题都是“左”的错误。他认为今后总的方针，应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发展过大的要适当收缩。秋后如何发展，看情况再定。在这个精神指导下，个别地方如浙江省解散了不具备条件的近2万个农业合作社。这样的一些估计和做法，毛泽东是不同意的。于是就在党内引发了围绕着(1)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偏差，主要是“左”还是右；(2)合作化应该保持何等速度，是小发展还是大发展，这样两个问题的大争论。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从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步骤和深远意义，规定了“全面计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重申了自愿互利，逐步前进的原则，强调要注意合作社的质量，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报告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主要不是“左”的偏差，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说，有些同志像小脚女人，对合作化运动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

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看不到运动的主流，犯了右的错误。

接着，在10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邓子恢等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看不见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认为他们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毛泽东在中央全会上作结论时说，这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大辩论，是“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他说：“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是犯了“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这样，就把党内关于实际工作的正常意见分歧和争论，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些很显然是不恰当的。

不切实际地强调反右倾，错误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助长了本来在党内已经存在的贪多求快、急于抢先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这就导致大大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到1955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59.3%，加上参加高级社的4%，已超过60%。而到1956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87.8%，基本上实现高级化了。原定15年的任务，只用四年就完成了。

对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主要形式也是合作化。中国共有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1900多万人。原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后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手工业的合作化到1956年也基本上完成了。建立起10万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参加人数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1.7%。

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

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也被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提出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生产力发展程度较高。可是中国情况不同。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允许它再发展一个时期。50年代就把它消灭是太早了。作为事后的一种经验总结，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当时作出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

诚然，由于中国的经济落后，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当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1952年底，私人工商业中有380万职工，私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0%。因此，在建国后，在一段时间内还要尽可能地利用它们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加社会商品供应，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过。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就是说，资本家不愿按照国家计划去生产，而是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东钻西营。另一个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这是剥削者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企业设备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到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正是这样的客观情况，使得中共中央作出了加强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决策。

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无

代价的强制没收,一种是有代价的和平赎买。强制没收,表面上看是不花钱,似乎很合算,而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很大。所以,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方式的设想。革命导师曾经设想而没有能实现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计划,却在中国得到实现。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呢?

第一,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掌握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命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优势。这是能够实行赎买政策的客观基础。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革命时期就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到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具有接受改造和抗拒改造的两面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内因为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赎买政策才可能被接受,变成现实。

第三,中国共产党同各爱国民主党派,包括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商业联合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共产党的领导人同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建立了革命的友谊。这种友谊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信任感。这种政治关系,对于赎买政策的顺利实行,也是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样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赎买"的方针政策,一步一步地推动对资改造变成了现实。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明确规定。明确提出以改造为中心的方针,即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在1953年夏天,即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之后。

1953年9月,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业部分代表谈

话，着重讲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工商联在稍后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上，学习和贯彻了毛泽东的讲话，解决了工商界中存在的一些疑虑。

1954 年 7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下发。9 月，国务院第 223 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使如何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公私合营有了正式的法令依据。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兴起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5 年 10 月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邀请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要求工商业者认清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周恩来在会上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明了出路，推动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接着，中共中央统战部又邀请有关人员座谈，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对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定股定息，继续贯彻赎买等政策作了详细说明。全国工商联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人士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1956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 20 多万人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北京市的私营工商业代表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报喜，说他们已在 1 月 10 日第一个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在高潮的最前面》的社论。接着，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 1 月底，全国累计已有 118 个大中城市和 93 个县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实现了全行

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在全国私营工业88000多户中占99%；在私营商业240余万户中，占82%。

这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三个特点：

第一，不是用强制没收的方式，而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对资产阶级的工厂、机器、原料、商品和资金等，都经过公、私和职工三方共同进行的清产核资。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数为241864万元，其中工业方面17亿元。按国家规定的利率年息五厘，逐年发放股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停止。

第二，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对原私营工商业者，凡是有一技之长能够工作的，均给予适当安排，有些还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职务，并保留较高的工资。有了适当的工作安排，加上每年领取定息（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共有114万人，国家每年为定息付出的金额约12000万元），使资产阶级分子生活得到保障，可以安心地接受改造。

第三，在政治上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而且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安排适当的政府领导职务。如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等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章乃器担任粮食部部长，章伯钧担任交通部部长等。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坚持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立场，同时也体现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三大改造的作用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使中国大陆的生产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

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了绝对的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上被消灭了，农民的小生产私有制也基本上被改造了。这种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五亿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第一，农业合作化把汪洋大海式的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使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经济的成员，获得新的生产和生活体验。并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第二，使原有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个体农业生产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当时对于避免生产盲目性和支援全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

第三，可以发挥组织起来力量大的优越性，兴修过去个体农民难以完成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几年中，大陆的农业生产一直是增长的。1955 年农业获得丰收，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7.6%，1956 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5%。1957 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3.6%。这充分说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发展进程超过了原来的预计，但基本上仍是健康的。

在一场涉及数亿人口的彻底改变私有制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设想没有缺点和错误。例如要求过急，进度过快，工作粗糙，一刀切等等。但是，如果在 1957 年后能花费相当一段时间来加以整顿和巩固，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遗憾的是，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把整个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进程完全打乱了。

第 八 章

历史转变关头的中共八大

1956年9月，正是北京秋高气爽的黄金季节，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分析形势、在重要历史转变关头决定共和国向前发展方略的一次重要会议。到会代表共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社会主义国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地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都派了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参加大会。国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可以说是隆重热烈，盛况空前。

会 议 隆 重 举 行

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距十一年。这主要是由严酷的战争形势和建国初百废待兴、任务繁忙而紧张的客观因素造成的。虽然可以理解，但总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因而，八大的召开就有一种特殊的庄重感。

代表大会正式举行之前，先从8月30日到9月12日召开了十四天预备会议。9月13日，又召开了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通

过了应该提交代表大会的各项文件。9月15日到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大会由前届政治局全体委员主持，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他强调指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董必武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朱德、李富春、彭德怀、陈毅、蔡畅等60人，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了言；王恩茂等45人，作了书面发言。6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大会上致词，或宣读了贺电。其中有苏联共产党的米高扬，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乔治乌—德治，法国共产党的杜克洛，意大利共产党的斯科奇马罗，英国共产党的波立特，西班牙共产党的伊巴露丽等人。李济深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祝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了词。

大会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

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选出毛泽东等中央委员 97 人,杨献珍等候补中央委员 73 人。最后,由陈云致闭幕词。他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为大会服务的工作人员表示谢意。并宣布:“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

大会提出的五个重要观点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重大功绩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一次会议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从理论上提出和初步阐明了对历史转变关头的有重大意义的五个问题。主要是:

(一)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作了分析和论断。

《政治报告》和《决议》指出,七大以来的十一年中,中国经历了两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即一,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除在个别地区外,也已经消灭了。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为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中国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二)明确地指出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

八大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确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三)确定了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在报告中,全面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曾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的偏向,和1956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偏向,明确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四)在政治方面,规定了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逐步制定完整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的方针。

会议认为有效的方法,是加强人民群众和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领导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

(五)在执行党的建设方面初步总结了经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

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邓小平说：“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上述各项原则，现在看来也依然是正确的合理的。但可惜，不久之后就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而未能坚持下去。

八大路线未能坚持的原因

中共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没有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的原因很多。根本的原因是邓小平在中共后来召开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由于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准备。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胜利完成，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全党对迅速来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缺乏理论研究，缺乏经验，对客观规律认识很差。例如，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但是，没有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在中国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后，仍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因而后来一旦看到还有阶级斗争，就

容易估量过重。又如，正确地提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问题，但并未对问题存在程度作准确估量，也未能引起代表大会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些历史的局限性，加上由于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和其他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降低了全党执行八大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所以，当国内外形势出现某些重大变动，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又出现错误判断、擅自改变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时，全党就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1958 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路线作了重大改变，"左"倾思想占了上风，使以后的历史走了"之"字形的曲折道路。

第九章

偏离方向的开端

中共在八大以后二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与前七年稳定、团结、有秩序的情景成为鲜明的对照。两次大曲折起自何时，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肇始于1957年。

大变动关头的偏离

1957年为什么会成为关键的一年呢？概略地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条件就会得到启示。从国内来说，1957年，大陆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后的适应时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了，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必然要引起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引起人们政治上、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拥护这个大变动的。但是，千百年来在旧社会形成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的。适应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需要时间和过程。也有少数人，留恋旧社会，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一遇机会就企图兴风作浪。国内个别地方和单位，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其他原因，发生了少数罢工、罢课和

合作社社员闹事等现象。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去分析研究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国际上,当时也是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秘密报告而引起混乱。这个报告中对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的揭露,虽然对破除个人迷信、解脱思想束缚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秘密报告中对问题分析有片面性,对错误的严重性和发生原因判断不适当,处理不慎重,以致被反苏反共势力所利用,恶意煽动宣传,造成空前的信念动荡和政治冲击。1956 年夏秋,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对这两次事件的认识和评价有很大分歧,不是这里能详述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它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巨大损害。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克服创伤,从动乱中稳定了下来,开始了经济发展和繁荣时期。它们在美国带领下,实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赫鲁晓夫的错误,给了美国以口实。他们煽动起一场反共的世界性风潮。在欧美各国的共产党中,有一批党员退党。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出现巨大的混乱状态。这种严峻的形势,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警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八大路线的偏离,就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不成功的整党

客观的严峻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适当的对策。但是,对于上述国内外形势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及新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情况和党的新任务。根据历史经验,要完成客观任务,首先需要把党自身整顿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 1957 年进行一次整风运

动。

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中的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这次整风运动的基本要求和方针是：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了给这次整风提供指导方针，并使全党做好思想准备，党主席毛泽东亲自作了两次有重要意义的报告。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作了分析，明确提出摆在面前的矛盾有两类，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3 月，他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们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他号召全党和中国人民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这两个报告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明确指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总题目，

是一个重要贡献。但是，报告中对阶级斗争和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上，也存在一些“左”的观点，为以后“左”倾思潮的发展埋下了根苗。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际上，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指示。整风运动就在全党普遍展开了。整风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经过一年的时间，到1958年上半年，这次整风运动陆续结束。

与此同时，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9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在广大工人和农民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围绕着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清除资产阶级的影响，作了许多工作。

这次整风运动收到一定成效。但由于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了混淆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这次整风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反右派斗争及其消极后果

反右派斗争是从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过程中引发的。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有益的。当然，在所谓大鸣大放的过程中，确实也有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

义制度，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股右派势力代表人物，当时认为是以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位民主党派负责人为首的“章罗联盟”。

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席，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当时担任国务院交通部部长。整风运动开始后，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学生中对党不满的情绪很激动，党员中不满的情绪很大，工人、农民中也有问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他说：“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变成参议院后，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并提出，在共产党之外，另搞“政治设计院”。“你不行，我来。”

罗隆基曾任胡适派刊物《新月》杂志的总编。他曾承认自己过去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后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了副主席，当时担任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到处以“代表知识分子说话”的面目出现。他说：“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提出：“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等等。由于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实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报刊也奉命鼓励鸣放，刊登一些错误言论，这就在一时间造成一种相当紧张的气氛。

中共中央当时对这种局势估量很严重，于是在6月8日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言论。《人民日报》也在同日发表社论，号召对这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进行批判，对右派分子的进攻予以回击，以便肃清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就在全国展开一场数月之久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果导致全国有55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这次斗争对在全国人民中澄清一些带根本性的大是大非问题，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是,从整体上看,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和灾难性影响是主要的。

“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明确承认:“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为什么会如此呢?从思想认识上检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误以为在中国天空中出现了乌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如不反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第二,没有全面地总结波匈事件的教训,片面强调:“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而且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因而,有意识地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第三,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估计不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无产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不进行这场斗争,单有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是不巩固的。第四,不适当地采取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结果使许多人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打击,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失。

1957 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有关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在政治上,违反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妨碍了扩大民主生活,妨碍了生动活泼的政治

局面的形成;在组织上,背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助长了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倾向;在思想理论上,促进了"左"倾思潮的滋长。

特别是出现了三个重大的错误理论观点:一是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在1957年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的观点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赞同。为以后"左"倾思潮发展提供了依据。二是改变了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正确估计,不承认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把他们统统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中国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不幸,理论渊源皆出于此。三是提出了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而对这种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彻底的标准,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说明。这些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里附带说一下,对错划为右派的人,以后陆续有所改正。如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错划的右派改正过来。经过两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98%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后来又陆续改正了一些,未改正的所剩无几。给被错划的人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也都根据政策作了安排。这一拖延达二十余年的严重错误,终于得到了切实的改正。

第 十 章

急于求成的"大跃进"

1958年夏秋，在中国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而又议论纷纷的大事，一个叫"大跃进"，另一个叫人民公社化运动。二者都是在同一思想指导下出现的。这个指导思想就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统称"三面红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来是相伴而生、紧密相连的，但内容和特点又是不同的。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这里先讲"大跃进"。

"大 跃 进"的 提 出

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报刊文章中，最早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社论的观点，显然是依据毛泽东1955年12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序言》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已经加速完成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

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的扩大和加快。”社论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一个响亮的名词：“大跃进”。因之，很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他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这就是说，“大跃进”的口号从一开始提出，就是指的那种比按正常的程序进行的生产建设速度要快、而且要大大超过的那样一种高速度。

具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当时提出的奋斗目标是超英赶美。这个目标，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他 1957 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的时候说：中国在 1957 年真正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现在生产力还很低，争取十五年超过英国。苏联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改变。

随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他说：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应当争取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以后随着形势的推移和热情的增长，对完成这个目标的时间不断缩短，速度不断加快。到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已经在内部要求，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公开的提法改为：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以后赶超的时间又不断提前，最短的时间是两年赶上英国。从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角度来说，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在于，时间规定得太短了，速度要求得太快了，脱离了中国一穷二白经济落后的社会实际，成了难以完成的高指标。各行各业、各生产部门的种种高指标，都是由这个总的高指标派生而来的。

“大跃进”的高潮

“大跃进”的口号虽然在1957年冬已提出，也作了不少酝酿准备工作，但真正形成高潮是在1958年夏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正式通过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要求每个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农村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实现“全面大跃进”。在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各行各业各部门纷纷召开会议，提高指标，制定措施，发布口号，于是“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就在中国各地逐步展开。

1958年工业战线的“大跃进”是以钢铁工业为核心的。所谓“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中央冶金部根据各协作区会议上提出的钢铁工业发展的设想，1958年6月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1959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产量可以达到8000万吨、甚至9000万吨。毛泽东立即把这个报告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参考。经过反复商讨，最后由毛泽东下了决心，1958年钢产量要翻一番，即由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为107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当年上半年，全国只生产钢312万吨，7月份没有完成当月生产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原定的年产量710万吨的计划尚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现在突然把指标大大提高，要在剩下的四个月里生产出600多万吨钢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毛泽东亲自挂帅，任务不完成不行，只好求助于大搞群

众运动和各种土办法。于是，一声号令之下，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修小土炉，大砍树木，大找矿石，掀起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当时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不断放出“高产卫星”。例如据报载，1958 年 9 月 15 日，河南省的土高炉放了一颗日产“生铁”18694 吨的“大卫星”。为了放这颗“卫星”，全省动员了 360 多万人，开动了五万多座土高炉。

钢铁要大上，其他各行各业也要紧跟，于是，交通部提出：“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教育部门提出，要在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社社有中学，争取用十五年时间，基本上使全国有条件的青年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科研部门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改变中国科学技术面貌，争取五年完成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农业方面更是调门高昂，“卫星”不断。亩产万斤似乎已不在话下。据说“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在各种报刊上，也极力为“大跃进”找理论根据。在版面的显著地位刊登各种“放卫星”的消息，并发表评论，极力赞扬。当时的理论宣传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的按劳分配、工资制度、物质利益原则、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都误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认为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要考虑逐步废除。不少地区和行业先后废除了计件工资制，结果助长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个是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只要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科学技术的常规，生产就可以飞跃发展，产量就可以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甚至在权威性报刊上公然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实际上宣扬了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上述以大炼钢铁为中心，配合以一系列大办的“大跃进”，加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剧烈推行，很快在实践上产生了恶果。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主要经济比例出现严重失调现象。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结果这一年的积累率从上年的24.9%，提高到33.9%。职工人数急剧增加，从2450万人增加到4532万人，增加了近一倍。而同时，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除粮食有较大增长外，其他一些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的下降。这种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注意。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开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同时调低了1959年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这样就实际上结束了“大跃进”的第一个高潮。

“大跃进”的曲折发展

“大跃进”高潮只搞了几个月，就暴露了不少问题，不得不暂停。但既然已经形成为一种强烈而广泛的社会思潮，那么就很难一下子停止。因此，当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后，马上又迅猛的复发了。

1959年“继续跃进”的特点主要是：一、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反右倾”，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当时认为在经济战线上的主要危险，是一部分干部中滋长了一种畏难情绪，夸大困难，低估成绩，认为计划越低越好，不千方百计地去完成经过主观努力可以完成的任务。党中央号召“把这种歪风邪气打下去”。“把右倾反透，把干劲鼓足”。

二、基本建设战线大大拉长，积累率提到反常的高度。为了贯彻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在195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里，追加 230 个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这样一来，就不仅把八月份刚刚确定缩减基本建设项目的计划全部冲销了，而且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超过 1000 个。11 月下旬，又决定追加 13.6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使积累上升到 43.8%。基建战线突然拉长，各项准备工作跟不上，投资效果必然很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 69.2%，比 1958 年低 5.6%。

1959 年，国民收入从总额上看增加了 157 亿元，但大幅度增加的只是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13.6%，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当时市场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已经出现。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过一个通知，要求全国的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要动员所属的全体干部、官兵、职工及家属，不要到市场上去大量抢购各种物品。说明领导上已经觉察到物资供应的缺乏。但是，主要负责人却不顾这种实际情况，继续坚持“大跃进”。

1960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实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指导思想还是搞“大跃进”。但由于已经有了两年的经验教训，所以，采取了所谓“逐步高涨”的办法。避免了一哄而起，这是与前两年有所不同的。

3 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虽然总的增长速度比前两年有所减低，重工业支援农业的部分也有所加强，但整个看，指标仍然过高，建设规模仍然过大，整个计划仍然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年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是：钢 1840 万吨，比上年增长 38%；煤 42500 万吨，比上年增长 22%；轻工业总产值增长 22%。农业总产值增长 12%(其中粮食产量增长 10%)。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总投资比上年增长 22%。

主观上仍然想搞"大跃进",但当时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允许了。各方面的告急文书接踵而来。突出的是农副产品供应不足,先是油料供应不足。1959年5月,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停止了农村食用油的供应,城市居民食油定量也作了压缩。接着是棉布供应不足。1960年5月,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定量。特别突出的是粮食供应紧张。5月份,北京存量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大米已无库存,天天告急。中央虽然屡次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但各调出省本身粮食也很紧张,难以完成调出指标,加上当时粮食供应量不足,当时能够进口粮食的能力十分有限,各地只好纷纷压缩每个人的口粮定量。饭都难以吃饱,"大跃进"也就难以继续下去了。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几年来的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简要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公开提出搞慢腾腾,也就是实际上宣告了"大跃进"时期的结束。

"大跃进"析

"大跃进"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中国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亿万群众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投身于各种大办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仅仅用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去解释是难以服人的。它不可能没有其内部的深刻的原因。是否可以说,一方面,

它是广大群众在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急于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意愿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在急于要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但又缺乏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把过去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熟悉的成功的经验，转而用之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企图用革命冲击的方式把经济建设很快搞上去的一次尝试。

“大跃进”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企图用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但采取了错误的方针和方法，而遭到严重挫折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其中最深刻的一点是，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不能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大轰大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效果很差。虽然可能有一时的高速度，但一定会很快跌下来。例如 1958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32.2%，1959 年增长 19.5%，1960 年也增长 5.4%，似乎很快。但 1961 年就猛然下降 30.9%，1962 年又下降 10.1%。大起大落，平均起来反而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平均每年只递增 0.6%，是建国以来所有五年计划中增长率最低的，而且经济效益也是最差的。实践证明，这种猛烈增长，猛烈下降，大起大落的办法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是不可能获得国民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本来是希望创造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未能做到的高速度，创造一个举世震惊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新纪录，结果却创造了一个建国以来速度最低的纪录，而且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这也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吧。从本质上说，是由于主观愿望违反客观实际的盲动，而受到一次严重惩罚。

总之，三年“大跃进”在经济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成绩，比如说开辟了一些新工业基地，建立了新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积累了一

些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等，这些是不应否定的。但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讲，却是失大于得，是一次欲速反而慢的失败的实践。“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作法，都是不能肯定的。

第十一章

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

如果说，对“大跃进”经过三年实践就可以作出相应结论的话，那么，对于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更复杂得多的事物，要作出相应的结论，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法令，从1983年开始，已经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已经不再存在。但是，人民公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还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

人民公社的出现

实现农业集体化已经是一件重大事情。在遗留问题较多的情况下，本该大力抓合作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曾陆续发出有关指示。1957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继续贯彻“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同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发给各地贯彻执行。如果当时

能够按照这些决定和指示的精神，消除存在的弊病，努力巩固合作社，那么后来的情况可能是大不相同的，也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民公社。

可是，随着“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和发动，情况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58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作法，认为一反冒进，人民就泄气，这是政治问题。他还强调，以后永远不许反冒进。会后，毛泽东拟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并写了前言。这个前言说：“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因此，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问题，要求“苦战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这就使党内因接连胜利头脑发热而产生的急躁冒进情绪急剧膨胀起来。

1958年3月，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认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业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脱离实际的乐观估计的前提下，要求“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也就是在这个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肯定和推荐河北省徐水县“苦战三个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从一个工作很平常的县一跃而为先进县”的所谓“又快又好的典型”经验。于是，在一些农村中就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为贯彻总路线而在各地开展“插红旗、拔白旗”的斗争，这就使已经开始了的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大大加快。这些并起来的大社，名称并不一致，有的叫联社，有的叫集体

农庄，也有叫人民公社。

综上可见，人民公社的出现并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批判“反冒进”，提倡“不断革命”，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指导下，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脱离实际的乐观估计出发，从上边提出小社并大社，加上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和“拔白旗”斗争的推动才出现的。

公　社　化　高　潮

7月，报刊上开始报道一些农业社高产“卫星”的消息。如河南省西平县一个社亩产小麦7200斤，湖北省麻城县放了一颗早稻亩产36900斤的“卫星”，广西自治区环江县放了一颗中稻亩产13万斤的“卫星”等。农业部发布的1958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布比上年增长69%。《人民日报》为此而发表的社论说：在夏季大丰收面前，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所谓“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一时之间，农业生产已经过关，粮食已经足够的乐观声浪甚嚣尘上。由于相信了农业增产的虚假数字，一部分领导同志就误以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有规模和公有化程度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应该再提高一步。

7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办大公社的设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就为后来成立人民公社的性质和特点，定下了基调。

8月，毛泽东到外地农村视察。当时，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乡已挂出“人民公社”的牌子。毛泽东看见了很高兴，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后来到山东，当省委书记汇报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把毛泽东说的“人民公社好”这五个字，用大字刊登在报纸的显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提倡的是什么，就尽人皆知了。于是，已经并成的大社，都统一改名为人民公社了。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乐观地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有毛泽东倡导，中共中央又作了决议，各地自然踊跃响应。因此，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组成为26500多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各族农民共12690多万户，占农民总数的99.1%，平均每个公社7450多户，这样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公社的历史变迁

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偏向；在实际工作中又放弃了先试点、后推广的传统作法，急于求成，一

轰而起；加以报刊上不适当地介绍和推广某些错误的，甚至假造的所谓典型经验，就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开始就伴随着许多重大弊病。人民公社强调一大二公，几千户，上万户并为一个公社，实行统一核算。在各种“大办”中，国家无偿地占有公社的物资、土地和劳力。上行下效。结果是国家共了集体的产，公社共了队的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公社实行供给制，助长了平均主义。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这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有些地方还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组织军事化，就是以男女青年民兵为基干，包括全体社员，一律按照军队的办法，编成班、排、连、营、团。生产战斗化，就是由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突击积肥，突击除草或突击灭虫；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由县里统一调配劳动力，搞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就是按军事组织为单位集体吃住，实际上解散了家庭。现实是严峻的，上述的那一套违反客观规律、脱离实际的作法，当然是难以持久的，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恶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陆续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也及时采取某些改进措施。1958 年 12 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人民公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是“初升的太阳”，有“强大的生命力”等，在此基础上，批评了企图过早的否定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评了企图越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重申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宣布个人的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决议》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

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因此，轻率地宣布“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决议》还就人民公社的生产、交换、消费和积累；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人民公社必须关心人，全面地抓思想、抓生活，纠正见物不见人的偏向；人民公社的管理原则和管理制度和加强党的领导等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锋芒，主要是对着那些性急的人，是要纠正“左”的偏向的。因此，总的看，它对纠正“共产”风，制止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的混乱现象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建立人民公社本身就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而这又是《决议》所不能承认、不敢正视的。因此，《决议》的纠“左”只能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正某些错误的具体做法。它之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效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检验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否正确，关键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五年（1953 年到 1957 年），农业是连年增产，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三年（1959 年到 1961 年），农业连年减产，而且出现大幅度的急剧下降。1958 年丰产未丰收，农业总产值只比上年增长 2.4%。粮食、棉花比上年增产，而生猪头数下降 5.8%，大牲畜总头数降到 1952 年水平。1959 年就全面下降了，主要农产品全面地大幅度减产。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1960 年，农业继续大幅度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上年又下降 12.6%。粮食和棉花产量均降到了 1951 年的水平。结果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

非常困难。1961 年情况稍有缓和，但农业仍然减产，农业总产值比已经很低的上年又下降 2.4%。

严峻的现实，痛苦的教训，迫使人们不能不继续研究和探索人民公社的成败得失及其内部的规律。经过 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没有人敢再公开提出人民公社是否该办的问题，于是，只能在如何办好人民公社方面想办法。

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整党、整社等。

1961 年 1 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赴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又发现了不少问题。1961 年 3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广州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过死，民主制度和经济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较前有进步，但仍保留了实行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等规定。同年 6 月，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取消了有关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规定。9 月，又经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不再以大队为基础。随后又正式决定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并至少三十年不变。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农业六十条》经 196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农村人民公社的面貌就这样基本上确定下来，并一直保持到 1983 年。

按照《农业六十条》中的一系列规定所确立下来的人民公社，与 1958 年初建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有了根

本性的变化。即在保留人民公社的名义和某些具体制度的前提下，基本上恢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规格。政社仍然是合一的，但管理范围和权限已经大大缩小了。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的一套不再实行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取消了，社队的规模缩小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也不再提了……总之，是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更接近了一些，不过并没有真正落在实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研究和探索工作，后来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打断，一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继续和完成。

第十二章

纠“左”与反右的大变化

在前边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两章中，曾简单提到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由纠“左”而反右的变化。其实那个变化也是有一个颇为复杂的发展过程的。

毛泽东领导的纠“左”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到全国各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视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出现的问题和工作的偏差暴露得也较明显。因此，一些错误很快被中央领导人觉察到了，并做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工作。

1958年11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在“大跃进”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降温”、纠“左”的会议。毛泽东组织到会人员学习了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结合实际，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二是解决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把商品生产说成是

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县以上各级干部，好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在全党很多同志头脑很热的时候，毛泽东及时提出这些意见，是很重要的，对纠“左”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十天之后，中共中央又在武昌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进一步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把因热而过分膨胀的空气压缩一下，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不要相信假话。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全会作了准备。

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正式举行。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方面的成果，对促进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工作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决议》的内容在前一章已经作过介绍。虽然有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但是，贯彻中阻力很大，农村的紧张形势仍然难以缓和。各地农村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规模之大超过实行粮食统购前的1953年。这种情况迫使人们不能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1959年2月，在郑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探讨了对人民公社内部所有制的认识问题，并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确定进一步整顿人民公社。方针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

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二是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的职权范围作了比较具体的划分。

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会后不久，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批示。他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强调要重视和利用价值法则去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在对人民公社性质以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前进。

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全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计划指标作适当调整，以便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另一个是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份纪要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又有所前进。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批准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虽然较原来设想的指标作了较大削减，如钢产量不是3000万吨，而是1800万吨，但从后来的实践看，仍是相当高的。

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纠正收回自留地，禁止社员搞家庭副业的错误作法。接着，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规定要实行少扣多分，降低积累率，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实际收入高于上年。这些指示都在实际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

综上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于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是

认真的、努力的，也是收到一定成效的。但是，由于这一切都是在完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问题之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也是自然的。所以，当时虽然比较普遍承认要纠“左”，但对什么是“左”、如何纠正和纠正到什么程度，认识并不一致，庐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庐山会议的分歧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以后九个月的努力，已经逐步解决了。他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会议的前期虽然以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为前提，但真正客观地、冷静地总结经验的空气并不浓厚。有一些负责同志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也不能虚心听取别人对“大跃进”的比较切实的批评意见。只有很少与会者能从实际出发，较多地分析指出1958年错误的严重性和经验教训。会议原定15日结束。当讨论到准备作为会议下发的文件草稿时，认识不一致表现的比较明显。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况，担心会议匆忙结束不利于纠正错误，便于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彭德怀的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既肯定：“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又指出：“有些基本建设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曾有一

些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大炼钢铁，浪费了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但对全国地质作了初步普查，培养了技术人员和干部，也是"有失有得"。

彭德怀信的重点在第二部分，即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认为，从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检查，有不少深刻的教训。"1.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到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他特别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在信的结尾说：总结经验的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就是这样一封完全符合组织原则、观点也是正确的信，却在党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意见书"的标题印发给与会的全体同志讨论。在小组讨论中，意见分歧比较大，一些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中央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小组会发言中，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彭的信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是泼冷水，不符合实际，有埋怨泄气情绪。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要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上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他对彭德怀信中的一些观点，逐一作了批判。

毛泽东的讲话使会议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形成一边倒的趋势，集中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而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认为彭德怀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的同路人"，甚至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等等。

8月2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正式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全会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这样，就把所谓"反右倾"斗争，推向全党。

突然转向的原因和恶果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要继续纠"左"，这是会议前一段的主题。彭德怀写信发表意见，也是为了更好的纠正"左"的错误，为什么反而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而遭到批判呢？乍一看，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惑莫解的问题。但是，这种大变化却又

是事出有因的。

那么由纠“左”转向反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毛泽东的纠“左”和彭德怀的纠“左”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直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代表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路线，是不能怀疑和反对的。错误缺点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已经改正得差不多了。而彭德怀虽然也承认“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却认为领导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是有问题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是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很显然，他认为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是有错误的。而毛泽东认为，提出从指导思想上纠“左”，就是怀疑和反对“三面红旗”，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第二，毛泽东因为巨大的功绩而逐渐骄傲，听不得不同意见，更容不得刺耳的话。而彭德怀的信中有些话确实有点刺耳，毛泽东难以接受。这是造成由纠“左”突然变成反右的一个因素。

第三，由于对某种事实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解和误断。毛泽东在会上历数彭德怀在历史上的各种错误。不仅对事实本身不够实事求是，而这种翻历史旧账的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的作法，更助长了党内斗争中的“左”倾错误倾向，给少数别有用心之人落井下石以可乘之机。这种做法虽对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是不足取的，但对搞臭一个人倒是颇为有效的。

第四，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某些捕风捉影的迹象而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彭德怀在会前曾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在莫斯科见到赫鲁晓夫，谈过话。由于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在朝鲜打击美国侵略军建立功勋，因而到处受到

热烈欢迎，被称为“国际英雄”。可是这些对中国友好的表示，当时却造成误解，怀疑他的信和活动有国际背景，有阴谋。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随后在全党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是中共建国以后政治上的一次重大失误。这次突然转向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主要是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重大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者，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担任的领导职务，改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日常工作。从经济工作方面看，打断了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九个月纠“左”的进程，使急于求成的倾向进一步滋长，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成为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连年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毁合同，撤专家，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原因。

第十三章

国民经济第一次大调整

1960年本来要搞“开门红、月月红、红到底”，用实现“持续大跃进”局面迎接60年代的到来。可是，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虽然具有法律的权威，但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意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十分尖锐的物资供应失衡的客观矛盾面前，改弦更张，势在必行。

整顿的指导思想

当时全国面临几个突出的矛盾：首先是粮食紧张，收购计划无法实现，库存挖空，很多大城市几乎天天告急。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为了吃饭，各级领导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无办法，只好压低口粮标准，压缩工业用粮，饭馆和熟食品收粮票，并提倡“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勉强应付全国大饥荒的局面。其次，工业情况也并不好，原材料供应紧张，生产水平下降。第二季度，20种主要产品中有17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钢、钢材、原煤、棉纱、化肥等9种主要产品的平均日产水平都比第一季度下降。第三，经济状况不好，必然影响人民生活。虽然实行各

种票证实行定量供应，票证多达一百余种，但也难以保证供应。人民中间开始出现严重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社会秩序也发生不少问题。

内忧与外患往往是紧密相联的，当时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以中苏关系恶化为中心的急骤变化。1960 年 6 月底，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借罗党召开代表大会之机，而由赫鲁晓夫策划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 月中旬，苏联政府突然通知中国政府，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1390 名，一下子撕毁了 12 个国家协定、343 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257 个科技合作项目，使中国许多部门和 250 多个企业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去从事国际斗争，而不能专心致志地解决国内经济建设和其它问题。

总之，国内和国际发生的种种不利因素，迫使中国当局不能不重新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协调等问题。在同年 8 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提出，应当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并得到会议的赞同。会后，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 1961 年经济计划时，再一次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完整的八字方针。这就是这一次大调整的指导思想。

“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了，但从整个指导思想和工作安排看，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思想状态看，还是没有放下“继续大跃进”的架势，许多部门仍力求保住 1960 年计划的主要产品的高指标。中共中央

也决定要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力求保住“大跃进”的势头，并为此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直到12月初，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是，客观形势比人强。尽管从主观上作出最大的努力，高指标最后还是保不住了。1960年国家财政出现近20亿元的赤字。这一年粮食收购量下降34%，油料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由于生活严重困难，营养不足使人民体质普遍下降，疾病流行，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率继续增高。全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减少1000万。因此采取有力的措施，使调整的“八字方针”得到真正贯彻已经刻不容缓。

整 顿 的 开 端

使调整方针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的转折点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到会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0人，列席23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民经济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全会前后讲了几次话。他说：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些，过去是冷的不够，热的多了些。他指出：这些年来，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不作调查研究，没有基础，没有底，任凭感情和估计办事。他劝大家，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希望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今、明、后年搞几个慢腾腾，搞踏实些，然后再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央全会的指导思想。

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生产，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为此，必须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变革中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全会公报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八字方针”经全会正式通过并对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一些调整，又强调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及高级领导干部中，初步端正了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这就为以后调整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所以，这次全会标志着从“大跃进”的“左”倾冒进方针到实行全面调整的一次重要的转变。

1961年调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党内对形势的认识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工业本身的问题认识不足，调整不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直到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调整工作才取得更大成绩。在这次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对全国的形势和问题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深刻分析，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坚决贯彻“八字”方针，克服困难，争取形势全面好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动员组织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

全面调整的成果

贯彻“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在当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八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1960 年 9 月,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写了一个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要求大大精简各类企业现有的非生产人员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这报告得到批转。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以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为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副组长,开始进行精简职工的工作。到 1963 年 6 月底,全国共减少职工 1887 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共减少 2600 万人,完成了原定的计划。这件大事的完成,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大办粮食,大办农业。在三年困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1960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不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巨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三,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要发展生产,就得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建新厂,这种落后的外延的方法已成为计划经济之下的一种习惯。而基本建设急剧膨胀,又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的重要原因。因此,从 1961 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削减基建总投资。1961 年的基建总投资比上年减少 68%。1962 年又大量减少,只相当于 1960 年的 17.6%。这是“二五”计划期间,基本建

设投资总额的最低点。从1963年起，又逐年有所回升，逐步恢复到了比较合理的比例。

第四，缩短重工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钢铁的翻番开始的。钢铁的高指标降不下来，整个重工业战线就不能缩短，重工业孤军突出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状况也不能根本改变。所以必须首先坚决把钢铁指标压下来。1961年初确定的钢铁指标为1900万吨；到7月调整为850万吨，实际完成870万吨。1962年初确定钢750万吨，4月又降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

压缩钢铁指标涉及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小高炉问题，这就引起一场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争论。当时煤炭供应不足，全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公司的大高炉有一半被迫停产。是保几万个消耗大、产量少、质量低的小高炉，还是停一批小高炉，保证大高炉的生产？从经济效益上考虑，优劣十分明显。可是，当时有些人对政治效益的考虑，高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他们说，保不保小高炉是个路线问题，是对待“大跃进”的态度问题，他们主张宁停鞍钢大高炉，小高炉非保不可。后经中共中央作出实事求是决定，对小高炉实行关、停、并、转的方针，保了大高炉，停了大部分小高炉。

全国的工业企业1959年共有318000个，经济调整，减少到197000个，减少了38%。基本上改变了工业战线过长的状况。

第五，积极发展轻工业，优先发展了塑料、化纤、电子等急需的新兴工业。调整并不是一刀切，一律下马，而是有上有下，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更合理。因此，在整个基本建设战线大大压缩的情况下，急需的新兴工业还是加速上马的。这些工业的兴建和投产，对平衡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缓和市场紧张，保证商品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第六，加速了动力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1960 年 2 月，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开发。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石油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第七，整顿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货币发行权归中央。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都不许突破。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中央各部门重新收回了下放不适当的各种企业。财政部门提出了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措施等等。这些都对克服经济困难，保证国民经济的调整起了积极作用。

第八，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包括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坚决同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等。根据陈云的提议实行的以高价对高价，就是措施之一。从 1961 年 3 月开始，把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扩大供应到全国一切大中小城镇。这一年仅此一项就回笼货币 33 亿元，占当年消费品购买力的 5.9%，起了积极作用。

经过上述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收到了明显效果。到 1965 年，中国国民经济大体恢复并在某些部门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得到了调整。积累率下降到 27.1%。粮食产量 3890 亿斤，超过 1957 年的产量。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市场供应显著好转，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邓小平回忆和总结国民经济的第一次大调整时说：“那一次调

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在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了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这是对国民经济第一次大调整工作作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确实，如果没有党中央作出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正确决策，没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降低自己生活待遇的模范行动，没有全党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带动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困难的英勇奋斗，没有中华民族临危不惧、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果，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十四章

“左”倾思潮的加剧

在60年代初，同中国经济得到调整，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相伴的，还有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左”倾思潮。在这种表面上的背离后边，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反思中的严重分歧

1958年“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引起共产党内很多人的认真思索和对经验教训的探寻。实际上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认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当时在哪些问题上认识有分歧呢?根据目前接触到的材料，主要有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对1958年错误的性质和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有不同认识。一种看法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有一些缺点错误，主要是经验缺乏，属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和

苏联破坏，因此，总的说，是属于一个指头的问题。

另一种看法认为，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大跃进”的工作中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犯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从全国范围看，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大多数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外因素有影响，但不是主要的。

第二，对农村要不要坚持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有很大分歧。毛泽东一直是坚持实行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的。他认为，这是为农民谋福利，是解放妇女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新芽，因此，对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的意见，他是深恶痛绝的。有的地方领导干部从实际出发停办农村公共食堂，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撤职，甚至开除党籍。但是，在客观实际面前，毛泽东后来改变了态度。听取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许多人到农村调查后，一致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意见，修改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这两项的规定。

第三，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包产到户（或责任田、口粮田等）是农民群众为了克服暂时经济困难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好形式。当时只在安徽、河南等省少数地方试行。邓子恢下乡调查后，表示支持，回到北京后还到一些单位作过报告。可是，党内有些人不同意邓子恢的看法，告到毛泽东那里，以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被批判为刮“单干风”，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而且导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解散。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包产到户被认为就是单干，而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成为一种政治禁区。

第四，关于甄别平反问题。在经济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中共中

央也为1958年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一些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项工作毛泽东也是有限度同意的。结果在短短几月里，就为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少数人以外的，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错误批判的绝大多数人平反了。这种作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1962年6月，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实事求是地讲了个人的历史和问题，申明他在党内没有组织“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请求中央专案审查。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刮“翻案风”，不仅彭德怀再次受到批判，而且使甄别平反工作难以再进行下去。

第五，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为恢复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评价作了努力。他们再次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陈毅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说，要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可是，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评价。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并且认为在知识分子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右倾的错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等，也为此而受到批判。

与之紧密联系的，还有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一是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962年夏，接连发生新疆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地居民六万多人越境逃往苏联的事件和伊犁事件。二是从1961年起，美国日益加剧在越南南方的所谓“特种战争”，大批美军和美援进入越南南方，在中国的南大门外战火越烧越猛烈。三是印度利用中国暂时经济困难，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制造边境事件。同时，台湾蒋介石集团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并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大陆活动，妄图窜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陆社会上有些地富反坏分子妄图“变天”，蠢蠢欲动。贪污盗窃、投机倒

把分子也利用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进行犯罪活动。

这些情况表明，在暂时困难时期，围绕中国周边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有一定程度的激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关键时刻的误断

1962年秋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讨论和决定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通过了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形成上边这样的完整形态，并被称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正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这些基本观点的，则是党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上的多次讲话中，着重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要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就要"两极分化"，一边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是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贫困。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

长期存在的。他认为,这些基本道理被党内一些干部忽视了,淡漠了。所以,他要“重提阶级斗争”。这些讲话的核心思想是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这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强调阶级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所以从历史发展看,“基本路线”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的发展和集中概括,较之过去的提法和论述是一次很大的升级。这是对党内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量的结果,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的一次后果严重的失误。当然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一次集中表现。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基本路线”的通过,标志着“左”倾已经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居支配地位。但由于考虑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实际影响,毛泽东采纳了刘少奇等的意见,在会上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因此,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还能够按原计划继续进行。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方针,暂时还没有达到支配所有部门的程度。

基本路线在农村的实践

所谓“基本路线”的方针既然已经通过,就必然要在实际工作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首先按着这种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实践的是农村。先是湖南、河北等地开展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问题比较严重的干部,在县委书记、县长中占6.7%,公社党委书记一级占10%,基层干部比例更大。河北省保定地区创造了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的

"小四清"形式,查出了一些干部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毛泽东肯定了这种作法,并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加以推荐。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求各省委认真抓一下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确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为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中开展"五反"运动。会后,社教运动在中国各地农村陆续分期分批开展。

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组织机构多次调整,干部变动很大,农村社队的账目不清,经营管理混乱,少数干部浑水摸鱼,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群众意见很大。因此,采取适当的形式加以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方针指导下,一开始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农村中的各种问题,都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开展批判斗争,这样就不能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的错误,使理论的错误得到证实和加深,然后再反过来指导实践,使扩大化更严重。农村社教运动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子发展的。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小型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决定断言:"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前十条"中引用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表明毛泽东对当时全国情况的估量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个批语在全党

干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发动群众挖掘“阶级敌人”。

对情况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了，如认为全国农村基层有1/3的领导权不在党的手里，提出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认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要求凡是被敌人操纵和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等。

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对1964年下半年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但是，“二十三条”中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这些论点则比过去更“左”了。“走资派”作为革命主要对象的提出，直接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同时也表明，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和斗争矛头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

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农村和城市都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思想理论界不仅不可能例外，而且必然是一个重点。1963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个报告。报告说，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卫生、出版、体育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表现。中央批示则进一步提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指出：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暴力的形式，一种是和平演变的形式。明确提出要特别警惕潜移默化的和平演变

形式，并把知识分子同和平演变问题联系起来。那么，意识形态领域自然要首当其冲。

利用特殊身份得风气之先的毛泽东夫人江青，首先行动。她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1963年5月发表由他们组织人写的文章，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此后，报刊上对一系列电影、小说、戏剧，如《刘志丹》、《怒潮》、《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进行了批判。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少数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存在一些缺点，是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的。可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这些作品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被无限上纲，戴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被“一棍子打死”。

如果说，这些批判所涉及的还只是某一部具体作品的话，那么1963年底和1964年中，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所做的两个指示，则是涉及对整个文艺界的全面估计。他认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的这两个显然不符合建国后文艺界实际状况的批示，对文艺界简直如晴天霹雳，震动极大。中央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根据这两

个批示和中共中央的部署，都开始进行整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都遭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批判。文化部领导班子也进行了改组。

从1964年夏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经济学界批判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进行的这种批判，并不是平等的友好的讨论和争鸣，而是把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围攻。把被批判者当做阶级敌人，根本不给被批判的人以发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上是讨论和争鸣。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给人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帽子，作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只要某一观点受到批判，许多持相同学术观点的人们就要受到株连，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康生、江青等人，在这种错误批判的过程中，别有用心地推波助澜，起了恶劣的作用。意识形态领域里这种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制造了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禁锢思想，鼓励盲从。实际上进一步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对“文化大革命”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是为“文化大革命”从文化界开刀吹响了前奏曲。

第十五章

十年的得失

建国后的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成绩很大，众所公认。“文化大革命”十年，“左”倾错误占支配地位，造成很大灾难，也属共识。惟有中间这十年，正确与错误交织，认识和评价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单独加以评说。

工作中心在经济建设

这十年政治斗争峰峦迭起，群众运动接连不断，但从中共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来看，绝大部分时间还是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1957年搞了整党和反右派斗争，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但就其出发点来说，还是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在充满浪漫色彩的乐观构想，被严峻冷酷的现实打得粉碎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没有真正接受教训，反把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认识现实的一部分同志视为右倾，大加挞伐。一个短时间内，反右倾成为全党注意的中心。但是，反右倾的目的是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建

设。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执行，当然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有疑问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制定和通过了所谓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之后情况有根本性变化，阶级斗争的位置摆得越来越突出，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阶级斗争并没有成为全党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中心。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搞经济建设：“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总之，这十年可以说，中共八大提出的全党的工作重点要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变革生产关系，转移到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虽然由于受到种种干扰，而没有能够一贯地系统地得到实现，但是从全局上说，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脱离这个根本任务和根本方向，只是没有贯彻好。这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对中共八大路线的根本背离和否定，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

十 年 建 设 有 成 绩

十年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大马鞍形。1958 年是一个高峰，1959 年农业开始下降，但工业还在上升，到 1960 年一齐跌下来。1961 年达到最低点，1962 年开始恢复，以后又逐年上升，到 1965 年恢复和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为新的发展建立了较好的基础。

我们把 1966 年和 1956 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十年间整个国民经济是有很大发展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工农业总产值

增长 80.9%。其中，农业由于下降太大，恢复不很快，只增长 9.9%；工业发展很快，增长 139.8%。整个国民收入增长 70.8%。国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说明经济效益还有恢复到 50 年代初期的水平。人均年收入增长 50%。

工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总产值和主要产品数量的增长上，更重要的是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和产品品种的增加。原来没有或十分薄弱的一些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拖拉机制造业、精密机床工业、精密仪器仪表工业、原子能工业、石油设备制造工业、化学纤维工业等开始建立起来。特别是石油，从依靠进口到全部自给，是一个重大成就。主要工业产品的品种增加了 3200 多种，原材料的自给率大大提高。工业的布局也有了较大改善。全国国营工业固定资产总值按原值计算增长了 2.1 倍。农业的机器和化肥的使用量大大增加，1966 年比 1956 年增长 6 倍以上。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增长 4 倍，机耕地的面积增长 7 倍。农村用电量增长 70 倍。

十年中教育科学事业有很大发展。1966 年全国有高等院校 434 所，在校学生 534000 多人。在校学生人数比 1956 年增长 1/3。"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全国共培养大专毕业生 155 万人，中专毕业生近 300 万人，大多是在这十年中毕业的。这 455 万人，构成了中国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骨干力量。

科学技术发展显著，成果比较突出。新中国刚建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足 5 万，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还不到 500 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只有 30 多个。而到 1965 年底，全国专门科研机构达到 1714 个，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达到 12 万人。一系列现代科学的新分支，如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地球化学、射电天文、高能物理等，陆续展开了研究。一系列新兴工业技术，如核技术、喷气

技术、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等，从无到有地迅速发展起来，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和壮大。1964 年 10 月，中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集中地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而同年，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则使中国在这个学科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积 累 了 经 验

经过十年的实践，认识和积累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治国经验。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带头进行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一些很有远见卓识的论断。如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存在着矛盾，不过性质不同；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他还多次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要记住欲速则不达的教训。

刘少奇没有拘泥于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交换只存在于生活资料领域的设想，多次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观点。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和倡导建立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全日制学校和全日制劳动的制度，与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相辅而行。这种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还提出并试办托拉斯企业。

周恩来一直坚持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多次论述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

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等问题；并提出了发扬民主、改善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政策和措施。他还有创意地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认为中国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陈云提出了很多比较切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论断。如：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实事求是；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等。他强调，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的平衡等。在60年代初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国民经济调整中，陈云的这些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朱德、邓小平、邓子恢等也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观点和意见。

当时，还发动群众，组织动员相当一批力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陆续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条例，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商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工作条例草案》、《科学工作条例草案》、《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等。这些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的建设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对后来的工作起了相当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总之，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虽然在工作中有严重失误，经历过挫折，走了曲折的道路，但从全局上观察，这十年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

"左"倾思想不断发展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大国，又有着悠久而复杂

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向着新的社会形态发展必然要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中，这种无数个互相交错而又互相冲突的力量，影响历史发展的情况，更为明显而突出。

一方面，调整工作取得了成绩，很多人乐观地相信可以沿着正确的趋向继续发展下去。另方面，由于“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纠正，还有急剧的发展，终于压倒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改变了方向，把中国引向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关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再略为补充。

这一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大论战。1963 年 7 月，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 9 月开始一直到 1964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九篇大文章，抨击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苏共也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的文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也纷纷发表文章，大多站在苏共一边，指责中国共产党。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纷纷表态，使论战之火，扩延到全球。从而使这场所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扩及各个方面，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地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在反修防修的旗帜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潮在党内急剧发展，日趋严重。

1964 年 6 月，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国也可能出修正主义。因此，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文科中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所篡夺。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党争夺青年学生,使中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里简直把文科院校师生看成了使中国有和平演变可能的祸根。

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上作了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1965年1月,毛泽东对候补中央委员、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的蹲点报告作了批示,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论断恰与提出"走资派"同时,说明毛泽东已把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各级领导人,放到了革命对立面的地位。

上述各种不符合实际的论点的提出,说明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党内"左"倾思潮,已经发展得极为严重了。可是,196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信的批示中,竟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地解决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本来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了,可是还要反右,而且把所谓"右倾"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险去反对,结果只能使"左"倾思潮进一步恶性膨胀。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第十六章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

1966年5月，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一股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风暴，一时阴霾满天，狂风折栋，把一切正常秩序都全部打乱了。这场大风暴延续十年之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特异现象。

“文化大革命”起因略析

历史事件总是在事后经过人们的梳理，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而当事人反而往往感到突如其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总是有其形成条件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如下五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的系统化，并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特别是在其初级阶段，各种矛盾还处于十分复杂的状态。作为执政党如何认识

和对待这些矛盾，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为核心的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它的完整化、系统化，并在党内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虽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但它既然形成，并在共产党内占居统治地位之后，就必然要产生重大恶果。

在“左”的方针指导下的政治运动，必然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这种“左”的实践又似乎给了“左”倾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某种事实依据。这样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体系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逐渐完备了。

在这种“左”倾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国内和党内形势都作出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描画出一副可怕的情景：

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党手里；

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文化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

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根本性的误断，使毛泽东误认为党变质、国变色的弥天大祸，已经迫在眉睫了。这是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二）党内意见分歧，特别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间的不同看法，被误认为是修正主义，这是直接引发“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把自己晚年的错误论点和作法，误认为是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把对国内形势的上述一系列根本性误断，也都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把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党内正常意见分歧都认为是修正主义。他竟然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可见，这时他已经把有意见分歧的中央领导人看成了敌人。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搞工厂的斗争，农村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下决心发动一次所谓有亿万群众参加的自下而上的彻底揭露阴暗面的“文化大革命”。

（三）错误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难于防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

这里的关键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

当然，个人崇拜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不能简单地从个人的主观原因去解释。这里有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造成的深厚的历史影响，有小农思想传统形成的深广的社会基础，也与体制的缺欠有直接关系。制度上的高度集权和思想上的个人崇拜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助长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个人集权，终于在政治生活方面造成严重的后果。

（四）国际斗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在反修防修的神圣旗帜下，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把党内生活中的每个分歧意见都上升到反对修正主义的高度，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形成一种巨大的笼罩全党的精神阴影。

（五）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党的错误并推向极

端，极力鼓吹个人崇拜，趁机打击陷害一些好同志，制造文字狱和各种冤案，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

讲五点原因是为了条理分明，而在实际情况中，这些原因是错综结合在一起的。

奇特的导火线

一场政治大风暴竟以一篇批判一部历史剧的报刊文章为导火线，这本身就是60年代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种特异现象。这篇文章就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一戏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写的。而最早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的竟是毛泽东。他在1959年上海会议上，批评了党内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作风，讲了明朝忠臣海瑞的故事，说应当提倡海瑞精神。是他说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宣传海瑞敢讲真话、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找吴晗谈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约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先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6月的《人民日报》上。9月，又写了《论海瑞》。后来北京京剧团的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部海瑞戏。1960年底，剧本写出来了，取名《海瑞》。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植物学家蔡希陶认为剧本只写了海瑞一生中的一段，建议改名《海瑞罢官》，被吴晗接受。所以，吴晗写海瑞可以说是奉命之作，更没有突出“罢官”问题的想法。当时绝不会想到后来竟为此而引来杀身之祸。

可是，江青、康生等人却要抓住这个剧本大作文章。1962年，

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但被拒绝。以后，江青又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被找的人都不愿意承担。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跟彭德怀问题有关。毛泽东开始虽不同意，末了还是被“说服”了。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柯庆施指派张春桥、姚文元贯彻江青的意图。由姚文元执笔，写出这篇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别人都不知道。此文经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后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表现，是“一株毒草”。因此，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应，出现大量的不同意见。仅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就收到3000多件来信来稿，大多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驳。由于北京各报刊对姚文的背景毫不知晓，中央报刊也没有转载地方报刊文章的义务，所以在十多天内未予转载。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提出印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新华书店向各地征订时，北京书店又未订购，由此更加强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误断。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谈话。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浓重的政治色彩。

当时在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曾为保护吴晗作了努力。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讲：“据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

直接联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但是，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吴晗的目的，反而更引起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信任，下决心改组北京市委。包庇“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吴晗，也成为彭真的“反党罪行”之一。

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在社会科学领域开始所谓全面的“揭盖子”。全国性和地方的各种报刊上，充塞着对吴晗和其他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的批判文章。这场无限上纲的错误批判运动之火，在全国范围内越烧越猛烈了。

在发动意识形态领域大批判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党内高层开始变动人事安排，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组织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11月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办公厅主任职务，并对杨进行批判。12月又接受林彪的诬告，对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进行批判，并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两个对立的文件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不能不进行研讨，制定适当的对策。1966年2月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小组的扩大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参加），进行了讨论，并根据讨论意见，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左”的提法和词句，但主要目的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约束，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力求

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为政治批判。这个提纲向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并取得同意后，8 日，彭真又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时没有表示反对。12 日，这个汇报提纲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到全党，“望照此执行”。

与此同时，江青在毛泽东示意下去苏州与林彪密谈。在林彪支持下，2 月 2 日由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由陈伯达、张春桥参加修改，最后又送毛泽东审阅定稿。4 月 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这个《纪要》中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就是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林彪称赞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的批语说：《纪要》“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

两个中共中央文件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赞成和支持的显然是后一个。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不仅整个否定了文化艺术界在建国后的巨大成就，为从文化领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打开突破口制造了理论依据，而且搅乱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助长了“怀疑一切”的“左”倾思潮。所谓“黑线专政论”很快扩及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十七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制造了“事实”依据。给当时已经发展得十分

严重的政治批判运动火上加油。

从批判吴晗开始，株连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攻击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林彪在中共九大报告中曾这样说：“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的标志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这时已全国熊熊燃烧起来了，不过暂时主要还是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普遍燃烧起来，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作相应的政治的和组织的决定，就是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在北京召开了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共 76 人。毛泽东未到会，会议委托刘少奇主持。

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他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上通过了中央《通知》的草稿。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按照上述决定进行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以下事项：

(一)在 5 月 16 日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对《二月提

纲》作了错误的批判，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睡在我们身旁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二）对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行错误批判，决定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

（三）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以后请中央全会追认。

（四）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后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为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还有各中央局提出的郭影秋（华北局）、郑季翘（东北局）、杨植霖（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实际上他们并未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这个小组后来实际上成为凌驾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的“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即五一八讲话），遍引古今中外各

种政变的事例，大念政变经。他诬陷中共中央有人也要搞政变，制造恐怖气氛。同时，大肆宣扬天才论，制造个人迷信，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实际上为传达贯彻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定下了基调。

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文件作为纲领，又有了文化革命小组这个指挥机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在全国全面发动起来了。

第十七章

从全国动乱到全面夺权

毛泽东按照自己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使神州大陆很快地乱了起来。

大动乱的开端

在有了中央正式决议，又作了组织准备之后，就需要采取措施，把“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推向全社会，把文字的批判变成实际的行动。为此，毛泽东决定：

（一）5月30日，批准派出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夺权，同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陈伯达等人到人民日报社后，从6月1日开始，接连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多篇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公开捅向全国，为“天下大乱”制造舆论。

（二）6月1日，批准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批判他们实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发誓“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

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当《人民日报》刊载这张大字报时，王力、关锋、曹轶欧等又合伙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公然污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这种荒谬的论点，为后来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了依据。

（三）批准把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布，改组中国共产党的首都市的委员会，这样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

（四）《人民日报》发表北京新市委关于“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的决定。这是以党的权威宣布了对北京大学的共产党组织不再信任，公开夺去了他们的领导权。

在这些决定、社论和事件的号召影响下，各地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首先积极响应，纷纷起来造反，打破了正常的学校秩序。接着又冲向社会，打破了社会秩序和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全国性的大动乱就从这里开始了。

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从批判吴晗开始，虽然有那么多文章，许多同志也没有看，也不大去管。中间，5月16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

很多学校里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揪斗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所以纷纷向上级党委请求派新的领导干部和工作组去主持工作。

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据群众的请求，援引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

北京的大专院校和各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此后，许多省、市也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派出工作组这本来是党的传统工作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后来竟成为很大的罪名。

很多激进青年不满意工作组的领导和一些被认为限制他们“革命行动”的规定，因此，陆续发生各种矛盾和事件，其中以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影响为最大。6 月 18 日上午，工作组集中开会，一些人就乘机在校园设立所谓斗鬼台，四处抓人，乱打乱斗。北大工作组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

刘少奇在 6 月 20 日向全国批转了北大工作组的这份简报。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不少党委立即仿行，使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自然，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也就不如初期那样轰轰烈烈了。

7 月 16 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后，18 日回到北京。陈伯达、江青等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信了他们的话，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决定“统统驱逐之”。7 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毛泽东到会同群众见了面。

后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主要的就是指派工作组等问题。

“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

为了解决毛泽东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阻力问题，毛泽东回

到北京后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全会。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列席47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列席。聂元梓等亦以群众代表身份列席。

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共有四项，一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是讨论和批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是对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决定补行批准手续，四是通过全会的公报。

会议是在十分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多数与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知道该怎么搞。按照惯例派了工作组，又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加上会议一开始，又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两张宣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到会同志，这就更增加了会议的不正常气氛。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时，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与会人员也纷纷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等。这些发言中很少涉及党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也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应该如何进行作认真的讨论。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什么是“走资派”？文件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各级领

导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这样，就在实际上很难实现党的领导。《十六条》中吸收了与会同志的一些意见，作了一些预防性的政策规定。例如“必须严格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等。但这些规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

在原定全会结束的8月5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有些领导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的锋芒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这张大字报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就改变了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并导致延长会期。

在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批判之后，全会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全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新选的十一位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提升到第二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靠边站了。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批准了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一些人事变动的决定。但是，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并没有能够正常进行工作。

从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开展起来。

红卫兵和全国大串连

毛泽东在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同时，开始亲自出面发动“文化大革命”。7月29日，他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的人员。8月1日，他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表示支持的信。8月5日，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8月10日，他到中央的群众接待站会见首都的群众，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8月18日，他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检阅了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批准了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全国性大串连。红卫兵大串连的全部车费、宿费、饭费都由国家供给。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总计达1100万人次之多。这些行动说明，青年学生被毛泽东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些青年和红卫兵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他们又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狂热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真诚地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因而响应号召、挺身而出。他们高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等口号，奔走呼号，四处冲杀。他们自以为肩负保卫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历史重任，而到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他们在“破四旧”的旗号下，焚书、抄家、砸商店、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成为造成全国大动乱的急先锋。其中少数人还干了一些严

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破坏祖国文化遗产的坏事。

红卫兵到各地去鼓动造反，冲击当地的党政机关，兴师问罪总要有一个罪名，才显得名正言顺。这个罪名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3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路线错误习惯上是指党内重大原则的意见分歧，虽然可能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只是一种代表或代言人。而反动通常指反对革命，反对历史潮流的阶级或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则混淆了党内与党外，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言人与资产阶级本身等界限。因此单就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给这个荒唐的罪名作理论上论证的任务，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完成的。他在10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于是，他在所谓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上大作文章，从而得出：“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陈伯达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林彪在会议的讲话中，更明确说：“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

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建议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的借口下，取消了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这就是说，“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个红卫兵的口号，一句道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践内涵。有了这柄尚方宝剑就使造反狂潮不受任何限制的猛烈冲击，从国务院各部委到省、地、县、社、队各级党政组织和各级负责人，都普遍被批判、揪斗。这样一来，后果十分严重，各地普遍出现了社会大动乱，经济秩序大破坏，党政机关无人负责，难以运转的瘫痪、半瘫痪的局面。这就是“炮打司令部”直接造成的结果。

从上海刮起的夺权风

“文化大革命”像一只巨大的轮子，它既已被转动起来，当还没有另外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能够制止住它的时候，它必然要按照自己内在的逻辑朝前滚动下去，把大动乱一步一步地加深，推向一个新阶段。果然，这个新阶段很快就来临了。这就是以上海“一月风暴”为信号的全国普遍夺权。

1967年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了权。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又被夺权。这两份报纸的被夺权，是上海“一月风暴”的前奏。

全市性全面夺权的真正开始是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派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从这一天开始，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所有机

构被迫停止工作，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中。

1月14日，《文汇报》发表社论，题目叫《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社论说："许多单位内的革命造反派起来夺了权。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面临死亡的一个标志。"社论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革命就是要夺权。"并宣称："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把报纸和一切舆论工具的领导权，把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从那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过来。"这也就是当时习惯称的，"夺党政财文大权"。

1月26日，驻沪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全市大游行，并出动飞机撒传单，表示"决以枪杆子保卫左派夺权"。

2月5日，以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等为副主任的"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在毛泽东对名称提出不同意见后，2月23日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表明张春桥一伙已把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完全篡夺到了自己手中。这就是被当时的报刊称之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所谓上海"一月革命"。

夺权风吹向全国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历来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较大的影响。"一月风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直接参加的，特别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公开出面给以肯定和支持，影响就更加非同一般了。于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起而仿行。

1月12日，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所谓“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肯定了他们的夺权。并说：“山西省委的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下，于1月29日含冤去世。

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以原副市长王效禹为首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随后，他们又到济南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胜利的根本的保证》，给予肯定。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接管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的权，宣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说：“这个胜利，将引起连锁反应，使西南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1月31日，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召开誓师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掌握。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这是全国在省一级正式成立的第一个“革命委员会”。

……

就这样，一场以夺权为标志的大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夺权之路并不平坦。由于各种利害矛盾和派性冲突，各地革委会的建立十分艰难。上述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五省市，只是夺权的第一个高潮，夺权之后，革委会内部斗争仍十分激烈，有的仍有反复。这样，从上海夺权开始，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

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止，历经二十个月的时间，全国大陆省、市、自治区一级的革命委员会这种不正常的机构，才得以普遍建立，当时被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如果这时才“红”，那么 194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怎么说呢？

第十八章

人民群众的抗争

建设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场文化革命，这是列宁在世时就已经提出过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又把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并列为全党的重要任务。《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过社论。当然，1966 年实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同从列宁到中共八大讲的文化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当时广大党员干部要分清两者的区别并不容易，这需要时间和实践。而其中觉醒又有迟早之分。

人民反抗的先行者

从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开始，对于“左”的错误方针和方法的反抗斗争就一直存在，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高低起伏不同，但总观“文化大革命”十年，反抗斗争始终没有中断过。不少人为此挨批斗，受酷刑，坐监牢，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罗克、辽宁省的干部张志新(女)、福建农村公安特派员陈寿图等。

遇罗克的事迹是相当典型的。他是一个勤奋好学、长于思索的青年。在中学时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只是因为父母都被划为右派

而不能被大学录取,后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他就写了15000字的长文:《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商榷》。1966年春,他就坚决反对个人崇拜,认为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是"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他反对狂热的造反行动,认为:"热情是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针对当时流传极广的一副红卫兵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而撰写一篇长文章《出身论》。此文指出:"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这篇文章,开始油印散发,后又被某些小报刊载,广为流传,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以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不得不公开出面批驳。他被强制到"学习班"接受教育,但坚持自己的观点,拒不认错,终于在1968年初被捕。他作了思想准备写下了:"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的诗句。他同无理审讯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970年他被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终年27岁。

类似的观点鲜明、勇于斗争的人虽然不多,但决不只遇罗克一人。例如哈尔滨铁路局的图书管理员郭维彬(女),在1967年8月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提出四点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央文革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定时炸弹";刘少奇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她因而遭到围攻、毒打,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9年和1976年两次被呈报拟判处死刑。因黑龙江省司法机关复核案件人员的抵制,才幸免于难。又如,四川省德阳县公安局原秘书股长舒启慧,1969年8月给毛泽东写了长信,认为"文化大革命完全适

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有些中共中央文件，“不是马列主义文件”；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纯属造谣”；不赞成中共九大等等，因而被捕入狱。县人民法院判他死刑，省里有关负责人提出酌判缓期二年执行，生命得以保全。

陶铸等在中央文革的斗争

斗争不仅发生在基层，在群众之中。在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中央文革的顾问陶铸，1967 年初的被突然打倒，就是一个严重的表露。

陶铸，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代替彭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陈伯达之前，被称为“第四号”人物。据说，陶铸初到北京时，江青等人对他还是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系列分歧。如：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陶铸与江青、陈伯达态度不同，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没有按江青的授意揭发批判刘少奇；在发国庆十七周年新闻照片时，陶铸要求有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形象，结果新华社把照片上另一人的位置换上邓小平的头像，造成被江青等人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陶铸还支持周恩来保护一些老干部，为此作了很大努力，引起江青等的不满。陶铸与江青的直接冲突，发生在对待两个造反派头子的问题上。当时，教育部造反派头子卢正义和社会科学学部造反派头子吴传启，都是江青一伙支持的，而主管这两个部门的陶铸则因卢、吴二人历史上均有问题，而不予支持，并引起激烈争吵。

陶铸夫人曾志描述过这次争吵的经过：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

议上，“江青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也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吗？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大哭大闹起来”[①]。从此，陶铸和江青一伙完全闹翻。

1967 年 1 月 4 日下午，陶铸陪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代表。而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里接见所谓“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法，诬陷陶铸是王任重的后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背着中央文革独断专行”等等。于是，当晚“打倒陶铸”的大字标语，很快贴遍北京城，并迅速传遍全国。

毛泽东对陶铸的态度先后有变化。陶铸与江青等人在支持造反派问题上开始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曾批评过江青太任性。毛说：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随便在会议上批他犯方向路线错误，违反组织原则。但后来态度有了变化。1 月 8 日，毛泽东听了江青等的汇报后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这样就支持了江

① 曾志《往事如烟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第 3 集，华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19 页。

青。后来，江青等人又利用伪证，诬陷陶铸为叛徒，骗得了毛泽东的默许，陶铸就被迫害含冤而死了。

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斗争过的不止陶铸一人。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和其他不少成员，都因为不听命于江青，而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陆续被排除了。

陶铸被突然打倒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不仅因为事情本身的恶劣，而且因为此例一开，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可以由中央文革随意打倒，还有什么人不能打倒呢？后果不堪设想。加上其他原因，就在中央的高层会议上，引发了一场面对面的尖锐斗争。

著名的二月抗争

半年多的狂风暴雨，加上从上海“一月风暴”后开始的全面夺权，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人们逐渐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再也难以忍受了。于是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首先拍案而起，奋力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样，在 1967 年 2 月前后，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发生了一场公开的面对面的斗争。

1 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提出，要在军队中全面搞所谓大民主，遭到其他几位副主席的反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提出：“党的机关已经搞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你国防部长靠什么？”经过争论，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联。

不过，此后冲击军队、揪斗军队负责人的事件，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等，接连被揪斗、抄家。听到这种情况，老帅们十分愤怒。叶剑英在京西宾馆

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用拳头敲着桌子，警告说，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听由他们几个毁掉吗？"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经过老帅们的努力，终于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分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请去，一起对八条命令作了仔细研究。他认为八条很好，并提出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林彪也表示同意。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照发了军委八条命令，这个命令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的阴谋是一个严重打击。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局势下，发生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

这场斗争在二月中旬召开的怀仁堂碰头会议上达到了高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有党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三个根本性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2月11日的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新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就军队问题，对陈伯达一伙作了指责。老帅们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叶剑英就上海宣称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并成立所谓人民公社问题，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一伙被问得瞠目结舌。

2月16日的会议上，矛盾更激化了。这天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了会议。他们是因为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不同意，被

召来北京的。前此不久，周恩来鉴于各地揪斗党政领导人情况十分严重，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下达指示要把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可是，上海却把陈丕显扣住不让来京，所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一见到张春桥就问他："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严肃地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却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听了十分气愤："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就再次提出陈丕显等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等对残酷批斗老干部，搞"百丑图"等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谭震林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第二天，17日，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给林彪，表示对江青一伙倒行逆施已"忍无可忍"，他"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

倒是非，强加罪名，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16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在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信了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事。林彪把谭震林的信转送给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18日晚，毛泽东找这些老干部谈话，对他们作了严厉指责。并决定让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请假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强加以"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对这些老干部进行批判。江青一伙还通过他们的爪牙，在社会上到处张贴打倒、炮轰的大字报，宣传车到处广播，掀起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潮。这次抗争不仅未能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更多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批斗冲击，使已经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对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批判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从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书记处也不再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林彪、江青等人攫取了更大的权力，活动也更加嚣张。这对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1967年夏天的严重失控局势，发生了直接而严重的影响。

第十九章

共和国主席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中最骇人听闻，使人百思莫解的大事件，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曾亲自宣布过是他的接班人的刘少奇，突然变成了“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并被迫害致死。由此而株连到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仅因刘少奇冤案受到株连，在全国被判刑的案件就有26000多件，28000多人。受批判斗争的人数恐怕要十倍、百倍于此。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大冤案。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一直是比较亲密的。建国之后，尽管他们对一些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要不要反对急躁冒进问题等，但都及时得到了解决。

那么，什么时候两个人开始发生重大分歧呢？据毛泽东自己说是在1962年，决定“打倒”则是在1965年。这一点，毛泽东在1970

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黑书《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①] 斯诺在访问毛泽东后，在自己的书中评论说："毛主席把他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期定为1965年1月。"

造成分歧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关键是对待"三面红旗"（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客观地说，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时是赞成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是刘少奇，是他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对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两个决议，刘少奇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所谓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也是颇为积极的。但是在1961年刘少奇回到湖南家乡农村搞调查，亲眼看到"大跃进"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之后，他的认识有了改变。

1961年5月，刘少奇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同一些干部社员谈话时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②] 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更明确说："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恐怕不只是一个指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6册，第49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8页。

头的问题。”虽然他也说：这些缺点错误并不涉及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本身，“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1]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又说：困难形势出现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并且指出造成错误的原因有“经验不够”，也有“不少领导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这些观点，都涉及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很显然，刘少奇的这些看法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同意的。对于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克服经济困难采取的很多有力措施，毛泽东也是不满意的，认为右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并没有对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讲话提出不同意见。会后又积极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在运动的性质和对象的判断上，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当毛泽东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时，刘少奇插了话；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也表示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很不高兴。第二天，毛泽东讲话时大发脾气，说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劝他可不参加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打断了他的话)。

---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338页。

会后，有些人批评刘少奇对毛泽东不够尊重。刘少奇也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搞修正主义的政治原则问题，认为刘“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加上毛泽东不适当地总结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考虑重新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等种种原因，终于下决心把刘少奇打倒。这就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

打倒刘少奇的四个阶段

对刘少奇的攻击是从暗含着的批判开始的。这个阶段，可以从“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算起，一直到1966年7月下旬。虽然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已写了要警惕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之类的话，但由于《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会议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他还亲自出面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介绍说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所以当时很少有人联想到这句话是暗指刘少奇。

美国记者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说：“刘少奇似乎没有作出任何有计划的决心尝试，在全面的战斗中迎接毛的挑战，或者在八月以前，他甚至不完全知道自己是头号目标。”

第二阶段，内部批判。从7月下旬毛泽东批判工作组开始，特别是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的矛头指向刘少奇，已经表露得很明确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很多人指名道姓地揭发批判刘少奇，他本人也在这两次会议上作了检查。刘少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批判目标，对于他本人和党内一定范围的干部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了。但这时从毛泽东的态度看，还是作为内部问题，主要是从政治上打倒、搞臭，大体上像

中共七大时对待王明那样。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则竭力要把所谓刘少奇的问题搞到社会上去。1966年12月，张春桥就指使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蒯大富组织人上街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搞游行，就是一例。

第三阶段，在报刊上不点名的公开批判。打头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4月1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查同意的。从此，在全国报刊上以“中国赫鲁晓夫”的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大肆攻击污蔑。

当时批判的主要罪名是修正主义，主要内容是所谓“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降一灭”（对帝国主义降、对修正主义降、对反动派降，灭革命），“黑《修养》”（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第四阶段：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出党，彻底打倒。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一手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正式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样，就把刘少奇的大冤案暂时画了一个句号。

江青康生一伙的罪行

在对刘少奇的错误批判不断升级的过程中，特别是由党内到党外，由政治路线到叛徒内奸这种性质变化的过程中，江青、康生

一伙制造伪证、栽赃、陷害，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他们先是在1966年12月设立所谓王光美专案组，1967年4月，又正式成立刘少奇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下，处心积虑地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他们乱捕无辜，把稍有牵涉或可能从他们那里取得伪证的人纷纷"监护"起来，利用各种手段诱供逼供。

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和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重一就成了"证明"刘少奇和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江青竟亲笔批准专案组对张进行突击审讯。结果使张重一教授惨死在牢房里的病床上。

想把刘少奇打成美国"特务"的阴谋不能实现，就又从"叛徒"上作文章。刘少奇长期作白区工作，曾被敌人逮捕过，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不仅党组织有报告，当时的报纸上有登载，刘少奇自己也从不隐瞒。可是，江青、康生一伙却抓住这个问题，挖空心思大作文章。

王世英是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长期做白区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曾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江青为了胁迫这位老人说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对这位重病在身的老人实行"监护"，"加紧突击审讯"，王世英坚定地回答：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结果这位老人死于"监护"之下。

安子文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长期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他被诬陷为"叛徒"而被关押。在狱中，专案组曾几次对他威逼利诱，甚至以释放和家人团聚，中共九大时还可以当中央委员等为条件，

要他“立功”,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假材料,都遭到安子文的严词拒绝。

但是,也有的人经不起逼迫诱惑,而写了伪证。例如:丁觉群,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1927年曾同刘少奇在武汉有过工作关系。后来脱党,“文化大革命”前在湖南省参事室工作。他被专案组“监护”后,开始拒绝写伪证,后来在压力下,他说了违心话,作了伪证。但第二天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可是专案组奉命不准翻供。丁觉群的伪证,成为刘少奇当“内奸、工贼”的主要证明材料之一。

孟用潜,1929年是满洲省委委员,曾同刘少奇一起被奉天警察局拘留过。他同刘少奇一起经过斗争和多方努力被无罪取保释放。要证明刘是“叛徒”,不仅违反事实,而且要首先承认自己也是“叛徒”,这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后来专案组根据康生和江青的指示,从7月5日至13日连续进行审问,孟用潜受不住了,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写申诉翻案。先后写了二十份申述材料推翻假供,但一再受批判警告,不准翻供。所谓在满洲省委“叛变”的主要罪证,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相反,很多人写了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包括聂荣臻证明刘少奇1927年上庐山养病,组织上是知道的。这些材料都被隐瞒扣压了。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的错误处理刘少奇的报告,就是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用这样耸人听闻的卑鄙手段制造出来的。

彻底的昭雪

刘少奇含冤于1969年11月12日离开了人世。但与林彪、江青一伙要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狂叫相反，仅仅过去十年多一点，1980年2月，中共中央就正式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决议指出：“根本不存在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慰祭英灵，并昭告于天下。

第二十章

林彪事件

1971年"十一"过后不久，某地五七干校的军代表忽然把党员集中起来，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很多人听到后都感到惊愕莫明，甚至不敢相信。

事件的起因

林彪为什么要急于抢班夺权？这是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因为林彪是在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写入党章的"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又比他大十多岁，他就在那里安然地等着接班，岂不甚好！何必冒险去搞什么抢班夺权呢？

不错，林彪集团当时确实是已经窃取了党政军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中共九大上，林彪集团的一批骨干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林彪的老婆叶群，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进了中央政治局。还有

一批党羽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林彪集团权势发展的顶峰。但是他们总怕非分得来的东西会很快失去，怕夜长梦多。

当时，有两个问题特别引起林彪一伙的焦虑：一是，担心林彪的身体。林彪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多岁，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年纪最小的，但身体并不好。他抗战时肺部受伤，解放战争时又吐过血，建国后长期养病，担任国防部长后也经常不在北京，而是在大连、苏州、杭州等地疗养。而毛泽东在 1966 年 7 月，还能在长江上畅游一个多小时，行程 30 华里，身体是相当好的。这就产生一个尖锐的问题：接班人是法定的，但如果"接班人"的身体熬不到"接班"，那么被确定为"接班人"就毫无意义了。

二是，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趋势。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都各自图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在结盟的同时，又有尖锐的矛盾。从总体上说，中共九大前以互相勾结为主；中共九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羽毛已经丰满，同林彪一伙的争夺就日益加剧。林彪虽然是"副统帅"、"接班人"，名位很高，但并没有决定权。所以，林彪一伙就急于抢班夺权。

"文"较量受挫

林彪集团开始是企图利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把林彪抬上国家主席的宝座来逐步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49 年成立就是有国家主席的。前十年的国家主席是毛泽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正式提名，1959 年 4 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续选举刘少奇连任。可是,“文化大革命”风暴一起,宪法和法制荡然无存,刘少奇被打倒了,国家主席也就不存在了。中共九大开过后,毛泽东首先提出修改宪法、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这样,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就又成为一个全国关心的重要问题。

1970 年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虽然有一些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请毛泽东继续任此职,但是到会的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亲自出面了。4 月 11 日,他正式提出一个在宪法上规定设国家主席,并请毛泽东担任的建议。没料到,第二天毛泽东就写了一个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毛泽东虽然一再明确表态,但林彪一伙实在是野心难捺。叶群私下里对党羽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于是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在中共中央正式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大干一场。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庐山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三项议程是:(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可是,在开幕会上,林彪却突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大讲天才问题,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他不敢公开明确地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却拐弯抹角地说,宪法草案中“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是宪法的灵魂”等等。这篇表面上似在对宪法草案发表意见,而实则别有所图的讲话一发表,党羽们立即倾巢而出。

吴法宪首先开炮。他说:“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重要,但没有听

清楚”，建议全会重放林彪的录音，并组织讨论。这样，就打乱了原定的会议安排，为他们利用会议打击对手，抢班夺权创造了方便条件。

在分组会上，陈伯达抢先在华北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利用自己是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假装介绍情况，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反对在宪法上写毛泽东思想，既影射攻击张春桥等，又激发一些人的所谓“无产阶级感情”，挑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跟着他们一齐起哄。陈伯达指使华北组发简报，赞扬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并且“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还对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

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按照事先的密谋，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革命导师们“称天才”的语录。叶群还特别嘱咐几员大将，宣讲时要有感情，要含着眼泪说话。由一些当时身居中央政治局要位的人发表的这些讲话，加上暗地里的策划串连，党羽们的帮唱助战，和一些见风使舵分子的帮腔，就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制造了一场混乱和紧张的局面。

毛泽东听取了江青等的汇报，并很快识破了林彪一伙的诡计。8月25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意见》中没有点林彪的名，但揭发批判陈伯达这件事本身，也就沉重地打击了林彪集团，宣告了他们用和平方法抢班夺权阴谋

的失败。

策划武装政变

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一方面是毛泽东抓住不放，一查到底；另一方面，林彪一伙也不甘心失败。于是，矛盾就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展开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在党内分级传达了陈伯达反党的材料，开展了批陈整风。毛泽东多次作批示，严厉批评了叶群等人；并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打破了林彪集团包办军委办事组的局面。1970 年 12 月，按照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并改组了北京军区领导班子。当时曾把这次措施称作“挖墙脚”。就是说，认为北京军区是林彪集团的“墙角”。后来清查的结果证明并非如此。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公开说“四个伟大讨嫌”。所谓“四个伟大”就是林彪的题字，称颂毛泽东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风行全国的口号，尽人皆知。而毛泽东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1971 年 4 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被迫写了检查。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一伙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缴械投降，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另一种选择，就是破釜沉舟，采取极端手段，以求一逞。林彪一伙作了后一种选择。

1970 年 10 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中组成所谓“联合舰队”，作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骨干力量。1971 年 2 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写成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

为《"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用反动的观点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胡说形势对他们夺取政权十分有利。规定了"打着B52(一种当时最大的轰炸机，暗指毛泽东)的旗帜，打击B52的力量"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策划采取"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等)发动武装政变，以达到"夺取全国政权"或至少是制造"割据局面"的反革命目的。《纪要》还提出要学习日本法西斯海军的"江田岛精神"，要党羽们为林彪效忠卖命。

3月底到4月初，林立果秘密召集有南京、上海、杭州三地反革命集团骨干参加的会议，对如何具体实施政变计划，作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发动政变的"指挥班子"，并指定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为前线总指挥。他们还在一部分心腹、党羽中进行以"两保卫"(即"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统帅地位")为中心的所谓"路线教育"，为搞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

仓皇出逃自取灭亡

林彪在9月8日下达了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手令。为什么这时下令？可能主要是两件事促使的：一是，8月13日，周恩来和纪登奎、黄永胜、张春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并传达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的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林彪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猜测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到四届人大时林彪可能连副总理、国防部长也当不成了。

二是，毛泽东从8月中旬开始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一些省、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谈了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对中共九届二中

全会上林彪的活动，作了更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说，林彪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明确指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对毛泽东的出巡和讲话，林彪十分关注，千方百计打探消息。9月5日，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了毛泽东讲话的内容后，立即察觉到：(1)上纲更高了，(2)庐山上的问题没完，(3)点了林彪的名。他十分紧张，火急把毛泽东讲话内容告诉了黄永胜，并报告给了叶群。差不多同时，林立果也从广州的一个党羽那里获悉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林彪等人明白这时已经到了事关他们一生的荣华富贵、甚至身家性命的最后关头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连夜进行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之后，悍然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立即飞回北京，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和部署。他们准备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动手，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

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但他是一个具有异常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十分善于从哪怕是很微小的迹象发现事物的本质。8月31日，毛泽东到了南昌。在谈话中了解到林彪手下人的一些反常活动，引起他的警惕。9月3日，到杭州。通常毛泽东到杭州总是要多住一些日子的，可是这次不同。毛泽东10日下午突然下令开车。到达上海后，当晚就在列车上休息。11日上午接见了上海市委负责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下午一时，许世友等人回锦江饭

店吃饭，毛泽东就下令开车，全速北返。当王维国把毛泽东离开上海的消息用电话报告在北京的林立果时，火车专列早已远远地离开了危险区域。

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第一方案失败后，林立果等人立即开始实行第二方案。他们在北京调集五架飞机，准备13日早晨飞往广州，另立中央，搞“军阀割据”。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专机火急赶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汇报一切。可是，这第二方案，又由于发生两个情况而被完全打破了。第一件是，毛泽东的专列全速开进，全线绿灯，比正常列车运行时间大大提前，于12日午间到达丰台。在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谈话后，黄昏回到北京。第二件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向8341部队担任北戴河保卫工作的负责人报告，叶群、林立果有异常现象。导致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为什么要飞往山海关？并下令把飞机调回北京。林立果得到周宇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知道这个情况后，意识到如果256号专机被调走，他们就只能束手待毙了。

在这种情况下，9月12日晚11时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提着皮箱和文件包钻进红旗防弹汽车，不顾警卫部队的拦阻，立即开足马力，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向山海关机场奔去。13日0时23分，256号专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后来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架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方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毛泽东和周恩来机智稳妥地处理这一重大事件，有计划地逐级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有关文件，有领导地开展了批林整风；成立了中央专案组，对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审查和清理；撤销军委办事组，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

主持日常工作等。这样就保持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稳定。但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就因此而又推迟了。

第二十一章

“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

“九一三”事件在全党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引起普遍的反思，这就提供了一个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常进程的良好时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毛泽东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认为林彪事件证明了他讲的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运动的预见是正确的。因而中国又在内乱的错误道路上继续曲折地发展下去。

纠“左”的努力和转机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利用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力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作法，在保护老干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首先是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干部，调整了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几件事是：

（1）由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平

反。叶剑英受命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谭震林曾被诬陷为“叛徒”，连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都不准参加，这时也恢复了工作，并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2)毛泽东亲自参加了1972年1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并对陈毅家属表示了亲切慰问。周恩来致悼词，对陈毅的一生，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这件事在当时有良好的影响。

(3)《人民日报》在1972年4月发表经过周恩来审阅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4)毛泽东在1972年8月对邓小平的来信作了批示。批语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肯定邓小平的主要历史功绩。据此，1973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毛泽东在1972年底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夫人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并责成总理负责处理这件事。周恩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力进行保护老干部的工作。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采取有力措施，江青一伙不敢公开反对，因而收到较大成效。不到四个月时间，仅中央交办由北京市负责审理的一百多名高级干部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监狱的管理也有了一些改善。以后又分批释放了一批被无理关押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并逐步安排了工作。

在经济工作方面，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抓了两件事:一是起草了一份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文件。针对农村中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问题，重申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中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同时指出:不要把多种经营和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

来批判。

另一是由国家计委起草《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简称“经济工作十条”)。文件规定：要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各行其是；不许乱上基本建设项目；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纪律性，纠正不正之风等。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还特别强调了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可以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等。这份文件虽然最后未能正式通过下发，但由于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精神有所贯彻，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外交方面，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决策，取得了显著成绩。1971 年春，邀请美国等乒乓球队访华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的决策。“小球推动大球”，产生了积极的连锁反应。7 月，美国总统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 月，中国派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前景。同年 9 月，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达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协议，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长达 28 年的一件重大悬案。在 1971 年和 1972 年两年中，有三十六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外，高等学校的开始招生复课，虽然当时的招生改革实践证明并不成功，但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搞教改”，总是一大进步。这也是一件影响全社会的大事。

纠"左"与批右之争

对于"批林整风"运动,江青一伙采取了两面态度:一方面极力标榜自己同林彪集团进行过所谓坚决"斗争",把自己打扮成反对林彪的"英雄",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又怕运动深入会扯出他们同林彪一伙合干的种种坏事,危及自己,因而利用权势极力干扰破坏。同时,还极力制造事端,攻击诬蔑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使他的一些正确主张不能实施。

例如,周恩来针对当时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很不正常的情况,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72 年 7 月在接见外宾时,周总理对陪同接见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回去后,周培源即写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的意见,周总理批给有关人员,要求他们"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周培源并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应邀给《人民日报》写了文章,准备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可是,遭到姚文元的一再阻挠反对。最后,只好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10 月初这篇文章一发表,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指使上海报纸组织批判。上海报纸奉命之后,就盗用一些教师和学生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周培源文章进行不指名的"批判",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更严重的分歧发生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在 1972 年 10 月发表了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一期

《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要以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周恩来批示同意，但是，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和反对。张春桥说：“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分歧如此之大，最后只能请示毛泽东解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论点出发，对这问题作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这样就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江青一伙乘机大批所谓“右倾回潮”，把开始阶段进展较好，收到一定成效的“批林整风”运动拉向邪路，难以再进行下去。

“批 林 批 孔”

为了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健全因林彪事件而严重缺员的中央政治局等组织机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较党章规定提前一年，于1973年8月在北京举行。会前，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

在党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前此不久才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由一个并非

上届中央负责人的一般中央委员作这样重要的报告，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明显地表示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重用。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次大会虽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和严重罪行，但却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指导方针，使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得以继续下去。更为严重的是王洪文被提到了“接班人”的地位，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也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就使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得以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并窃取了更大的权力。

江青一伙急于寻找机会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篡夺党政大权。他们在林彪家中找到了一些摘录的孔子和儒家著述的语录、条幅和卡片；于是，江青让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把这些东西整理为一份资料，取名为《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了毛泽东，并建议开展一个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这投合了毛泽东的想法。因为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也一直在探索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思想根源。1973 年 7 月，他就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林彪是“尊孔反法”的。8 月，他又批示让《人民日报》发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江青送来的材料，恰好被认为是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因此，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建议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林彪与孔孟之道》被作为 1974 年的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党。于是，江青一伙就大肆活动起来。

1974 年 1 月 24 日，即农历正月初二，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突然把在北京的军委直属机关和在京部队单位的干部集中起来，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正月初三，又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干部集合到首都体育馆开了

动员大会。会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8341部队参加北大、清华军宣队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成了主讲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演双簧。江青不时插话，指手画脚，点这个，批那个，趾高气扬。而周恩来却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还有一名中联部的小投机分子上台揭发中联部负责人不重视批孔。整个会场气氛异常，令人莫名其妙。

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和机关单位写信，派人送“批林批孔”材料，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出动，刮风助战。在报刊上一时充塞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炮制的各种反动文章。这些文章歪曲历史，篡改史实，用影射攻击的卑劣手法，不批林、不批孔，却大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他们的帮派分子到处揪斗刚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搞串连，拉山头，进行篡权活动。在江青等人的一手策划导演下，出现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如辽宁一名考生高考交白卷而被称为“反潮流英雄”的白卷事件；一位农村女中学生因不会英语受批评而自杀的个别问题，被抓为“教育回潮”的典型的河南马振扶中学事件；因接受外国公司送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而被骂为“卖国主义”的七机部蜗牛事件；因剧名“三上桃峰”而被诬为“王光美翻案”的山西晋剧事件等等。使经过周恩来等极大努力而刚刚趋向好转的全国局势，又重新逆转，陷入新的动乱之中。

“四人帮”组阁受挫

江青一伙又是写信、送材料，又是到处讲话，制造各种事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倒国务院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其他领

导人，企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由他们组阁，执掌党政大权。他们指使“梁效”写作班子，以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鼓吹“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同时大捧吕后、武则天等历史上的“女皇”，为捧江青上台作现代的“女皇”大造舆论。

周恩来在1972年已经发现患癌症，但他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带病坚持工作。1974年6月，不得不住进医院。在难以设想的困难条件下，仍尽力工作不息。管理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繁重的工作，显然不是一个重病在身的老人所能负担得了的。正在筹备召开的四届人大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江青一伙本以为这是他们登台组阁的良机，可是没料到，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眼看就要到手的组阁将成为泡影，使江青一伙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经过密谋策划之后，他们在10月17日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搞突然袭击，逼迫邓小平对所谓“风庆轮事件”表态。一艘国产万吨轮从欧洲远航归来本是件好事，江青一伙却要诬陷交通部阻碍远航，“崇洋媚外”，要批“卖国主义”、“洋奴思想”。在遭到邓小平的坚决抵制之后，他们就结伙大闹政治局，想闹得邓小平不能工作，但目的并没有达到。会后，江、张、姚、王四人连夜紧急策划，决定由王洪文紧急飞往长沙毛泽东处，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

王洪文当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他向主席报告工作应该说是合理合法的事。可是，正如王洪文自己供认的，他不是代表中央政治局，而是以“四人帮”特使的身份，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偷偷来的”。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他诬蔑周恩来有野心。“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

志”。他还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江青如何好等，实际上是要把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务院大批负责人，统统打成要搞政变的“反革命”，统统搞掉，以便由他们去组阁。但是，毛泽东当面批评了王洪文。

毛泽东为什么不批准江青等人组阁呢？因为他虽然信任重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认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自己是一致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批刘少奇和林彪也是有功的；但对他们的言行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感觉对他们难以托付党国大任。例如，他批评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的搞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评江青“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毛泽东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搞“小宗派”，让江青注意。并明确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等。王洪文长沙告状后，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12 月下旬，当听到唐闻生、王海容转达江青的意见，让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和董必武之后时，毛泽东尖锐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四人帮”这一系列活动，不仅没有达到夺权“组阁”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促使毛泽东下了决断。12 月 23 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及王洪文谈话时，明确表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比王洪文强。江青有野心，我比你们了解她。毛泽东并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委托周恩来筹组新一届政府的工作。这样，江青一伙企图利用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打击周恩来等，由他们组阁的阴谋，就遭到了失败。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与全面整顿

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戏剧性巨大变化的一年。年初，邓小平连获党政军重要职务的任命，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是，仅仅经过十个月的时间，他又被扣上“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再次被打倒。这样的大升大降，在国际政治史和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有的外国记者因此而称邓小平是“不死鸟”。其实这并不是邓小平个人的升降问题，而是中国局势巨大动荡的标志。

邓小平复出主政

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布命令，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也被同时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7日，邓小平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随后，中央又决定，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务。这样短的时间里，一个人连获党政军的多项重要职务是罕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当时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从建国以来一直是政府总理，工作辛劳，才能卓越，受到国内外的敬佩。但是，当时他已患不治之症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从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到病逝，一年半的时间里动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 40 天就要动一次手术。无情的客观规律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找出一个人来代替他。

第二，毛泽东先后物色过几个人，但都不顶用。林彪就不去说了。“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是王洪文，曾认为他当过兵、种过地、做过工，兼工农兵于一身，又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而加以赏识。中共九大时，王洪文就被提名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72 年被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中共十大，安排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并使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随后，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是寄予厚望的。但是，经过一年多观察，王洪文的实际表现，使毛泽东感到他难以付托重任。

毛泽东也考虑过张春桥，甚至华国锋，但感到都不行。

第三，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较全面的了解，虽然有不满意的地方，如批评他搞“独立王国”，不听话等，但就总的一贯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毛泽东认为对他“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四条理由：一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三说邓小平“有战功”。四说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973 年底，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毛泽东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1974 年底，又讲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样比较历史地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

第四，挑选的这个人必须是在党内外有较高威望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个条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一伙的真实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党内和群众中都十分孤立。华国锋资望较低，当时在党里和群众中还很少为人所知。

综上四点，可以说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毛泽东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四届人大后的整顿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 2864 名。会前举行六天预备会。周恩来抱病从医院直接到会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等 22 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 12 人为副总理，并批准了国务院提名的各部委负责人员。

邓小平实际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后，即按照四届人大确定的目标，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提出整顿的口号，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

邓小平先从整顿军队开始。1 月 25 日，他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他说："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加强纪律性"。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基础上，6 月至 7 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和解决了

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等到会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整顿就是要去掉这五个字。这次会议结合批判和清算林彪集团反军乱军罪行,确定了一些重要单位的编制和领导班子的整顿调整。

对经济工作的整顿是从铁道运输开始的。铁路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但是,当时有几个铁路枢纽地区,如徐州、郑州、太原等,为一些"四人帮"党羽把持,制造混乱,妨碍铁路正常运行,影响全国经济流通,势必首先解决。3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分析研究了全国经济形势。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全国铁路恢复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破坏干扰铁路运输、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停工停产者,坚决依法惩处。当时担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亲赴徐州,对徐州铁路分局进行整顿,迅速改变了这段铁路极其混乱的状态。其他铁路局经过整顿,成效也十分显著。

接着,中共中央又大力抓了钢铁工业。5月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提出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会后,重点抓了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企业,使钢铁工业的情况有所好转。

7月4日,邓小平到中央读书班对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他说:"前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

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他强调："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① 稍后，中共中央批准了浙江省委的一个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作法。要求对党组织进行整顿，但由于很快就转入"批邓"而停顿。

在其他方面，整顿工作也逐步开展。如当时被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胡耀邦等，坚决贯彻整顿的方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所室的领导班子，总结经验，制定工作条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周荣鑫主持的教育部也努力在大专院校中进行一些整顿工作。

9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全面整顿的问题。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在这篇讲话中，他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和庸俗化。这实际上已经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这说明整顿工作的继续进展和深入，同"文化大革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整顿中的阻力与风波

整顿必然要遇到重重阻力。首先是毛泽东坚持肯定"文化大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14页。

命”的方针，因而对整顿的支持只能是有限度的。其次是江青一伙有意的捣乱破坏。加上长期“左”倾造成的习惯势力，使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时而风波四起是当时的一个特点，而大风波则有两次：

（一）“反经验主义”

毛泽东起用了邓小平，但对他并不十分放心。所以，在决定付托给邓小平以重任的同时，又发出所谓“理论问题”的指示。且不论它的理论价值如何，它在政治方面的含义等于划出了一个框框，告诉邓小平必须按着这个路子朝前走，否则就是“变修正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1975 年 2 月，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的指示公开发表，并同时发表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一伙马上抓住宣传理论指示的旗号，进行活动。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杂志发表。4 月初，张春桥又发表了一篇长文叫《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来对搞理论不感兴趣的江青，这时也热心起来，又是给新华印刷厂打电话，又是对两校“大批判组”讲话。他们突出地强调要反对所谓“经验主义”。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在他们的授意指挥下，一时之间，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讲话，连篇累牍，充斥报刊。江青一伙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反对经验主义，而是借批经验主义之名把矛头指向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干部，特别是指向邓小平。

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4 月 23 日，他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

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的批评,使“四人帮”刮起的这股反经验主义之风不得不很快刹住。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讲了话。他指出江青等人,犯有批林批孔“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等错误。并说,张春桥的文章只听别人念了一遍,讲了经验主义问题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他还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他们作自我批评。

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数次严肃的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都顶着不作自我批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由于毛泽东作了批评,中央政治局又开了会,使他们不能不稍有收敛。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给予邓小平的支持。

(二)评《水浒》的风波。

《水浒》是中国一部著名的描叙农民斗争的古典小说。评《水浒》,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搞文艺评论,其实,根本不是。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毛泽东当时因为眼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所以请了北大中文系一位女教师给他读作品。这位女教师就借机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后又谈到《水浒》。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与众不同的新评价。“《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等。虽然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政治标准,但仍属个人之间交换对文艺作品的看法。可是江青一伙却认为这是反邓的一

个好机会。立即由姚文元起草了一个如何贯彻这篇评论的报告，8月14日上送毛泽东，并得到了批准。于是“四人帮”立即组织力量，又发短评，又发社论，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写作班子陆续抛出各种文章，掀起了一场评《水浒》的喧闹。

江青一伙大批农民起义领袖宋江的投降主义，对一个死去千年的小说中人物大张挞伐，实际上是以古喻今。9月17日晚上，江青在大寨讲的一番话，道出了他们评《水浒》的真实目的。江青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很明显，他们就是要用“投降派”的帽子再次打倒邓小平和大批党政领导干部，篡夺党政机关的领导权。

评《水浒》从9月份开始，实际上为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舆论准备。

整顿的成效

全面整顿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显著。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克服，狠抓了批判和解决派性的问题，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方面，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

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路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省焦作市,南至湖北省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在河北省任丘地区发现了油田。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全国财政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更重要的是为如何才能迅速恢复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全国局势,积累了初步实践的宝贵经验。在探索适合中国的建设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二十三章

惊雷

1976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一个年头。连年的动乱和不断降临的灾难,使“文化大革命”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彻底破产。1975年的全面整顿,给在苦闷和焦虑中的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却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于是,一场特殊式的反抗风暴来临了。

“批邓”的由来

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收到了成效。可是,从11月开始,却突然刮起一股“批邓”风。

这股风开始得很奇怪。中共中央一没召开会议讨论,二没有决议、文件,而是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去传达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信的意见。大意是: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但吴德并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指示全文,

而是故意保留了一部分,以利于引导人们鸣放。

这里说的迟群和小谢(静宜)原是中南海的一般工作人员。作为军宣队负责人进入清华大学后,干了不少坏事。因为清华大学的军宣队号称是毛泽东亲自抓的点,所以,刘冰等人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的一些问题,没想到反而引得毛泽东产生了误解。这个指示很厉害。因为:(一)给刘冰等人加上"动机不纯"和"矛头是对着我的"两顶帽子。在当时个人崇拜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把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就是弥天大罪。而这个罪名又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那就更连分辩的余地也没有了。(二)邓小平给转信本来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本意不过是为了避免信被扣压难以上达。可是,毛泽东却由此而得出"偏袒"的错误判断,这样一下子就把邓小平联上了。(三)把对清华的错误判断推而广之,扩及全国。并且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因此,这个指示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毛泽东指示一传达,"四人帮"立即推波助澜,煽动清华大学等校学生,刮起一股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一时之间,各种大字报贴满校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含沙射影,造谣污蔑,各种卑劣伎俩,应有尽有。从批刘冰而上挂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再而不指名地挂上邓小平,旁及铁道部部长万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凡是1975年积极进行整顿工作的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传达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号召党的干部要正确对待,避免犯新的错误。于是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的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

年初，毛泽东还夸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可是仅仅经过十多个月，又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还是‘白猫、黑猫’啊。”并且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一次把邓小平打倒。到底是为什么？初看起来，这确乎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疙瘩。不过，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关键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直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重大贡献，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虽然开始觉察到这场运动的一些缺点，但仍然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必须“三七开”。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评价，毛泽东一直到去世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改变。因此，他只能听人说“文化大革命”好，而不能允许别人说“文化大革命”坏。而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态整顿好，虽然这一切都是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下进行的，但从本质上说，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为虽然“三项指示”确实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把先后根据不同情况讲的三句话综合为一，理解和运用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毛泽东当时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认为邓小平是“历来不抓这个纲”的。毛泽东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甚至抵触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是“走资派还在走”。而他提出要邓小平主持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正式决议，又被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园中人”，不了解情况而婉言拒绝。这就使毛泽东终于作出了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决定。不过当

时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所以作出发动“批邓”的错误决定，应该说，同江青一伙、特别是毛远新的歪曲情况、诬告陷害有一定关系的。毛远新是毛泽东大弟毛泽民的儿子。从小在毛泽东身边长大，“文化大革命”前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后，被派到辽宁，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当时是惟一能直接见毛泽东的联络员。经常活动在毛泽东的身旁。他利用这个方便条件，讲了很多不利于邓小平的话。“四人帮”倒台后，他因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被依法逮捕。

巨星陨落全国悲恸

在这样一个阴沉而极端困难的时刻，1976 年 1 月，受到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离开了人世。周恩来在十年内乱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维护国家大局，为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的斗争，更使他成为人民意愿的寄托和光明、美好希望的化身。所以他的逝世不能不使全国人民感到极大的悲恸。

总理不在了。被寄予巨大希望和热情支持的邓小平，也毫无道理地下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年事已高，重病在身。中国前途和希望在哪里？这不能不成为大陆各族人民关切的重大的问题。

江青一伙，认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来临。他们一方面，发下一道又一道禁令，不准人民悼念周恩来，不准戴黑纱，不准佩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

等等。企图用道道禁令砍断人民对周恩来的哀思。另方面，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污蔑周恩来，大肆宣扬“批邓”，加紧篡权活动。这种种倒行逆施的活动，像给广大群众胸腔中早已容纳不下的怒火，扔进了点燃的雷管，造成了一种爆炸性的效应。

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广大人民迫切需要挽救中国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这种强烈的要求和需要，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而其汇总点，则是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怒火汇聚天安门广场

从 1976 年 1 月开始，人民对“四人帮”的愤怒抗议之声，就已在中国的四面八方响起。1 月上旬，北国冰城哈尔滨的一个汽车司机，发出了《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公开信》，严厉批判这个“四人帮”的喉舌。1 月 14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胡说全国人民关心的不是悼念周恩来，不是国家命运，而是什么清华大学的大辩论。这种强奸民意的恶劣作法引起了信电纷至的强烈抗议。2 月中旬，首都北京的街头出现了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作坚决斗争”的传单。2 月下旬，在福州市的街头，贴出了《“阿斗”的呼声》的大字报，历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六大罪状。3 月初，武汉市出现了“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的大标语。未隔几天，杭州市又贴出了点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之名，而实讨“四人帮”的大字报。3 月 10 日，贵阳市贴出了一份三万多字，长达八十多张纸的大字报，鲜明地表达了人民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意愿。福建三

明市贴出公开说张春桥是“坏人”的大字报。广东顺德有一个工人，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批判张春桥。厦门大学的一位政治课教师，先后向中共中央、《人民日报》等寄发了十六份揭批“四人帮”的信和文稿……这些情况说明，从北国到江南，从长江中游到东海之滨，中国大地已经到处点燃了声讨“四人帮”的烽火。

人民群众胸中积酝已久的怒火，必然要爆发出来，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向。其导火线，则是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对周恩来的两次事件。3 月 5 日，上海《文汇报》把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报道中周恩来的四句题词全部砍掉。隔了 20 天，《文汇报》又在头版的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是“走资派”。这对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感情是一个严重的挑衅。

首先举行大规模群众游行抗议活动的是邻近上海的南京市。3 月 24 日，原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到雨花台向周恩来献花圈。28 日，南京大学师生 400 多人在数学系团总支的组织下，抬着周恩来的遗像和花圈，列队绕经最繁华的街道，前往梅园新村。接着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进行悼念活动。29 日，南京街道贴出很多大标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这些标语还被学生和工人用油漆和柏油刷在列车上，随着火车轮的滚动而传到四面八方。31 日，南京的闹市街头公开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围观群众的鼓掌欢呼。

南京市人民的这些活动，刺痛了江青一伙。王洪文叫嚷：“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他们利用其地位和权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 4 月 1 日发出电话通知，严令禁止。于是，南京民众遭到血腥镇压。“四人帮”的本意是杀一儆百，但效果恰恰相反。

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早在 3 月中旬就开始了，花圈越来

越多，人流越来越涌。大量的诗词、新诗、快板、祭文、悼词等等，随之而来。人们争相传抄，迅速流传。4 月 2 日，北京市的各个单位普遍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和姚文元关于“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等“屁话”。但是，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激怒和动员了更多的群众。当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第一个大的游行队伍。这是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的职工。他们用四辆卡车开路，抬着四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恩来，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分显眼的地方。这火一般的诗句飞速传遍北京城。

4 月 3 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早上 7 点多钟，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队伍，就抬着 30 多个花圈集合出发。中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近千人的队伍又走进天安门广场。下午纪念碑前出现几十米长的黑底白字大横幅，上书 28 个大字：“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倘若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估计达 100 万人次。

4 月 4 日，清明节又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达到高潮。估计这一天到过广场上的人达 200 万人次。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花山诗海，纪念碑南的柏树墙上挂满了白花，连旗杆和华表、灯柱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据不完全统计，有 1400 多个单位，总共送花圈 2000 多个。其中有精致的小花环，也有为了抗议“四人帮”偷毁而全部用金属制作的直径四米的大花圈。

这一天，在全国也是群众活动的高潮。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和雨

花台，在重庆的红岩，在西安的钟楼，在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在太原的五一广场，在杭州的街道，在南方的乡村小镇上，在辽阔草原的蒙古包里，……广大群众都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

错误的镇压

早在3月下旬，“四人帮”已经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刺探情况，搜集物证，个别拘捕，为镇压群众作了准备。在4月4日晚上，由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在京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会议上。江青等人更是吵闹、胁迫，极尽能事。会议根据“四人帮”提供的歪曲情况和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的汇报，作出了收缴全部花圈，从5日起禁止群众再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的决定。4日深夜，出动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还有200辆卡车，洗劫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诗词、条幅、标语和花篮，钢花圈被起重机吊走，连柏树墙上的万朵白花也被一扫而空。自愿留在广场上看守花圈的57个人，也被全部抓走。

4月5日清晨，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是一片洗劫后的景象和戒备森严的封锁线。面对这种无理暴行，群众怒不可遏，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和国际歌声中，开始了新的抗争。这时宣扬“清明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论调的广播车在街上巡迴，群众怒而砸扁之。市民兵副总指挥的小轿车和一辆给民兵送食品的面包车被烧毁了。拒绝和群众代表谈判的“联合指挥部”小灰楼，也被怒不可遏的群众点火烧着了。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

下午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所有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广播中共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他说："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听到这个广播讲话后，人群陆续走散。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镇压命令。突然，广场上所有照明灯全部亮了，手持木棍、皮带的警察、民兵等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广场。据说，出动的实际兵力是：民兵10000人（另20000人待命），解放军5个营，公安人员3000人。最后被包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群众有200多人，他们都遭到了毒打、拘捕和审查。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两项决议。一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另一个是根据所谓"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四人帮"指挥炮制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江青一伙利用中共中央的决定大作文章，在全国进行了疯狂的追查、逮捕和镇压。

出现这种情况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对于群众运动性质的这一错误判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自然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江青一伙歪曲事实，欺骗中央，蓄意打击陷害，是造成误断的重要因素。

第二十四章

毛泽东病逝与“四人帮”覆灭

天安门事件宣告了江青一伙政治上的死刑，但要把这个判决实际执行，还需要一些条件。当时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心中考虑最多的问题，按照叶剑英的说法，叫作“投鼠忌器”。当这个问题不存在之后，解决“四人帮”就水到渠成了。

毛泽东病逝

当时，毛泽东已经病得很厉害。1976年6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把毛泽东病危的情况通报给党政军各方面的高层负责人。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全国各族人民感到极大震惊和深重的悲痛。

与全国人民的感情相反，江青一伙把毛泽东逝世看作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毛泽东刚逝世，他们就指派人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篡夺中共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他们通过各地党羽，盗用群众的名义给江青写“效忠信”，提出

让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这方面，迟群、谢静宜特别卖劲。他们不仅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还让人“给下边打招呼”，布置各系发动群众写信。姚文元也布置新华社系统给江青写“效忠信”，为篡权制造舆论。但响应者不多。

他们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并在全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传。其实，毛泽东临终前并没有作过这样的嘱咐。事实是这样：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陪同外宾受毛泽东接见。接见后，当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一项具体工作时，毛泽东指示“照过去方针办”，并亲笔写在一张纸上。华国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过传达。江青、王洪文等人的笔记上写的也都是“照过去方针办”。可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把这句话加以篡改，并作为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抛了出来。他们把这句话，既作为自己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合法依据；又作为攻击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炮弹，在报纸上提出“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江青还私下派人到天津制作了准备“登极”的“女皇”礼服，王洪文私拍了自己的“标准像”，为他们上台作各方面的准备。他们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地为江青争权，要求由他们准备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等。

这样，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为一项特别急迫的重大政治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共中央的面前。客观形势要求毫不拖延地作出决断。

粉碎"四人帮"

对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早就有所考虑。朱德,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1976年7月逝世前,就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曾派人向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处于中央权力枢纽地位的叶剑英等打过招呼,要他们对江青一伙提高警惕,并及早作准备。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人也曾向叶剑英提出过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建议。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对此事作过多次议论。有两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第一,"四人帮"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问题,已经不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去解决,必须采取特殊的方法去解决。第二,为了最妥善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须争取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一致同意。而这里的关键是取得处于一把手地位的华国锋的同意。

华国锋,1921年生,山西省交城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到湖南。他先后担任过县、地、省等党政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结合进湖南省革委会担任副主任,后被选任省委书记。1971年经毛泽东提名调到中央工作。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华国锋被提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在错误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1976年他由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央政治局通过,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处于党和政府的第一把手的关键性岗位。他的态度如何,当然是有重要影响的。

华国锋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看是"左"的,是赞成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方针的。但他同江青一伙又有矛盾和

冲突，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江青一伙要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必然要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四人帮”不仅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大权，极力在新闻报道、报刊版面和照片刊登等方面突出自己一伙，贬低华国锋等，而且发表文章和讲话，对华进行影射攻击。

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她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郊区发表讲话。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看修正主义。”

“四人帮”的党羽们，话就讲得更明白。比如辽宁那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公开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华（国锋）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在这种情况下，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头号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攻击华国锋等党中央领导人是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隐瞒者、篡改者，而把江青一伙打扮成为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和执行者。这篇文章在当时被看作是“四人帮”即将有所动作的一个信号。

华国锋对江青一伙早就很不满意，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

负责人有所议论和考虑。现在,客观形势迫使他不能不作出决断、采取果断的对策。正是在这样严峻关头,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华国锋互相沟通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样,解决“四人帮”的条件就完全成熟了。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0月6日,中共中央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以开会的名义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分别隔离审查,没有费一枪一弹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十月胜利的启迪

1976年是中国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巨大变化的一年。

这一年之初,开国总理周恩来去世。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不幸病逝。9月,毛泽东主席,又离开了人间。开国元勋、党、政、军最有威望的主要领导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接连逝世,不能不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甚至可说是面临着某种严重的政治真空。

这一年经济上又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工业城市唐山顷刻间被夷为一片废墟,死亡24万多人,重伤16万多人。这是300年来,京津唐地区发生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世界地震史上所罕见。在四川的龙陵、松潘等地区也发生了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

就在这样星殒山崩的危急关头,江青一伙却丧心病狂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致使中国天空一时乌云乱翻。但结局是

好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从1966年5月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四人帮”后逐渐停息下来了。

十年的实践证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只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本身是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值得肯定和继承的。当然,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否定,并不是要否定这十年的历史。十年中,中国在政治、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各方面还是有成绩的,是不能否定的。

“文化大革命”确实又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反面教员,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这十年动乱的历史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例如,如何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等。

实践告诉我们,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的各种矛盾,不能再搞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不必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这些过激的“左”的做法不仅不利于解决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是应该采取和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去解决。

再如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实践告诉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文化大革命”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空前的大破坏。造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受到了极大的苦难。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威,不能允

许任何人特殊和例外。更不能允许任何人的话高于宪法和法律。而且应使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任何一级组织和它的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权力。也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哪怕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等貌似神圣的借口，破坏宪法和法制，等等。

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全面地科学地总结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会使我们获得一笔长久受益的巨大宝贵财富。

第二十五章

历史转折的实现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尽管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但转折的实现是不可逆转的。

艰难的转变

粉碎“四人帮”，在客观上是反映了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和政策，改弦更张，另辟新途的意愿。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者们，在主观上并不是都已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当时的第一把手华国锋，认识差距很大。因此，就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既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需要的事，也重犯了不少旧错误。

有益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进行了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的工作。并在揭批查运动中，有领导地整顿和调整了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党政领导班子，清除了一批“四人帮”在那里的骨干和党羽。同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冤假错案开始进行平反工作。

这样，全国逐渐出现了安定的局面。

二是，开始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加强了计划和领导。国务院召开了计划、铁路、冶金等一系列会议，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解决了一些急迫问题，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整顿。从而使国民经济恢复较快，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市场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

三是，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特别是大学招生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对改变“造反当官”、“无知光荣”的恶劣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三方面的有益工作，对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能够确定地转入新的历史时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与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愿相比较，这些工作又显然是非常不够的。特别是，干部和群众提出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要求却受到了阻碍。

阻力来自何方呢？有客观的，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以前存在的“左”倾错误造成的积习和影响，形成一种“左”的传统的惰性力量，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轻而易举改变和消除的。但是，更主要的是主观原因。即是否已经深刻认识到以“文化大革命”为集中表现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并下决心去纠正它。而这个特别重要的主观条件，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身上是不完全具备的。

从当时的文件和讲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华国锋既没有认识到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更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的决心。他的指导思想基本上仍然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

的那一套。

在政治上，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还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他仍然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个错误方针的提出和贯彻，成为当时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最大障碍。

在理论上，华国锋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他公开发表个人署名的长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宣称：“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的路线。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在组织上，华国锋在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问题上，明确地违反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对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不是抱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华国锋一直以是毛泽东批准的为由，不准平反纠正。另外，华国锋不但继续维护旧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积极制造对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

从上述种种事实中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论断：华国锋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这是造成“两年徘徊”的主观的决定性原因。

中共十一大的功过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510名，代表党员3500多万。大会听取和通过了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叶剑英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通过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提前一年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影响，根据新情况作出新的决策。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基本上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不过，这次代表大会还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主要表现在：

（一）明确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使全国人民得以安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会要求动员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对全国各族人民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二）修改了党章，排除了一些“四人帮”歪曲篡改党的性质和任务方面的错误论调，强调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对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三）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但是，这次大会的缺点和错误也是严重的。首先，这次大会不

仅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反而加以肯定。并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就等于给党和全国人民捆绑一条新的绳索。其次，对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给予高度评价。这就为从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设下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再次，认为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批“左”，而是反右。这在客观上等于不准深入揭批“四人帮”，起了保护“四人帮”的作用。

会议选举中央委员 201 人，候补中央委员 132 人。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思想禁锢从哲学突破

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长期的“左”倾错误，是从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误断这一哲学性命题开始的，而其扭转又是从另一个哲学性的命题——真理标准问题开始突破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四人帮”倒台以后，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有人阻挡，说那是毛泽东定的，不能翻案，要继续“批邓”；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又有人拿出毛泽东的决定作挡箭牌，不准平反；群众悼念周恩来，称赞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人说不行，因悼词上没有这句话，而悼词是毛泽东定的。甚至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某些文章，也不行，因为那是毛泽东看过的。如此等等。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违反“两个凡是”的方针。很显然，不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

对“两个凡是”方针很多人是反对的。例如邓小平在 1977 年 5 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用准确的完整

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陈云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也鲜明地表示了不同意见。

但真正引起全国广泛重视和讨论的，则是从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这篇文章开始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的，后由中共中央党校的有关人员帮助作了较大修改，最后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修改定稿。《人民日报》于第二天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播发了消息，在各方面引起很大反响。

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要害在于判断真理标准是实践检验还是毛泽东的话。而毛泽东的话是否都是真理，都是必须绝对遵守的最高指示，他的话要不要经过实践检验。这个问题一解决，“两个凡是”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与中国二十年“左”倾思潮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矛盾，为一些人所不能接受，因而引起了思想理论路线上的一场大风波。有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当时负责思想理论战线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对这篇文章严厉指责。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展开辩论。于是，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邓小平 6 月 2 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

了弥天大罪。”他强调这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经过一批理论工作者和各报刊的共同努力，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大讨论，终于逐步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令，解脱了思想上的严重禁锢，为历史性的转变从思想上作了准备。

历史转折的标志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转折，是起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扭转局势则是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在1978年11月9日至12月13日，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的议程是三项：

(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2)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学习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首先议一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到会同志一致同意工作重点转移。不过不少与会者认为，为了实现转移，有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解决。陈云首先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为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王鹤寿等人平反；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予应有的批评等。陈云这个发言广泛涉及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引起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

了热烈的反应。很多与会者发言不赞成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中共中央之外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那些材料是靠对犯人逼供的办法搞出来的。因此，应该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重新评价。这样，会议就突破了华国锋原来设想的框子，认真地讨论了许多重大问题，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慎重研究，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谈了九个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关于“批邓”，关于“二月逆流”，关于薄一波等 61 人叛徒案，关于彭德怀问题，关于陶铸问题，关于杨尚昆问题，关于康生和谢富治问题，关于地方的一些重大事件问题，基本上接受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12 月 13 日，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主题和基本旋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 169 人，候补中央委员 112 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全会时间不长，但由于准备充分，指导思想明确，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

会议的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样，就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作了拨乱反正。

（二）决定了党的政治路线

在取得全国胜利并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问题，一直争论了很多年。

全会分析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这样，就结束了在前两年时间里徘徊前进的局面。

（三）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集中精力首先抓农业。

全会认为，多年的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两个条件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现在，中国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中国国民经济必将能够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全会特别重视农业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原来起草的继续贯彻“左”的一套的文件草案，重新起草了一个新的决定草案，并经会议通过。这个决定从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强调为了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具体措施主要是：恢复和扩大了社队的自主权，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允许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对个体经济予以扶助。另外，全会还决定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价格，逐步作相应的提高。这些方针和措施产生了巨大的成效，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格局，使原来停滞不前的农业经济，变得欣欣向

荣，蓬勃发展了。

（四）强调健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包括：肯定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成绩，否定了“批邓”和“右倾翻案风”；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撤销中央过去发出的有关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等。

（五）恢复和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全会决定健全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的纪律，少宣传个人，纠正一切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做法。并在组织上作了重大调整。主要是：

（1）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2）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3）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

（4）选举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又开会，解决了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确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任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解除了汪东兴兼任的上述有关职务。

如果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主要是消除了一个使党和国家动乱不已的大患的话，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内的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使中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面地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两者

是紧密相联的，但后者更深刻，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局势迅速改观

为了在新时期更有效地展开各项事业，1978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中共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了更明确的前进方向。

这一时期在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

在政治方面，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1979 年 3 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 1971 年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批判了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成绩的所谓“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6 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作了系统分析，明确地改变了 1957 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恢复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判断，纠正了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中共中央还认真地解决了国内政治关系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如，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 1957 年错判的右派分子；宣布原工商业者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并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贩、手工业者从过去笼统判定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等。这样，有效地促进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经济方面，成效最显著的是农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解除了农民身上的种种禁锢和枷锁，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引起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开创了一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979年到1983年，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9%，超过前26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倍还多。中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到1978年，用20年的时间增长了2000亿斤，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用6年就做到了。农村商品生产有了大发展，农村产业结构有了大变化，农民生活也有了较大提高。1978年全国农村人均年收入百元以下的户还占33.3%，而到1983年只剩下1.4%。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工业发展见效较迟，但也已经扭转了徘徊的趋势。而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很大的。

在对外工作上，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取得了很大成绩。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2月，中国边防部队取得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保卫了边疆，稳定了东南亚的局势。这样，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十六章

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都有把十年内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愿望，生产积极性比较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整个经济形势是比较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什么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二次大的调整呢？

调整的必要

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现状看，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的种种问题急需解决；二是从长远发展看，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迫切的客观需要。

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长期以来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建设走了一条“高指标、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出现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的现象。建国30年，工业生产增长41倍，而农业生产只增长了2.7倍；工业生产中，重工业增长98倍，而轻工业只增长32倍。这

样，造成了农产品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反过来也使重工业由于孤军突出、缺乏其他方面的有力配合而不能很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体制，长期实行的是以行政管理为主，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其缺点和弊病日益暴露，不能适应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三）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使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比例失调，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化和尖锐化。

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工业生产发展，是在基数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较高增长，带有恢复的性质。但是，一些领导人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又滋长。华国锋急于要组织“新跃进”，提出“大干快上”、“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的口号，这就大大加重了经济部门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实现所谓“新跃进”，从国外引进22项大型技术设备，共需外汇130多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工程的投资，总额高达600多亿元。加上以前决定上马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工程和进口100套综合采煤机组等项目，所需资金大大超过了当时国家财政所能负担的能力。1978年，积累率高达36%。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各项建设工程蜂拥而上，致使这一年成为基本建设投资额最多，而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这样，国民经济中存在各种问题，就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这就是说，客观形势强烈地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再一次调整的要求。

新"八字方针"的提出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陈云等及时地注意到解决经济问题的迫切需要。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物资有很大缺口的问题，陈云作了两次批示，明确提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

根据这些批示，1979年3月，国家建委召开了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清理了在建的项目，停建和缓建了222个项目。但由于对调整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减下来的主要是规模较小的项目，而新上的是一些较大的项目，因此总的基本建设规模并没有压下来。

为了更好地解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问题，3月8日陈云发表讲话，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陈云说："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1]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着重指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后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党内高级干部中是出类拔萃的。这篇讲话为进行计划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指出了方向。

---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21页。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财政经济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议。信中首先建议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并提出了十二名委员的人选。接着提出了六点建议：(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现时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6)借外债必须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这样，就既明确指出当时国民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又为新的调整提出了解决原则。

在3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陈云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调整目的要求。陈云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中国的"实事"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①他指出：现在的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经过认真的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国家计委修改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并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国民经济调整。

为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由李先念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会议正式确定了调整、

---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26、227页。

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6月，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作为打好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的方针正式提出，并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了国民经济的第二次大调整。

经济指导思想的转变

为了贯彻执行新的"八字方针"，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1)调整了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把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少26%，主要产品指标也适当下调。(2)确定工业增长速度按年平均6%，争取7—8%。(3)取消"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并对因此而急剧膨胀起来的农机工业，作了较大的调整。(4)中共中央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会后，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5)从1980年5月开始在部分国营企业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参加试点的企业有6000多个。按企业数算只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但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对当时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确的作用。(6)把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187个减少到912个。投资减少39亿。

与此同时，还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广泛讨论。这次讨论对于提高广大干部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的认识，起了有益的作用。

虽然采取上述一系列重要工作和措施，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但又屡压不下。

国家计划的大中型项目虽然停建缓建一批，但地方施工的小项目增加很多，因此，到 1980 年底，全国基建规模基本上没有压缩下来。二是财政上出现大量赤字。1979 年财政决算赤字 170.6 亿元，1980 年虽经多方努力，财政赤字仍达 127.5 亿元。不得不增发钞票，造成物价上涨，影响民生。

实践使中央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只就生产指标和投资数量来解决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是不能顺利解决问题的，必须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求得根本性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认识。包括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联席会议、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陈云根据中央常委的决定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一共讲了十四条意见。他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说："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他分析了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只能量力而行，所以有些好事不能一时就办到"。对于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陈云说："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最后，他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① 陈云的这个讲话得到大家赞同，发挥

① 《陈云文选》(1956—1985)，第 252—254 页。

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开始得到端正，这是全国经济工作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调　整　的　成　效

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端正，加快了调整经济的施政方针的落实。1981年春节过后，国务院陆续召开了40多次会议，部署和检查经济工作，认真讨论和解决了一批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由于抓紧调整工作，1981年成为中国经济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国民经济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已基本上趋于协调。

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看，趋向比较合理。1978年积累率36.5%，1979年积累率34.6%，1980年下降到31.6%，1981年再下降到28.5%。

从农轻重的关系方面看，改变了那种重工业孤军突出，而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下降的不合理状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趋向比较合理。1981年，农业已上升为32.5%，轻工业上升为34.7%，重工业下降为32.8%。这样的比例关系有益于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控制了基建规模，使经济发展走上了稳定的道路。

1981年财政赤字已下降到25亿元，在短短一年中就做到了基本平衡，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所以，被某些外国报刊称为世界财政史上的奇迹。在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工农业生产总的看，不仅没有下降（其间重工业曾有短时间下降），反而能够以年平

均6.7%的速度稳定增长。

（三）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部分的改革，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首先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繁荣。其次，在部分工业企业中，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给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以很大的推动力，增加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三，在部分企业中实行了"利改税"的试点，实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起了积极作用。第四，开始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消费品的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城乡市场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当然这些改革都是初步的探索性的，但是，已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四）城乡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年中，国家用于增加城乡人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达1400多亿元，占这三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1%，比例之大是建国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农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是有目共睹的。城市人民的生活也有重大变化。三年中安排了2600万人就业，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住房、副食等各方面的补贴，使城乡人民收入迅速增加。

第二十七章

新的历史问题决议和组织调整

与国民经济第二次大调整同时并进的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进展颇为迅速。当然,不是没有波折。

拨乱反正的关键

"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广,危害极严重,要彻底克服它,仅仅揭发批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左"倾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清理。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伟大领袖,对他如何评价关系重大。但是,不公开揭露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就不能够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的清理,从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在内,有没有勇气进行自我批评,能不能历史地、正确地进行这种自我批评,是能否完成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

1980 年 3 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直

接领导下，组成了起草小组，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到1981年6月决议正式通过，这十五个月，是全党围绕着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充分发扬民主，展开广泛讨论的时期。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看了起草小组的写作设想后，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这就是："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到此基本结束。"① 以后，邓小平又多次讲过，这个决议里头，最关键、最根本的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条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全局的问题。这一条如果写不好，情愿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的意见，对统一大家思想，正确地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了重大的作用。

1980年7月，决议初稿送交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提了很多意见，然后作了很大的修改。10月，在全党范围内组织4000多名党政负责人和理论工作者，对决议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会上提出很多的意见，有些很尖锐的批评，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能接受的意见。这次讨论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绝大多数人，一致要求增写"历史的伟大转折"部分，并写明华国锋的错误。在4000人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2页。

讨论的基础上，又搞了一个稿子，于 1981 年 3 月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部分老革命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共 50 多人征求意见。以后，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两次讨论和修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包括预备会）期间又根据与会人员的意见作了两次修改，前后较大的修改有八次之多。

由于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由于邓小平等亲自主持决议起草工作，以及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而又复杂的关键问题，为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组织上的重要调整

随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不断深入，组织上不适应的状况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要求进行相应的组织调整。在这个期间的重大调整，主要有三次：

一次是 1980 年 2 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以姓氏笔画为序）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组成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的重新设立是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措施，既继承八大的好传统，又对以后工作的开展发生良好效果。

全会还对中央其他人事做了重要调整。一是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批准汪东兴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三是批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们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实际上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担负一定职责的人，给予了公正而体面的处理。

第二次是8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改由赵紫阳接任。这次会议同意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他们是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此外还接受了陈永贵解除他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三次是1980年11月到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两项职务。并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既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功劳，又批评了他的错误。当时认为华国锋的主要错误是：

（一）他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有变化，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改变。（二）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三）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四）他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对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冒进，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也指出，华国锋显然缺乏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中央军委主席也不能胜任。

这些组织上的重大调整既是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的必然结果，又对保证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问题决议的通过

在上述思想和组织两方面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53人。这次会议有两项议题，一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二是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它的中心思想，是既对多年来“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又坚定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议》的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大体上是三个方面：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建国32年来进行的历次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从党的指导思想、主观原因和社会原因等多方面作出科学地分析，并得出了正确的总结。

（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

《决议》指出：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也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给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新的完整的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决定》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作了概括性的阐述。强调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一积极成果，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一成果。

（三）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指出：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总结。《决议》概要地列出这条道路的10条主要点，并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这些重要内容充分表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完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不仅解决了指导思想问题，还在组织上作了重大调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1. 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2. 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3. 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4. 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5.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6. 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样就从组织上全面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遗痕。

总括以上重要内容，就使这次全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第二十八章

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纲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客观形势的发展，给党提出了如何带领中国向新的宏伟目标前进的历史任务。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首先要做的，就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提出和制定新的纲领。

新老交替

为了解决纲领的制定和领导班子组成人员新老交替两大课题，1980年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而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1982年9月1日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正式代表1600名，候补代表149名，代表党员39657212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审议通过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和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等31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主持。大会

秘书长为赵紫阳。开幕式的大会，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列席。

执行主席邓小平首先致开幕词。他概括地回顾了党的历史，论述了十二大的任务和历史地位，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重申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和四项最重要的保证，即：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

接着，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共分六个部分即：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内政、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勾画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蓝图，激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代表们用三天的时间，对这一报告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在6日的大会上，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大会的决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报告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应当成为今后党的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

在6日的大会上，叶剑英和陈云讲了话。他们除表示完全赞成邓小平的开幕词，胡耀邦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外，着重地谈

了新老合作交替问题。叶剑英说："我们的党是个生机勃勃的党，经过这次大会，将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的领导岗位和其他岗位，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我们老一辈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由衷地感到喜悦。"

陈云说："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老干部要陆续从领导班子中退出。"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但是，要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接着，他着重谈了提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他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成千成万才能适应事业的需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还有两种人也不能提拔，这就是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人，以及在经济领域内和其他方面严重违法乱纪的人。"陈云说："总之，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这样"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10日，进行了选举。这次选举与过去不同的有两点：一是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鉴于党内领导干部状况，而采取的过渡办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大会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都是具有40年以上党龄，对党有比较大的贡献，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的老党员，平均年龄73.3岁。二是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48人中，有210人是第一次被选入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中青年干部，占60.6%。在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也比上届中央委员会有了较大的提高。当选人当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共122人，占总人数的35.1%。同时，中央委员会中还保留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

超、王震等十六位虽然年纪较大但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威望的老领导人。

在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等 25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十二大的纲领

十二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个总任务，报告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报告强调：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为此，确定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的方针。

战略目标是：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国经济建设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的 710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000 亿元左右，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对这几个根本环节一定要抓住。同时，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 12 亿以内。

战略步骤是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报告指出：中国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报告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内容和任务。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报告回顾了建国后历史。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建设需要进行长期的、大量的工作，过去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严重破坏。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今后，"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报告还从中国的国家制度，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论述。

报告还对我国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专政的一个关键。""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我们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处理当前我国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这就是党中央关于我国现阶段阶

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方针。”

报告中还对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阐明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这次大会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识上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基本确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对于指导以后的工作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大决策。

第二十九章

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

中共十二大结束以后，中国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作了艰巨的努力。一方面，继续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方面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两者是齐头并进、互有交叉、互相促进的。在这里先讲经济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人们的行动是受思想和理论支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也不例外。因此，在中共十二大之后，中央领导人又多次强调，思想要更加解放一点，改革要更加大胆一点。但是，"解放"、"大胆"以什么为标准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并不明确，认识也并不统一。邓小平提出："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 这三个有利于原则的提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思想解放的方向和衡量的准绳。

---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改革如何进行：1982年11月举行的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了比较具体的讨论。会议认为："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近三年来的初步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是，全面改革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今后三年，一方面要抓紧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另一方面要更积极深入地进行各项改革的试验。"

在这次会议前后，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1982年9月，国务院决定将160种小商品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11月国务院批准下发关于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文件。自1983年1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开始在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的试点。《人民日报》社论说，实行利改税是一项重大改革，是符合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充分发挥企业内在活力的重要措施。后来，利改税的范围又逐步扩大，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少数大城市经批准陆续开始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对重庆市给予国家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是全国第一个试点的大城市。5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沈阳、南京、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等大城市先后开始综合改革的试点。

针对过去政府对企业管理过多、过死的弊病，1984年5月，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以便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1983年4月在北京以成立民间性质的光大实业公司为开端，陆续建立起一批各种类型的公司。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报告，开始了外

贸体制的改革。此外，不少地方建立起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少数城市还开始了居民住宅商品化的试点。就这样探索着逐步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农村经济开始活起来

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成为农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文件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年的经验，从理论高度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文件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这样，就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方向，解除了顾虑，使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普遍实施，得到了稳定。

为了活跃农村的商品流通，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的报告，对农村商业流通体制开始改革。主要内容是：改变过去统得过死、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旧模式，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商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等等。

农村政社分开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农村人民公社虽然在1958年建立后的二十多年里几经变化，同初建时的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政社合一这一基本框架一直保留下来，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根据一号文件的需求，各地陆续开始设立乡村政权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85年5月底，全

国已经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9万多个，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全部取代了原来的54000个人民公社和下层的生产队。宪法中也取消了农村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有关规定。这一"左"倾思想在组织形式上的残痕，终于消失了。这对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83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认为，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年初的一号文件是正确的。这一年农业总产值为3121亿元，比上年增长12%。粮食产量达38728万吨，比上年增长9.2%。棉花463.7万吨，比上年增28%。全国已有个体工商业户580多万户。其中城镇个体工商业户增长53%，而农村个体工商业户则增长190%，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发展。会议肯定，发展商品生产是农村富裕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整个农村实现中共十二大提出宏伟纲领的必要条件。会议认为，中国农村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发展，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各种责任制，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鼓励农民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把经济搞活，促使商品交流畅通。这样，才能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50年代就已闻名全国的河北省遵化县西铺的"穷棒子"社，以"三条驴腿"的家当，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其"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苦干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苦干了二十多年的结果，到1979年，全社人均年收入不过145元，还是没有摆脱一个穷字。原因何在？根本的一条就是"只懂抓阶级斗争，认'以粮为纲'一个理"。而今西铺村已从单一的种粮模式中走了出来，山坡有果园，村里有工厂，电线厂、蜡线厂、编织厂、织布厂和运输队，还有畜牧、屠

宰、开矿、水泥、木器、饮食等各种专业户，多种方式和多种经营，使西铺逐渐富裕起来。人均年收入1987年已近千元。彩电、冰箱、收录机等也进入了原来的“穷棒子”家中。

当然以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是很自然的。一般说，东南沿海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内地，珠江、长江两个三角洲领先于全国，城郊又高于其他农村，有的发展程度、收入高低相差十几倍，甚至数十倍，差距十分悬殊。但就是在最落后的、商品意识最淡薄的农村，也已经不能再固守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而开始起动了。

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

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出特定的几块地方，中央给予特殊的政策，广泛吸收外资，迅速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对外开放搞活的先锋，并对全国整个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这就是经济特区。这种办法虽然是借鉴了世界上各种经济开发区的经验，但确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精彩的一角。

建立经济特区，是1980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决定的。会议通过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此后，四个特区的建设者们各显神通。特别是深圳、珠海，在原来荒凉的边陲小镇上，很快建设起崭新的繁荣的现代化新城。速度之快，成效之巨大，令人惊叹。

经济特区的出现，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赞扬之声颇高，贬斥的议论也不少；心向往之，积极趋奔者甚众；痛心疾首，斥之为资本主义者亦不乏人。甚至有极端守旧之人，把经济特区比之为旧中国的“租界”，指斥为“复辟”的典型。

1984年初，邓小平和杨尚昆、王震等领导人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特区。经过实地考察后，他们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建设。邓小平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又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他强调："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他提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①

中共中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下旬到4月初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经过商讨，提出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这十四个城市（由北至南）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同时开放的，还有海南岛。以此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准。这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就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加上海南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这一重要决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1—52页。

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实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巨大成就。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需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加上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提供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这就是说，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使改革逐渐全面展开。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什么呢？“中央认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围绕这个基本任务，决定从有关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作了历史的分析、理论的阐明和方针原则的规定。

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次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的一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突破。

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两者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有人认为二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还可以互相补充的；也有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结合为一个有机

体。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方向的重大实际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认识上逐步产生了飞跃。当然，对于如此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次飞跃就完成的。

最初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0年8月起草的一份文件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这份文件曾提交当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结果是并未作出一致的肯定性的结论。说明这个新提法当时还难于在党内被普遍接受。中间经过几次讨论研究，到1984年认识比较一致了。决定正是当时对这种反复总结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运用和依据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决定的最后两个部分，特别阐述了"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进过程中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历史进程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这个决定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十章

建设精神文明

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方针的指导下，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展开，在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党组织的整顿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干部“四化”的进展

由于历史积累下的种种原因，虽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的不断努力，但干部数量多、素质低、年龄大、文化低、缺乏专业知识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同担负的任务发生严重的不适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二大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有步骤地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加强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为，“干部队伍的素质如何，能否适应总任务的要求，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如干部教育应纳入国民教育计划；

中央党政机关的所有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参加轮训;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发挥现有党校、干校的作用,中央党校和各部委干校都可以办走读班等等。决定说:"中央设想,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都具有高中或中专毕业以上的文化、业务水平;大专以上程度的干部比例逐年有相当的增长;部委、司局两级领导班子中,大专以上程度的干部占有较大的比重。"决定还强调:"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培训干部,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批专门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继往开来,保证党的路线连续性的紧迫要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为了贯彻这一决定,各方面都作了一些具体安排。例如,1983年2月,全国第二次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使党校的任务由轮训干部为主转向培训干部为主,逐步进行改革,实现正规化。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纪要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国各地,为更好地发挥各级党校在培训干部中的作用,提供了指导文件。

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随后并制定了有关自学考试的各种条例规定,方便了在职干部的文化提高。此外,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治部起草的《关于加强全军干部科学文化政治理论教育的决定》,为军队教育水平的提高明确方向。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地普遍展开。

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

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对促进干部的四化，起了积极的作用。据新华社报道，到1984年9月底，全国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县级领导班子调整工作基本结束。调整后的县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较前都有大幅度下降。除北京平均为46岁半，上海平均为45岁半以外，其他26个省、自治区的县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均在4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干部，约占1/3。文化程度则有较大的提高。在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级主要领导人员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原占10.8%，提高到45%。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开展整党工作

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自身的状况对整个全社会影响甚大。党风的好坏，关系到党自身生死存亡也是社会风气好坏的关键。因此，党的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

为完成这项重大任务，1983年10月，专门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以如何搞好整党工作为中心议题，作了认真讨论。邓小平、陈云等在会上作了讲话。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并选举了领导整党日常工作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会由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五人为副主任，其中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委员有：邓力群、陈野苹、王从吾、韩光、康克清等16人。还有5名顾问：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和宋任穷。

决定首先肯定“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同时强调指出：党内存在着阴暗面，有些

问题还相当严重。如:“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思想战线上,有些党员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然传播这些思想。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丧失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加以整顿。”

对于这次整党的任务,党中央规定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决定中规定了整党的步骤和基本方法,要求“在从今年冬季起的三年内,分两期整顿完毕。第一期,从全年冬季开始整顿中央一级、省市自治区一级(这两级包括各部委办司厅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中的党组织)”。“第二期,从 1984 年冬开始整顿其他所有的党组织。”

“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

遵照上述决定和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具体部署,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分期分批进行了整顿。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都是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参加整党学习的。经过三年的努力,在某些方面

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例如，中共福建省委到1984年底，已清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案件366件，核查出一批“三种人”。山东省改组了成武县派性严重，利用职权，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以权谋私的中共县委领导班子。河北省第一期整党的单位，经过对照检查，已有476人退出多占住房689间，有266人退出受贿、私分、多占公物等折款2万多元。全省清退非法转为城市户口的3300多人，清退非法招工转干的13000多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勿庸否认，有些地方和单位的整党是草草了事，一切规定的必要步骤都一个不缺地经过了，只是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整党要达到的目标却根本没有达到。使“党风根本好转”的预期目标，没有能够实现。看来，想在几年的有限时期里，经过一次整风，就使党风根本好转，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难以做到的。

教育体育等的改革

在一个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的国家中，是不可能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而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基础在于国民教育。因此，抓紧教育事业的振兴，就成为摆在全民族面前的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中国人口的多数在农村，农村教育的好坏影响甚广。198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强调，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教育必须加强。农村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农业劳动者，并提高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通知要求，有关高等学校要为农村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逐步建设起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

同月，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

在抓紧教育普及的同时，中央也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的风气。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召开这样隆重的学位授予大会，是建国以来首次。也是对卑鄙知识，把学位制度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和否定的错误思潮影响的一次有效的清除。

7 月，召开了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因为，它不仅仅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而且直接关系着中国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劳动者后备力量的素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会后逐步解决了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职称、待遇等各方面的具体问题。

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决定中对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等方面，作了一些具体的比较符合客观需要的新规定。

如果说国民教育是一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功效的"慢功"，体育事业则相对说是可以较快见效的"快功"。体育事业这几年战果累累，成就辉煌，形成了一个高峰期。

试举其大者：

中国女子排球队在 1982 年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夺冠。1984 年又在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夺冠，实现了三连冠的宿愿。

1982年12月，中国运动员在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获得62枚金牌，首次超过日本，夺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的第一名。

1983年10月，在第二十二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男子体操队首次以591.45分荣获团体冠军。

1984年7月，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共取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创造了中国参加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当然在体育方面也不都是光辉的记录，也有过1985年5月19日，中港足球北京之战惨遭败绩那种留下沉痛记忆的经历。

对于一个饱经坎坷的古老民族，各种不断飞传的体育捷报，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树立自强心和自信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和发明，乃至考古学等方面的新成就，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很有益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每秒运算一亿次的银河一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第九中学一位教师陆宗义，花费二十年的心血，证明了"斯坦纳系列"和"寇克满系列"问题，获得了国外科学界的高度评价。类似的各方面的成就，不胜枚举。

这几年中还开展了一些全国性的社会思想教育活动。如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提倡"五讲四美"；学习优秀科学家罗健夫、蒋筑英；学习劳动模范赵春娥；学习优秀团员张海迪；学习"活雷锋"朱伯儒等。这些活动对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民族精神都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总体上观察，上述这些社会思想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突破过去大搞群众运动的框子，也或多或少地带着形式主义、大轰大嗡的遗痕。因而社会的实际效果也不能不受着局限。如何适应新时期的新需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社会思想政治工作

经常持久地进行下去，尚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索和解决的课题。

精神文明的决议

198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决议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因此，"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决议指出："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决议围绕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对"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和"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等方面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阐述。决议指出：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在“五爱”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人际关系，反对各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注意同封建遗毒作斗争。决议说：“封建道德在我国影响很深，今天我们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特权思想、专制作风、拉帮结派、男尊女卑等，本质上都是封建遗毒的表现。”当然也要注意反对半殖民地的奴化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强调反对“封建遗毒”，这是正确总结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得到提高的新认识。

决议强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决议说：“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是错误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也是错误的。”当然，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同实行学术自由是并不矛盾的。“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最后，决议要求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做两个文明建设的模范”。“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把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专门就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主要内容、指导思想、组织保证等问题，作出明确的理论阐述和原则规定，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三十一章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随着各方面改革进程的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方针的确定，促使人们不能不对中国所处的社会阶段，这个历史大方位问题进行反思和研讨。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关系到基本国情的判定，而且对一系列政策和实践起着指导作用。中共的十三大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突破性的理论探索。

胡耀邦辞职

1987年初，发生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了。这件事是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的。

公报说："胡耀邦同志在会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为什么要在已经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不久，在党中央作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呢？直接原因是由于发生了学潮。上年秋冬，以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游行示威为发端，浪潮很快波及上海、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参加活动的人数虽然仅占全国大专学生总数的1－2％，但也有数万之众。

关于发生学潮的原因，《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认为：“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于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来说，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一次规模并不算很大的学潮，能引起这样严重的后果呢？根本原因在于对问题性质的判定。邓小平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他指出：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他点名批评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文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和

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指出："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要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① 随后，这几个人都被开除出党。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班子，也被改组。

当时还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由政权系统制定相应的法规。如人大常委会于 1987 年 1 月 22 日通过《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一些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等也通过了一些有关游行示威的具体法规等文件。把游行示威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另方面，在中共党内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7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具有特定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核心是否定党的领导"。通知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正确地坚持下去，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继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从总体上说，是对广大党员进行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而其重点"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范围"严格限于党内"。通知中也提到，"要防止以'左'批右"，"坚决避免过去那种'以人划线、上挂下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以及号召检举揭发等'左'的错误做法。""决不允许因为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94、196 页。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

这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各地、各单位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确实不能说没有人想利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掀起一场“大批判”之类的浪潮。不过，由于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因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势虽甚猛烈，但进程比较平稳，解决了一些问题，收到一些成效，同时，也遗留了不少问题。

十三大的准备与召开

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积极进行召开十三大的准备工作。除选举代表、进行人事调整安排等必需的各项工作外，写好向大会的报告历来是准备工作的重点。

为此，新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向中央送交了《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他认为全篇报告的立论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不能倒回去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是害国害民的；二是明确指出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求纯’，必须允许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存在，必须允许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原则长期存在，必须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正确处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他说：“看来，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论，有可能把必须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很有好处，对国内外

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1] 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都同意这个设想。

报告的起草工作就在这个设想的指导下，反复研究、多次修改，历时半年多而完成。1987 年 10 月 20 日召开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审议。

全会还确认 1987 年 1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十三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和《补充通知》进行的代表选举工作，也于 1987 年 8 月完成。实选出代表 1936 名，代表党员 4601 万人。另外，还邀请了 1927 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 61 人为特邀代表，共 1997 人。这样，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准备工作就顺利完成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

大会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上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修改党的章程，选举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的主题则是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由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经过三天讨论后，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从 27 日开始转入酝酿选举。11 月 1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并选出中共中央委员 175 名，中央候补委员 110 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 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69 名。

---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07—1309 页。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江泽民等1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三大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赵紫阳的报告中，首先概述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指出，这九年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较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国家的整个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九年的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面临的挑战是紧迫和严峻的。这样一种国内和国际的特定形势，决定了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

报告着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阐述。报告说，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特定含义，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

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报告明确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报告说：为着实现已经确定的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着重解决三个问题：(1)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2)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基本平衡，合理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3)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而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说，要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加快和深化”。

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主要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充满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任务。

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次代表大会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报告说：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还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有限的。但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逐步实现我们的长远目标。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报告说：“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

报告还对改革和开放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论述。

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理论观点方面的新发挥和发展作了概括。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等等。报告说：“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这次代表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朝着新老合作交替的方向继续向前迈出一大步。原来“半退”的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这次完全退下来。原来在第一线担任要职的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位则采取“半退”的方式，不再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在他们的带动下，

140多位年龄较大的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退下来。这样就促进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年轻化。老一辈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关注中国的政局和发展，不再发挥作用。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中继续发挥作用。邓小平作为中共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没有变。

这次大会有较好的民主气氛。大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记者招待会。不仅新闻发言人向记者发布消息，而且由各地、各部门、各条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出席，直接同记者见面，回答国内外舆论关心的各种问题。使这次大会，无论会内和会外，都有较高的透明度。

第三十二章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交错发展

中共十三大以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加快了进行的速度。

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

政治同经济，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甚。孤立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因此，中共十三大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践证明：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实践也同样证明，现存的具体制度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弊病，主要表现为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还未肃清等等。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但是，达到这个目标是很不容易的，政

治体制改革只能有步骤地逐步进行。

中共十三大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实行党政分开做起的。"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群众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党应当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应当充分尊重而不是包办群众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那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十三大报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要做到这点，既要改变传统的由党直接领导指挥各方面工作的观念，转变党组织的职能，又要改变领导方法。这确实是党的工作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

这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转变，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都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中共国务院直属机关委员会改组为工作委员会，使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党委组织而成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党组，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撤销。党的工作由机关党委进行。逐步撤销中央纪委派驻国务院各部门的纪检组等。

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委员会，也有计划地朝着党政分开的目标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例如，中共辽宁省委员会在 1988 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省委已决定撤销省委和省人委双重领导的农村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原由省委和省人委双重领导的信访办公室、档案局（包括档案馆），划归政府序列，以政府领导为主。省委政法委员会调整职能，省委和省政府直属机关党委改工委，逐步撤销省政府各厅局的党组等。其他省、市、自治区党委也采取了一些类似的措施。

党政分开，并不只是党一个方面在变，政的方面同样也要改

变。这次改革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审议批准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二是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

1987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撤销12个部委，新组建9个部委，保留部、委、行、署32个，新华通讯社转为事业单位。变化较大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合并为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一分为二，成立人事部和劳动部；新组建物资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合组为能源部；航空工业部和航天工业部合组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合组为机械电子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中之电力交给能源部，另设水利部；撤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新组建设部等。此后，国务院的机构又多次进行合并和重组，看来机构改革也需要一个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调整的过程，很难一步到位。

国务院的这次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到1988年底，新组建部已投入正常运行；保留部门"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接近完成，一些部门的深化改革正在进行。据统计，非常设机构从原来的75个减少到44个；司局级机构减少20%多；改编后的定编人员比改革前实有人数减少近一万人。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此后陆续开展。预计要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项更为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但不做好这项基础工作，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稳步而有保证地前进的。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如：以《国家公务员法》为核心建立较为完整的公务员法规体系；在政府部门分期分批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国家行政干部学院和若干个地方行政学院，逐步形成以行政学院为主体的公务员培养体系等。这些工作当时预计要十五年或更多的

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推行企业承包制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在企业。而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则是贯彻实施《企业法》，稳定、完善、发展承包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自 1988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企业法》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企业法人地位，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义务，也明确了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的法律关系，是办好企业的指南。同时，也是给了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

企业承包制，经过几年的实践，范围不断扩大，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威力。到 1988 年 10 月，全国预算内的工商企业承包面已超过 90%，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达到 95%。1988 年 1—10 月，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1.1%，销售收入增长22.3%，实现利税总额1282.8亿元，比上年同期净增 185 亿元，增长16.8%。同时，资金运转加快，百元销售收入占用资金率有明显下降。但同时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

在此基础上如何使承包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呢？1988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需要做好六项工作。即：(1)广泛引入竞争机制，优选经营者。(2)积极推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使经营者的风险和全体职工的风险紧密结合起来。(3)继续推行并完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使职工工资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本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4)选择一些产品供求大体平衡、价格不是由国家统管、产品不是国家专营的企业，进行放开经营的试点。(5)强化企业管理，推进

技术进步。(6)进一步研究解决承包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改革劳动制度,优化劳动组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截至1988年10月底,国有企业中的合同制工人已达805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8.3%;另在26000个国有企业中,有960万固定工进行了优化劳动组合。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长期以来职业终身制的"铁饭碗"制度开始动摇,给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习气以有力的冲击;二是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不增人、甚至减人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减人增效的好现象。1988年上半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054元,比上年同期提高8.8%,而职工人数却比上年减少39万人。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富余人员的安置问题。据专家的初步推算,在全国企业基本实现优化劳动组合后,"剥离"出来的剩余人员可能多达1000多万人。如何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已成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股份制试点问题,也已经提上日程。自全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于1984年成立之后,全国掀起一股公司热。据报载,浙江省温州市出现5万多家股份制企业,但其中多数是小作坊,搞的是50年代初级合作社式的入股、合股。严格说很难称之为真正的现代意义的股份公司。上海,到1988年9月底,已有1250家企业发行股票9亿多元。但其中大多数是内部股票,形态比较低级,也不正规。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线材公司搞了股份制试验。线材公司全部资产1.49亿元中,鞍钢为1亿元,占67.1%。其余4900万元是职工以股票形式等筹集的。但这种股票红、利并存,不能自由买卖,也没有什么风险,近似有价证券。到1988年底,全国比较像样的股份制企业约6000家,股份集资约60亿元。

总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有待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检验。

农村经济巨变

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进行，十年走了两步。第一步实行包产到户，建立以个体农户占有生产资料、独立经营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经济关系，为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重要前提。第二步，从1985年起实行取消农产品派购统购制度的改革，市场调节范围大大扩大，又为农村发展商品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变。

这种变化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变了农村经济"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结构，真正实现了农林牧副渔和乡镇企业的全面发展。1987年，全国农村的非农业产值已达4756亿元，比1978年增长6.4倍，超过了农副业的总产值。十年来，乡镇企业以每年递增20%的高速度连续增长，吸收了近9000万劳动者就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贸易市场总数达到7万多个。此外，还有1500多万农民到城市从事各种工作，形成了一股移动的打工浪潮。第二，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大幅度提高。1987年的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已由1978年的45.2%提高到58.2%。每个农业劳动者每年平均向社会提供的粮食为416.4公斤，棉花13.2公斤，水产品21.6公斤。这些数字比起发达国家农民提供的数量还是很低的，但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两方面的情况说明，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开始走上了商品经济的轨道。与之紧密相联的农民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中共中央、国务院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认

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的指导下,在改革的推动下,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十亿人民的温饱问题。贫困线下的农民数量逐年减少。1987 年底,人均纯收入不满 200 元的农村人口已下降到 7064 万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8.24%。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已减少到 36 个。但是,当前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特别是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在 1984 年登上新的台阶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因此,这次会议强调:一要加深对农村基础地位的认识。二是逐步推进和深化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工作包括:(1)稳定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注意发展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实行不同层次的、各个环节上的联合与合作。(2)加强对主要农产品和重要农用生产资料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3)逐步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的改革。(4)从实际出发,逐步而又稳妥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七届人大的召开

改革的拓展和深入,要求有相应的立法。而这时召开的七届人大,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88 年 3 月 25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 2970 人,其中各少数民族代表 445 名,占代表总数的15%,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女代表 634 名,占代表总数的21.3%。代表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有了改善,代表的素质有所提高。此届人大代表与前不同的是经过差额选举产生的。差额虽然不大,但所有代表都无一例外的经受了一次民意测验,增强了"行使人民委托权力的"代表

意识，也是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次推动。

大会由执行主席万里宣布开幕。代表们首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确认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接着由李鹏代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李鹏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1)过去五年国内工作的基本总结；(2)今后五年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方针和任务；(3)关于外交工作。

报告说，五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改革逐步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领域展开，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关于今后五年的任务，报告说：要加快和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第八个五年计划。到1992年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年增长7.5%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就可以为在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打下牢固基础。为此，报告提出必须努力完成十项任务。即：(1)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加快科学技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把经济建设切实转到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3)以深化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逐步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4)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5)切实搞好政府机构改革，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严肃政纪法纪；(6)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7)大

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8)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认真贯彻实行计划生育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两项基本国策;(9)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城乡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0)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

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审议,并提出了大量议案和批评意见。代表们就增加透明度,保证决策民主化;发挥监督作用,消除腐败现象;报纸要敢于批评并刊登不同意见;加强文化教育建设,制定总体远景规划;重视和做好接待台胞的工作;从实际出发实施沿海发展战略;采取过硬措施增加粮食生产;广开门路增加教师收入;增加文化事业投资,注重儿童教育;端正党风关键是要接受群众监督,转变党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在十分广阔的领域,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有些意见提得很尖锐。

在历时十五天的会程中,审议和通过一批重要法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关于198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8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等,以及其他有关议案。这些法案和决议的通过,对促进和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最后进行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选举。

杨尚昆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当选为副主席。万里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邓小平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

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决定李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任命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为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十三章

经济过热与治理整顿

在七届人大后不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经济生活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情况迫使领导者们不得不调整原来的建设计划，而采取新的对策。

困难严重险象环生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事业的突飞猛进，更是令人瞩目。但是，这种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新事业，无现成经验可遵循，只能在坚持大的方向和原则的前提下，在探索中前进。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失误及其他原因，时常会出现种种困难和混乱现象。也许是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这种情况是在新旧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从 1988 年下半年显示的种种迹象说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险象环生的集中表现是通货急骤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较上年上涨 6%，1987 年又上涨7.3%，1988 年 1－9 月又上涨

16%，而其中 32 个大中城市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涨达18.3%。这是各商品价格平均的总指数。其中有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一日不可缺少的物品如蔬菜副食等，则处于这股涨风的浪尖上。据有关部门统计：蔬菜价格在 1980—1986 年间涨价1.3倍，1987 年较之1986 年又上涨 16%。其中 29 个大中城市 1987 年 12 月较上年同期上涨44.6%，涨得最高的广州是 110%。到 1988 年 2 月底，春节前后，35 个大中城市的菜价又比去年同期上涨48.7%，其中上涨50%以上的有北京、上海、沈阳、长春、青岛等 21 个城市。其中某些副食品如带鱼，涨价 10 倍，对虾、螃蟹等更贵得一般平民不敢问津。这种物价上涨风终于导致 1988 年秋波及全国相当多地区的群众性抢购风，连食盐、洗衣粉等日用品也一时无货可卖，一些残次电冰箱、电视机也有人抢购，结果更助长了物价上涨和流通领域的混乱。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物价涨风呢？报刊上有各种议论，但有三个因素是大家都同意的。这就是：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膨胀，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允许的限度，导致需求过旺。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宏观失控的集中表现。据统计，从 1981 年到 1987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平均每年 22%的幅度增长，大大超过了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截至 1988 年 8 月止，全国在建的各种项目达 47344 个，投资总额在 7000 亿元以上。而当时国家年财政总收入只有 2500 亿元左右，大大超过国力。建国以后，曾有多次急于求成、盲目扩大投资，以致基本建设战线太长，最后不得不被迫下马，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可惜这些历史教训没有得到某些领导者的重视和吸取，以致一再重犯历史上的老错误。

第二，消费基金膨胀。这里包括两个方面，(1)职工工资年平均

增长总额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83—1987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1%,而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增长16.4%。这里还未包括实际上已成为固定收入来源的占工资总额25%以上的工资外收入。(2)社会集团购买力膨胀。新华社记者说:“今年(1988年)2月,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今年社会集团购买力务必比去年压缩20%。然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消息是: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集团购买消费品达368.3亿元,比去年同期高速增长19.8%。这似乎恰好与国家要求来了一个颠倒。368.3亿元这个数比今年全国教育经费和城市维护建设费还多27个亿。”集团购买力是中国(也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关系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最尖锐。

第三,流通领域的混乱和“倒爷”的趁火打劫。随着流通领域和市场价格的放开搞活,全国兴起一股“公司热”。到1988年秋,全国已有各类公司约40万个。当然有许多公司是社会需要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但其中确有不少公司是在流通领域买空卖空,层层渔利,“一支羊扒五张皮”,导致价格成倍上涨。特别是一些“官倒”,利用职权,垄断物价,任意抬价。利用物价暂时存在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轨制的差价,大赚其钱。不仅加大了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而且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造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搞乱了经济秩序。

经济秩序混乱的突出表现,是抢购原材料的各种大战。《人民日报》记者在一篇题为《纺织原料大战何时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近两年,在纺织原料流通领域,各种‘大战’此起彼伏,‘兔毛大战’和‘苧麻大战’刚刚平息,‘羊毛大战’又逐步升级,‘蚕茧大战’愈演愈烈,‘棉花大战’危机四伏。旷日持久的原料抢购战,造成资源和生产力的浪费,干扰了经济正常秩序的建立,这个问题值得

严重注意。”

在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的环境中，任何改革都无法顺利进行。而且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忆犹新，如果物价稳定不住，也难以稳定住人心。对这个问题确实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经过选择后的决策

涨价，自然不是改革的目的；但在改革旧的扭曲价格的过程中，某些物价上涨，又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如何既搞好经济体制改革，把价格理顺；又使物价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改革的继续推进，就成为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必须慎重进行的工作。然而不管如何难，改革总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只是要求决策者们更谨慎周密的思考和选择罢了。

1988年8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次会议上虽然已经看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提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厉行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认真清理和整顿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等，但总的精神是强调：“我国已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要奋力闯关。”说明中央领导人当时对消极方面的严重性，认识还是不够的。

时隔一个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许多地方发生严重抢购风的冲击下，头脑冷静了许多。会议听取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报告。

报告说：“我国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幅度过大。""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上面的原因主要是手软，抓得不实；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条教训不允许再重复。"

赵紫阳说："如果今年初抓紧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更好一些。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当然，现在解决还来得及。如果再犹犹豫豫，当断不断，那就会出大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坚决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机立断，下最大的决心，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治理经济环境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当时提出四条：第一，压缩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989 年要压缩 500 亿元，只能多压，不能少压。第二，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同时，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工业增长速度降下来。1989 年工业增长速度要降到 10%以下。

"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办法提出五条：一、坚决刹住乱涨价风。二、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认真解决多头和多环节经营的问题。四、加强宏观监督体系。五、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

报告说："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

全会审议批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艰苦奋斗，增产

节约，努力完成这次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

成效与矛盾双向并存

总理李鹏在1988年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到目前为止，党中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已经发布了五个方面，十五项具体的条例、规定、决定和通知。"如《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和稳定金融的决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化肥、农药、农膜实行专营的决定》等。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使群众都知道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人民日报》在10月28日的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了赵紫阳在三中全会上的报告。同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的，长达二万多字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的宣传参考提纲》印发给各地区、各部门宣传学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11月在湖北考察工作时指出：要密切结合经济领域的整治工作，以坚决的态度认真查处严重违法乱纪案件。政治工作要继续抓紧，决不能放松。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为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988年11月底，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两个会议联合举行开幕会，由总理李鹏主持，副总理姚依林作了题为《认真贯彻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安排

好1989年计划》的报告。李鹏说：经济过热、需求过旺的势头，现在还没有得到制止。为了保证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有不少的矛盾，难度比较大。因此，他要求这次会议首先解决好认识问题。姚依林在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困难估计还不够，对治理通货膨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还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因而有些地方和单位还在等待观望，敷衍应付；多数地方和单位则表现为决心不大。他希望各地区各部的同志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从行动和措施上真正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搞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经济改革的工作。

经过一系列会议、决定和各方面的实际工作，到1988年底，治理整顿初步取得若干效果。例如，工业生产开始从过高的速度上回落，停建缓建了一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储蓄存款有所回升，某些流通领域的异常现象有所改变等。其中收效比较明显的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国务院派出10个检查组去各地检查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工作。据他们在1988年12月上旬回京汇报，到11月底，全国已停建缓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10220个，压缩投资规模334亿元。但是，压下来的规模离实际需求还很远。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也在进行。有些省市撤并了一些公司。但离中央要求的整顿目标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在中央一级，尚有待继续努力。货币投放过多和物价上涨过快问题仍然很突出。

对违法乱纪案件的查处，全国都在进行，而且不时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揭露。其中有些案情确乎骇人听闻。例如，深圳破获的“1.25”受贿放私大案，涉及海关人员20多名，受贿金额数百万港元，放私之尼龙布、香烟、棉纱、生丝、兔毛等价值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其中受贿最多的原文锦渡海关秘书科胡少坤一人就达人民

币45.7万元,港币57.9万元。如此大案实为建国后所罕见,可见腐败之风侵蚀之深重。不过比起后来的大案,这个案件又只能算是小巫了。

在犯有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中不乏共产党员。例如,从1983年到1987年底,受到各种处分的共产党员共有65.6万人,其中15.3万人被开除出党。另据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1987年因各种原因被劝退、除名和开除的党员共有10.9万人,其中包括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30多名。虽然从党员的总数看,比例不大,但绝对数已相当惊人,而其恶劣影响绝不可低估。

第三十四章

新领导班子在战胜风波中诞生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但中国没有出现不久后东欧出现的那种“雪崩”现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相应对策，调整了自己的领导班子，坚定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胡耀邦逝世与风波骤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病逝。中共给予他的评定，可在悼词中显示出来：“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人民解放军的杰出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的逝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都是巨大的损失。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胡耀邦家中祭奠。

4月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胡耀邦追悼会。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4000多名代表肃立着，向胡耀邦遗体致哀。从头晚起就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数万首都高校师生和其他群众，从高音喇叭中收听追悼会的实况。大江南北

亿万人民也在收看电视现场直播，同表哀悼。

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是正常的合理的行为。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了这个时机，使酝酿已久的准备于“五四”70周年时发动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学潮从北京迅速扩大到很多地方，有上百万的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并引起社会动乱。这场动乱逐渐蔓延，扩大和升级，一直延续到6月初。引起这场大政治风波的原因相当复杂，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有忧国忧民的，也有别有用心的，甚至有人是蓄谋推翻党和政府，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排除了种种干扰，顶住国际的巨大压力，分析了形势，作出果断的决策，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迅速恢复了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

四中全会与新领导班子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6人。列席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84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68人，有关方面负责人29人。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3天扩大会议，为四中全会作了必要的准备。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会议肯定他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严肃指出，他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

作中也有明显失误。主要失误是:"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鉴于上述情况,四中全会决定调整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

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一切职务;

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这样,就建立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全会后,新领导班子强调,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要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党的建设,锐意进取,奋勇开拓,妥善处理国际国内的许多重大问题。

1990年,中国从动荡逐渐走向恢复和稳定,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经济方面,实行治理整顿,控制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有较大幅度回落。农业丰收,工业逐步回升,进出口贸易持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整个经济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扫黄"、"除六害"的斗争。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积极推进廉政建设方面也在此时起步。此外,中共更提出注意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注意在中共的领导下

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的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也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1990 年，中国将五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创造了航天史上的新业绩。中国成功地举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朋友云集，打击了国际反动势力孤立中国的图谋，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声誉。

新的十年发展宏图

1990 年岁末，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这是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勾画了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蓝图。

《建议》包括七个部分，即：(1)主要奋斗目标和基本指导方针，(2)经济发展的产业重点和地区布局，(3)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任务和政策，(4)改善人民生活和健全社会保障，(5)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任务和措施，(6)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7)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而奋斗。全文共 72 条。

文件虽长，但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总结了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议》中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把它概括为 12 条，即：

(1)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2)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3)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4)采取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形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5)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它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6)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7)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8)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9)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10)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11)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12)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明确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1991 年到 2000 年，要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基本要求是：

(1)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 1980 年翻两番。实现上述目标，要求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6%左右。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2)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富，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3)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 21 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和技术基础；

(4)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也要进一步健全。

这个目标既包括了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要求，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这个目标既是鼓舞人心的，又是现实的，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

第三、进一步明确了十年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概括起来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改革要深入，开放要扩大，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讲话中指出：本世纪最后十年是非常关键的十年。我们要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事，对此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急迫感。当前世界政治风云多变，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中国的经济建设能不能搞上去，综合国力能不能大大增强，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按照中共的基本路线和七中全会确定的奋斗目标，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

第三十五章

再掀新高潮

90 年代之初，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峙的局面随着苏联瓦解而消失，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引起巨大的思想震荡，直接关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中国需要新推动

90 年代之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是相当严峻的。发生于 1989 年的“六四风波”，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地败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西方势力掀起反共反华的声浪，出现某些抵制和制裁中国的活动。如 1989 年 7 月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宣布要对中国采取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和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多项制裁措施。随后发生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东欧剧变和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突然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虽然这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骨牌效应已经波及中国的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但终于停止在中国的国门之外。社会主义的中国仍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但受到的压力之巨大而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从当时的国内形势看，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不仅"六四风波"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后遗症，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被扼制，遭到批判和否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潮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一时之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非难之声四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企业法》和《破产法》，被指责为瓦解破坏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深圳等经济特区被丑化为"引进帝国主义租界"，是使沿海开放地区"香港化"；有人反对引进外资，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仍然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不少人仍习惯于一种旧的思维方式，凡事不问大小、性质，都要先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这种传统"左"倾思潮的变态复发，形成为一种新的精神枷锁，束缚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中国经济经过治理整顿，虽然总体上仍在继续发展，但是出现了一种明显减慢的态势。1985—1988 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10.7%，而 1989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只增 4%。1990 年比上年增5.3%。1991 年比上年增6.5%。而经济发展减慢的消极影响是，既削弱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奋发向上的势头，又在社会生活中造成负面影响，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等等。同时，也加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差距。

造成这种减慢态势的主要原因：一是城乡个体工业增长趋势降低。按以上年为 100 的环比指数，1986—1988 年增长为 147—167 之间，而 1989 年减为123.77；1990 年为121.11；1991 年为124。说明个体投资者的积极性已经受到影响而降低。二是公有制

以外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趋势降低。按上年为 100 的环比指数,1987 年和 1988 年均在 160 以上,而 1989 年降为142.68,1990 年又降为139.33,1991 年略有恢复为150.11,但仍低于前几年。三是外资投入减少。签定利用外资协议总金额,1988 年为160.04亿美元,1989 年降为114.79亿美元,1990 年为120.86亿美元,1991 年又回升为195.88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减少幅度最大:1987 年为78.17亿美元,1988 年为98.13亿美元,1989 年为51.85亿美元,1990 年为50.99亿美元,1991 年为71.61亿美元。这些说明西方的制裁措施已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发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而当时的中国,从上到下普遍对这种严峻局势的消极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一本书这样评说:“翻遍此时北京的各种报刊,阅遍听遍北京的各家广播电视,多的是自我欣赏、自我鼓励的报喜之声,少的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面临挑战的危机感和励精图治的奋斗精神”。这就是说,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提出了一种强烈的要求,必须给改革开放的势头以新的强而有力的推动。

邓小平南方讲话

1992 年,历史确实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许多国家的有识领导人都在考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保持和谋求应有的位置,竞争十分激烈。而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改革开放,又经历三年治理整顿之后,虽然各方面的成就很显著,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低下等老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摩擦日趋激烈,改革面临困境,有人又出来主张重走老路。中国怎么办?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出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发表了关键性的讲话。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他到中国南方城市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各方面的工作时，再一次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

针对"左"倾回潮，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人们心目中的重大问题呢？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是非的新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明确回答："特区姓'社'不姓'资'。"②

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也批判了“左”的思潮，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②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邓小平一路上反复强调的问题。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③

邓小平还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加速培养科技人才；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搞好党的建设，学好马克思主义，掌握实事求是这个精髓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

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思想观念的大变化

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从外地传回首都北京之后，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巨大的震动。中共中央政治局迅即专门开会讨论，并决定将邓小平讲话作为中央2号文件发向全党，指示全党认真学习讨论。全国迅速形成了学习贯彻这一讲话的热潮。

1992年5月，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对中国探访，问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告诉他，最大的变化是思想观念的变化。确实，邓小平的讲话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又一次大转变和大解放。因此，人们把它同从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变并列，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人们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体现在哪些方面和问题上呢？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

(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建国后40多年发展的崎岖曲折促使人们深思，50年代之初大体上处于同一经济起跑线上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边？是什么妨碍我们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东欧八国的骤变和苏联的顷刻瓦解更使人们受到强烈的震撼，在既无坦克又无硝烟的和平环境中，一个令欧美生畏的世界强国和一个似乎牢牢不可破的庞大阵营，为什么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荡然无存了呢？新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范本建立起来的，现在范本本身都不能存在了，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就在人们普遍思索、困惑以致迷茫的关键时刻，邓小平

的讲话令人耳目一新，思想上豁然开朗。失败了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只是一种以苏联为代表的不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得住实践的考验。这就告诉我们，必须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冲破僵化的旧观念，解放思想，创造出理想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创造性新模式的出现，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基础。

（二）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左”倾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种顽症。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的最大磨难莫过于“左”。两次全局性的大灾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上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经过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多数人对“左”的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长达 20 年“左”倾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也由于中国有滋生“左”倾思想的丰富而适宜的土壤，一遇风吹草动就往往旧病复发。“六四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反弹，导致的“左”倾回潮就是一个实例。邓小平的讲话有效地扼制了“左”倾回潮的势头，这对中国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三）大幅度地增强和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个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但是，在 90 年代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却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矛盾”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要求集中力量去进行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有反对“企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按照这样

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然要受到严重冲击。基本路线必然会动摇。六十年代的教训，前车可鉴。

改革开放的新举措

1992年3月9—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讲话，并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思考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和战略部署。接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分别召开会议，学习讨论邓小平讲话，并在实际工作中作出调整。首先是国务院各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门，围绕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首先从思想观念到作风，然后深入到本部门的职权范围，进一步深入改革，转换职能。例如，国家工商局清理了本部门1979年1月以来发布的327件规范性文件，认定其中60件应予废止或认定为自行失效，占全部文件的18%；另有37件准备根据新的情况作修改。商业部废止73个与新形势要求不相适应的文件。其中包括原来禁止外商投资国内零售商业领域的规定，并同意在开放的11个城市搞试点；粮食省际流通可以不再经过中央调拨，实行计划指导，自由经营等新举措。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起，全部取消进口调节税。中央为支持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又给上海扩大五类项目的审批权和增加五个方面的资金筹措权等。

非经济部门也加大了改革进程的力度。如组织部门提出选拔和配备干部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以能否推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为考核干部的主要标准，重用大胆改革、政绩突出的干部。宣传部门要求加大改革开放宣传的分量，突出经济建设中心，为之鸣锣开道。科学技术界要求在保留、支持和发展少数真正高水平的基础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力量组织动员到发展国民

经济上去,等等。

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转换中十分重要、十分敏感而影响面又广,是一个关键环节,现也迈出了一大步。国家物价局推出了两项改革新举措:一是修订和重新颁布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目录,放开一大批生产资料价格,由 1991 年底国家管理的 737 种,减少到 89 种,大大缩小国家管理价格的范围。二是宣布从 1992 年 9 月 1 日起,取消原油、铁、钢材、铜、铝等十多种计划外生产资料全国统一最高出厂价或销售限价。这项举措有利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有利于把企业推向市场,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方面,上面只是列举其要者。而这个高潮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则是确定了中国经济的新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集中谈。

第三十六章

经济新模式的确立

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引起人们思考和争论的经济模式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终于趋向统一，一种新的经济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被确立了。

社会主义观念的新突破

在全国学习邓小平讲话和改革开放的高潮时刻，总书记江泽民于 1992 年 6 月 9 日到中央党校，给省部级班学员、中央党校的部分领导干部和教授等共 100 多人作了重要报告。报告会由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乔石主持。

江泽民报告的主题是"如何更深入地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的讲话。"他就如何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速发展；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两手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右和"左"；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等八个方面，对邓小平讲话作了全面系统地阐述，并对其中若干重要问题加以深入分析和发挥。

这篇报告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新模式。江泽民指出: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关键。要建立起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离不开完善的市场。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在观念上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市场是一种比较好的资源配备方式。过去大家对市场的认识有片面性和偏向,应该改变。当然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有时还要计划去发挥作用。

对于如何科学地概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新模式,江泽民指出目前有三种提法:一种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需要明确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科学提法。江泽民明确说,他倾向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他问坐在身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是什么意见?乔石说,他同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江泽民报告后,立即组织与会人员分组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提法,当然也有个别人表示了异议。

7月11日,《经济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的文章,新华社向全国作了转发,不少报刊加以转载,从而引起了全党和社会上广泛的注意。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提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新闻媒介上和学术著作研讨中,为新经济体制的确立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中共十四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12—18日

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大会听取和审查了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报告分为四个部分:(1)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2)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3)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政策;(4)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代表们审议后一致通过。大会还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审查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选出中央委员189名,候补中央委员130名;选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名。

这次代表大会的突出之处是:

(一)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作出了目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应分三步走,即是80年代初确定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

和依靠力量问题上，既强调了领导核心的改善和加强，又强调了依靠力量的广泛性；在祖国统一方面，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这是第一次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初步阐述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总纲，使它具有党的最高法规和权威。

（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一个新目标模式，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重大突破。这种新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经济规律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当然，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要给予充分重视。

报告指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

党的十四大在组织上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大会充分肯定了顾问委员会这一组织在干部新老交替过程中的作用，并向中顾委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重要论述和决定，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无疑将发生重要的影响。

国家领导人的调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决策，但这种决策只有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能变为国策付诸实施。为此，于1993年3月15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代表2989名。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了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出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1)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充分肯定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失误；(2)说明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必须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步伐。为此建议把原定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每年6%提高到8%－9%；(3)着重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步骤和重要措施。报告中也谈到政府机构改革，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赞同和大会的批准。这样，就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这届人代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改选和任命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大会接受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推荐候选人名单，并选举：(1)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前届共和国主席杨尚昆；(2)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接替前届共和国副主席王震；(3)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接替前届委员长万里；(4)大会通过任命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李鹏继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接任副总理。上届的三位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全部去职。其他国务委员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也有较大的变动。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机构的决定》等重要法规。

几乎是在同时，3月14—2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内容与全国人大基本相同。会议选举李瑞环为全国政协主席，接替原主席李先念。对副主席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是国民经济体制的转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有步骤地积极为过渡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方面采取的举措很多，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重大举措是，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总结本国已有的经验、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使这种新经济模式从理论上和可操作性方面尽可能的系统化和具体化。《决定》分为10个部分，共50条。即(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2)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培育和发展市场体制；(4)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制；(5)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6)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7)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8)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

教育体制；(9)加强法制制度建设；(10)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决定》强调，当前要紧紧抓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在金融、财税、外资等重点领域搞好改革，制定具体方案、采取切实步骤，力求取得新的突破。

又一项重大举措是实行分税制，代替原来实行的分级负责的大包干体制。实行分税制的具体内容是，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和调动两个积极性的原则，将各种收入划分为三种：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的收入。对于地方财政固定收入加上分享收入小于基数的部分，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对少数民族地区给予适当照顾。这项改革从1992年起，先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大连、重庆等九个省、区、市试点，然后逐步推向全国，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套财税系统。经过3年努力，这项财政改革已经完成。

中国运输的大动脉铁路系统，也从1993年开始运输价格的重大改革。改变了多年不变的单一的计划价格，在铁道部规定的统一价格的基础上，授权地方根据运输市场的不同情况，实行多种价格，包括特区特价、优质优价、季节流动价格、合同价格等等，以便使铁路尽早进入市场，参与多种运输方式的竞争，获得经济效益。由于铁路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项改革必然是影响经济全局和社会生活的一项大变动。

同国际经济接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方面中国也作了很大努力。如：1993年8月2日，国务院作出中国加入1970年在华盛顿签定的《专利合作条约》。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成为该条约的正式成员国，中文也成为该条约的正式工作语言。从此，中国的专利发明人可以在全世界61个国家中申

请并保护自己的专利。又如，1993年底，中国大幅度地调整了进口关税，降幅为8.8%，即将进口关税水平由39.9%，降至36.4%。以后又陆续调低关税，到1997年10月1日，进出口总税率已调低到17%多一点，预计到2000年可降低到15%。这既是向世贸组织要求的税率靠拢的一个步骤，也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总之，多种举措都是为实现同一个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而作出努力。

文化建设的加强

新经济模式的实现，绝不是靠经济增长的单项运作就能够完成的。人们的理想、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经济模式的内涵和运作。所以，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很重视。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各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一）学习邓小平文选。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卷由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为开篇，以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为结束篇。中共中央专门通过《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并于11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报告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

定》,并由总书记江泽民作了报告。他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同第二卷相衔接,是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总结,是引导大家继续前进的科学指南。全国都要很好地学习,充分理解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1994年11月,已经出版的两卷《邓小平文选》,经作者本人同意,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后再版发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邓小平著作集。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指导下,全国兴起了持久的学习邓小平著作的热潮。

(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制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纲要》指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引导和凝聚到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贡献上来,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团结奋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全国广泛开展,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加强共产党的建设。199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要求全体党员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遵守法纪,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第三,按照党章规定严格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在改革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只有这样,党才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带头、骨干作

用和模范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目前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需要持久的努力奋斗。

第三十七章

经济软着陆的实践

所谓“软着陆”是借用航天技术的名词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形容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热和扩张之后，又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的区间，犹如航天器平稳地降落到地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在90年代前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经济过热与宏观调控

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后的精神鼓舞下，人心振奋、热情高涨，积极投入，使中国国民经济在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基础上，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3.2%，进入1993年国民经济仍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这是积极的主导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处于低水平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高资金投入，而不是主要依靠高技术投入。这种经济模式本身有很大的弱点，就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需求的迅速扩张、资源的高消费和资源的“瓶颈”制约。其结果往往是“一热就乱”。由于“资金饥渴症”的作用，金融秩序混乱表现最为突出。有人把这次过热的特点，概括为“三乱三热”，即：

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炒股票热。还出现了高投资、高货币投入、高物价、高进口的“四高”等不正常现象。结果导致物价的急剧上涨。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 1990 年为 102.1，1991 年为102.91，1992 年为105.4，1993 年急升为113.2，超过两位数。这种经济运行失衡的苗头，1992 年底已经出现，1993 年上半年已经较明显。中央及时发现这个问题。1993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 16 条措施。但由于很多干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思想上产生误差，也由于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接的过程之中，加以经济运行本身的机制，高投入的后果短时难以消失等因素，1994 年物价继续升高。1994 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21.7，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为124.1，是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理顺价格、调整产业结构，加速与国际经济接轨等，物价在一定幅度上涨一般说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物价总水平持续在两位数的高位上涨，影响群众的信心和积极性，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逐步建立。因此，主要以经济手段并适当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是必要的，实践证明这也是行之有效的。

有成效的金融整顿

金融整顿从 1993 年 6 月 2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接着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和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

1993年12月初，国务院又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先后作了重要讲话。江泽民特别强调：经济发展要有新思路，要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能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的老路。这次会议对全国经济发展作了总体上的规划和安排，金融整顿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会后，经济计划、体制改革、财政、经贸等专业性的会议也陆续分别召开，有力地推动了1994年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和健康发展。

金融整顿采取了哪些措施？举其大者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整顿金融机构和金融秩序。1993年6月的指示中，对政府官员的经济活动和金融机构的运作，作了若干明确规定。9月，国务院又就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发出专门通知。并重点抓了几件震惊全国的违法大案。如：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案。仅1992年6月至1993年初8个月，该犯等就在全国17个城市，以高达24％的高额利率为诱饵，集资人民币10亿元，酿成建国以来罕见的金融大骗案。经检察审理，1994年3月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沈太福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依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决，于4月11日将沈太福处决。同案犯11人，包括高级干部1人，均受到法律严惩。又如：河北省衡水银行诈骗案，是一起涉外大案。两名美籍华人梅直方和李卓明，经人介绍认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副行长赵金荣和徐东国，以文字材料和言词骗取两位副行长的信任，赵、徐二人竟擅自与梅、李二人签定了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的协议书，并越权在200张总金融为100亿美元，一年期，不可撤销但可转让的备用信用证上签字。这件发生在1993年4月的金融大诈骗案被迅速发现，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没有造成现金损

失。但金融秩序之混乱可见一斑。这两位胆大妄为的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副行长均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案人犯也受到应有的惩处。

经过一年多的有效努力,金融秩序有明显好转。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被取缔,有些机构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国家专业银行清理回收的违章拆借资金多达830多亿元。全国金融形势日趋稳定。

(二)固定资产投资受到控制,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增幅有所回落。1994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8.5%,增幅比上年回落近30个百分点。从国有单位投资结构分析,(1)严格建设项目的审批管理制度,新开工项目比上年减少近二成;(2)加大了对重要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保证了重点建设项目的较快进展;(3)地方项目过度扩张的势头有适当遏制。这就使交通、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良好效果。针对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形势,根据中央决定,从1994年初开始实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全年货币投放量低于1800亿元的计划指标,贷款规模基本控制在5200亿元的计划指标之内。这种双控的方针有利于扼制通货膨胀,保持金融秩序的良好。

(四)提高利率,促进居民储蓄。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93年5月15日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从1.8%提高到2.16%,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上调2.18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贷款利率也作了适度上调。7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决定提高人民币存款的利率,活期存款利率提高到3.15%,定期存款利率平均上调1.72个百分点,并对3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实行保值。这对限制贷款、特别是刺激居民的存款积极性,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上半年居民储蓄存款净增2932亿元,比1993年同期

多增加1688亿元。1994年还发行国库券1028亿元。2700多亿元民间游资纳入国家财政金融渠道，对抑制通胀、稳定金融是一个重要的良好因素。

（五）搞好对外贸易，改善国际收入状况。随着国际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国际收入如何，对国有财政金融的影响日益增大，使金融整顿不能只在国内孤立进行。1994年初实行汇率并轨，对促进中国商品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起了重要的作用。1994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其中，出口总额121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9%；进口总额11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大体平衡略有结余，扭转了上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格局。

有人形容1994年的中国经济是在“黄灯区”运行。已经走出“红灯区”之后，经此过渡，正在驶向“绿灯区”。

反腐倡廉的初步成果

经济过热现象之发生，固然有经济转型的若干客观因素的作用，但少数干部铺张浪费、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的行为确在其中起着火上浇油的坏作用。这种消极腐败现象，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中央在加强对经济调控、金融整顿的同时，也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

1993年初，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部实行合署办公，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职能相同的两个机构合二而一，并把反腐败确定为合署办公后的第一个工作重点。两个机构的人员和精力，统一指挥和使用，狠抓大案要案，有力地增强了反腐败的专业力量。1994年11月，又经中央批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反贪

污贿赂总局，并在各级人民检察院中设立了相应机构，使全国从上到下有了专门检察贪污腐败的机构，方便了群众的揭发举报。

1993 年 8 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会指出，反腐败是长期的、艰巨的，又是紧迫的。既要有打持久战的决心，又要抓紧进行，有步骤地在近期取得阶段性成果。当前要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党政机关干部带头廉洁自律；二是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三是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此后，有关部门又陆续发出一系列规定，如：《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关于治理乱收费的规定》等，使反腐败开始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从 1993 年到 1996 年四年中，全国共处分共产党员、干部 50 多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15690 人，地厅级干部 1333 人，省部级干部 30 人，挽回经济损失 142 亿元。影响和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案，他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并移送检察机关处理；还有与陈希同密切相连的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严重腐败案；有严重腐败导致整个市委改组的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案；有贪污受贿的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姜巍案等。虽然阶段性成果比较明显，但必须看到，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离中央和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败工作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经济软着陆成功

在宏观调控的各种措施陆续推出并付诸实施之后，中国经济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到1996年下半年，终于行驶到“绿灯区”。国民经济发展从超高速逐渐有所回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994年为11.8%，1995年为10.2%，1996年为9.7%。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亚洲经济8%的平均增长速度，说明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而物价上涨幅度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全国零售物价上涨指数从1994年21.7%的高峰回落，1995年为14.8%，1996年剧降为6.1%，达到可以接受的一位数的水平。

既要使经济快速增长又要使通货平稳而不膨胀，历来被普遍认为是很难两全的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要在保持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使经济快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此次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开创了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避免大起大落，同时又使经济结构明显改善的范例，获得国际上的普遍好评。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在1997年9月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年会开幕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努力中绝对是个轴心”，“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记录极为出色。”他还撰文发表在9月19日《亚洲华尔街日报》上。文章中说：“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非凡特别的事变成了例行之事，不可能的事，也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和做出一些努力就能办得到的事。”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亚洲基金会，在该会年刊《1997—1998太平洋经济展望》的有关中国部分中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在1992年达到高峰后一直在降

低速度，以克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目标已在1996年实现。”“现在看来整个经济是平稳的，这一点证实了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已获得成功。”该年刊认为：“软着陆得以实现是因为政府适当收紧了财政和货币政策。”该年刊也同时指出：“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中国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中央政府必须坚持适当严格地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以防止再次出现通货膨胀。”这样的评价和认识，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和适当的。

第三十八章

普庆港澳回归

1997年有一件使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欢欣和自豪的盛事，就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稍后，又在1999年实现了澳门的回归，彻底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这是在共和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光辉一页。

回归之路曲折而漫长

香港是近代中国状态的重要晴雨表。香港沦丧是中华民族衰落和苦难的开端。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在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迫下，签定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香港沦为殖民地。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御外侮，争主权，流血牺牲，历届政府也尝试收复香港。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收复香港的尝试都未成功。

而香港的回归则是中国独立昌盛的重要标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多次庄严声明，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

一历史遗留问题，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确定“暂不收回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方针。1963年8月9日，毛泽东会见到中国访问的索马里共和国总理舍马克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香港部分是割让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但毛泽东接着明确说：“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又过十年，到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时，就直接地谈到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不过，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只能交留给下一代。

进入80年代，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加，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这就为香港的回归创造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香港回归问题被中英双方政府提上正式议程。

“一国两制”打开回归之门

香港回归虽然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真正实际去解决它并不容易。这从中英双方谈判进程之艰难曲折，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程，于1978年8月成立中央港澳小组，下设港澳办公室，由廖承志负责，着手

研究，拟定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各种问题的方案。大体同时，英国政府也改变对香港何去何从避而不谈的态度，表示了相当的关注。英国政府改变态度的直接原因，据后来发表的英国政府白皮书说主要是："由于批地租期日益缩短，香港政府无法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很可能阻碍投资，损害人们的信心。"因此，利用中国外贸部长访港时对港督回访的邀请，英国政府派港督麦理浩于1979年3月24日到北京。第二天，邓小平会见了麦理浩。邓小平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表示：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让港督转告投资者放心。此后，英方又派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前首相希思等多次访华，承担交流和探路的使命。经过多次交往，英方基本上摸清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方针，为双方的正式谈判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到1984年12月19日，两国总理正式于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共经历两年零3个月。谈判过程大体可以划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两国首脑会谈，中心是主权问题。中国态度十分明确，而英国却另有想法。在1982年9月23日的中英双方总理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宣读了一份声明。她说："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整个资金外流"。她认为：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中国总理赵紫阳坚定地反对英国的错误立场。他重申新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他说，收回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以"保持繁荣"为

由，不收回或推迟收回主权。由于双方基本立场对立，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两国政府首脑会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毕竟第一次把香港问题正式摆在谈判桌上，拉开了高层谈判的序幕。

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这位英国首相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离不开英国”两张牌，要求“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邓小平在挑战面前寸步不让。他坚定地表示：一是主权问题，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二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问题，中国的基本方针是保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三是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问题。他说小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希望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和混乱。邓小平的谈话打破了撒切尔夫人不交还主权的幻想，但她又不愿改变主张。因而，虽然在这次访问结束时，发表了“双方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的联合声明，但正式谈判并没能很快开始。

为打破僵局，中英双方都作了很多努力。1983年3月，以英国首相名义写信给中国政府，在若干附加条件之下表示可以“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4月，中国总理复信给英国首相，肯定英方新的态度，同意尽快举行正式会谈。由于双方都表现了一定的灵活姿态，为正式会谈的开始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会谈，在中英双方就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从7月12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在这之前，中国方面已宣布谈判日期以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将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这一阶段谈判共进行22轮，不仅时间长，而且颇多周折，取得进展很难。

正式谈判开始后，英方虽不再坚持主权不放，却运用各种方法企图在1997年之后继续保持对香港的管理权，即以主权换治权。他们运用丰富的谈判经验，会场内外相互配合，大打"信心"、"民意"、"经济"三张牌，而且像撒切尔夫人要求的，"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但可惜，中方却坚持主权与治权不可分，使英方的牌难以发挥效果。这样，前三轮谈判毫无进展，陷入僵局。香港人心大受影响，经济出现动荡，股票大幅下跌，房地产降价，港币贬值。这种情况引起英国各界的不安，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举行研究对策的会议，但意见难以统一。

为寻求打破僵局的办法，英前首相希思第6次访华。1983年9月10日，邓小平会见希思。邓小平明确向英政府说明，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他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然而撒切尔夫人并没有理会邓小平的意见，在第四轮谈判中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使会谈仍无进展。这更增加了香港的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而英方又以此为资本，打"民意牌"和"经济牌"，向中国施加压力，遭到中方的还击。香港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虽然可以给英方打"民意牌"和"经济牌"以口实，但终归是对英国也极为不利的，这迫使英方不能不改变策略。10月14日，英国首相致信中国总理，不再坚持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而表示同意在中国政府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这就又一次打破僵局，使第五、六、七轮谈判取得相当进展。

但到第八轮时，谈判风波又起。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英方要求香港现存法律制度在1997年之后全部保留；二是不赞成中国在香港驻军。一直到第十二轮会谈，这些问题才达成一致。1984年4月18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一致见解。

后十轮会谈，主题转入过渡时期的种种具体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换的各种事宜。这样，又设立了工作小组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等机构。虽然仍有分歧意见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还比较顺利，各种具体问题陆续获得解决。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双方在北京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同年 12 月 19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决定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联合声明》的签署解决了中英之间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

在《联合声明》签署前，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说，香港问题不解决，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撒切尔夫人完全赞成这一评价。她特别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天才的创造。

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在全世界获得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为解决国际争端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邓小平对这一谈判成功的原因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

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①]

庄严而热烈的圆梦之夜

《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就进入了过渡期。13 年过渡期中当然不会是没有风浪和争端的，但历史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随着北京天安门广场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上时数的减少，1997 年 7 月 1 日，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光辉时刻终于到来了。

关于这个庄严而热烈的不眠之夜，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联合写了一篇真实而精彩的报导，现摘录于下：

>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至 7 月 1 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
>
> 23 时 42 分，交接仪式正式开始。
>
> 在中英仪仗队入场后，双方礼号手吹响礼号。23 时 46 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登上主席台主礼台。英国方面同时入场并登上主席台主礼台的有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外相库克、离任港督彭定康、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
>
> 在仪仗队行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讲话，他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一百五十多年英国统治之后，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那些把‘一国两制’构想变为《中英联合声明》的人致敬，对那些为谈判《联合声明》的实施细节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85－86 页。

而辛勤工作的人表示敬意。

23时56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象征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换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出席仪式的中外来宾全体起立。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竖立在主席台主礼台前东西两侧的旗杆上。

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宣告结束。

这时,距零点还差几秒,全场一片肃穆。

7月1日零时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

全场沸腾了,许多人的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照相机、摄影机的镜头不停地闪动,记下了这一庄严的历史的时刻。

接着,江泽民主席走到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前发表讲话。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

江泽民说,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江泽民主席的讲话,激起全场6次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中英两国领导人走到主席台前,握手、合影。

凌晨零时 12 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

参加这一盛典的众多来宾中，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政首脑，90 多个国家驻港的领事机构的代表，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为首的 3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负责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 700 多家新闻媒体的 8000 多名记者。

在这历时 30 分的庄严仪式结束后，又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随后，在首都北京召开了各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万人大会，江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对香港回归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全国各地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真是普天同庆，亿众欢腾。

香港回归的重大意义

对于香港回归这件事，国际舆论普遍给予肯定和赞扬，亚非拉遭受过侵略掠夺惨史的国家，反映尤为热烈。大家共同承认的一点是，时代不同了，力量对比起了变化。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7 月 6 日发表文章说："在 150 年前，当伦敦向北京宣战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和运输船队。英国的战利品是香港。但是，今天，英国正在败退。中国正在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香港回归等于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日本《产经新闻》7 月 1 日文章说："香港回归终于对欧美列强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历史打上了终结的印记。"法国《费加罗报》也认为：中国收回香港，"从而抹去了西方在上个世纪给它的主权带来的侮辱的最后痕迹。"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是一个代表。当她在香港回归前夕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一想到 10 天后

"英国国旗在香港降落一事就令她感到悲伤。"她说:"我们将交出一块纯宝石。"台湾《联合报》7月4日的文章,实际上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从中国人的观点看香港回归,自然会有异于西方媒体的感受。对于在本世纪饱尝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的中国人而言,香港回归象征着耻辱的洗雪与力争上游的契机。在本世纪封关前夕,香港的回归则似象征着中国人将向这一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式挥手告别,而为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新篇揭开序幕。"这一段话是说得不错的,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总之,香港的回归,结束了英国在东方殖民统治的历史,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开创了香港历史的新纪元,其伟大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众所公认的。

香港回归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主要为四个方面:

(一)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香港面积虽然不大,但经济发达,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市场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的回归和继续兴旺发达,在中国经济整体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香港回归的意义绝不只是占大陆国民生产总值的21%的经济力量的回归,而是多方面的更广泛的。日本《产经新闻》说:"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来说,保存香港作为利润宝库的机能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法国《费加罗报》说:"收回香港可以对中国的发展起催化作用,特别是对银行和金融方面(中国在这方面的缺欠是很严重的)的发展起催化作用。"

(二)提供了和平统一的范例,必将对澳门的回归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起促进作用。日本《每日新闻》7月1日的署名文章说:"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允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可以说,'一国两制'这一世界前所未有的试验如果取得成功,将为中国最终实现统一开辟道路。"法国《费加罗

报》的一篇文章甚至说:“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的关键在香港。”

(三)为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途径和范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季塔连科院士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访问时说:“中国采取了‘一国两制’这一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从现状来看,这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惟一方法。香港的居民、外国的投资家、本国的利益三者取得了平衡……如果香港将来继续顺利发展,那么,就等于向全世界表明解决领土问题的新解决方法。”应该说这种看法具有广泛代表性。

(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和原则。因为这是属于专门的理论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澳门顺利回归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南侧,面积 1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40 余万。300 年前,葡萄牙商人借口要求上岸晾晒货物,并向中国官员行贿,逐渐进入澳门筑房定居。1840 年鸦片战争后,葡趁火打劫永远占领澳门。但清政府只准“永驻管理”,并未割让。中华民国政府企图收回,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暂时保持现状,以待时机成熟。

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关于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是在中英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联合声明》于 1984 年 12 月 19 日正式签字后,才开始进行的。由于 1979 年 2 月中葡正式建交时,双方政府已达成谅解,葡方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又由于两国之间存在比较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关于澳门回归的谈判较之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要顺利得多。

1985年5月20日，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埃西内斯应邀访问中国。邓小平与埃西内斯会见时，双方开门见山地谈到澳门问题，一致认为澳门归属问题原则上早已解决，不存在争论。需要谈判的主要是时间、步骤、方法和具体安排。5月23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澳门回归问题。

1986年6月30日，中葡首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经过三轮会谈，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比较广泛的一致。决定设立工作小组，在双方政府代表团指导下，具体讨论和制定全部协议文件。谈判比较顺利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波折。双方明显的分歧是在管理权交还的时间上。葡方在1986年11月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应邀访葡时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延长管理权的时间，引起中方的坚决反对。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说："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而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葡国政府举行国务会议，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辩，最终同意1999年将澳门管理权交还中国。这样，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此后十三年的过渡期是比较平稳的。

澳门回归的庄严时刻在新世纪来临之前终于到来，中国政府为此作了精心的准备。1999年12月19日中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率政府代表团抵澳。当晚，在澳门新口岸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馆举行了隆重的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礼号手吹响礼乐声中，中方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唐家璇、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和葡方的总统桑帕约、总理古铁雷斯、国务部长兼外交部

长伽马、议会副议长科依索罗、澳门总督韦奇立，同时登上主席台主礼台。19日23时55分，在葡萄牙国歌声中，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开始缓缓降下。20日零时零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旗同时升起。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随后，20日成为十分繁忙的一日。凌晨1时4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3时30分，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回归法》。12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由拱北口岸正式进驻澳门。15时28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开署，由副总理钱其琛出席仪式并揭牌。20时，北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会。江泽民到会讲话。22时10分，澳门特区政府举办庆回归焰火晚会。

这样，就在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前，从神州大地上消除了最后一块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殖民地的残痕，完整而彻底地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

第三十九章

准备迎接新世纪

1997年对于中国，除香港回归外还有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继往开来，决定中国跨入新世纪的战略方针的重要会议。

邓小平后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能实现他到回归祖国后的香港看一看的热烈期盼，于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的不幸长逝，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沉痛哀悼，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于当日联名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25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致悼词。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指出："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强调，邓小平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中

国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国将沿着邓小平制定的路线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逝世后，全世界关注中国向何处去，国内各界人士出于不同的思考，也纷纷发表见解和主张，甚至直接上书中央献计献策。一时之间，从对十多年历史实践的评价到当今局势的估量，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的正确性到跨入新世纪的前进走向，都有不同的论断和政见出现。这是面临重大历史关头经常会出现的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促进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也是有益的。但有些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又是必须给予回答的。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举行毕业典礼。借用这个机会，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莅会作了针对性很强的重要讲话。到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刘华清、胡锦涛和部分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党政部门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 200 多人。江泽民在讲话中阐述了四个问题：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他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江泽民这次重要讲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重视。对这次讲话各级干部普遍认真地学习和各种媒体的大量宣传，对统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对召开党的十五大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

中共十五大，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到会代表2048名，他们是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台联、解放军、武警部队等36个选举单位，由中共党员按党章有关规定选举产生的。其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1554名，占代表总数的75.9%；各方面生产和工作第一线的代表494名，占21.1%；其他方面代表占3%。这届代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代表总数83.5%。另有特邀代表60名，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

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共五项：(1)听取和审查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2)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书面)；(3)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4)选举中央委员会；(5)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江泽民在9月12日代表大会的开幕会上，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共分为十个部分：(1)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2)过去五年的工作；(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5)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6)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7)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8)推进祖国和平统一；(9)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10)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篇报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而奋斗的行动纲

领。报告得到大会代表们的一致赞成和高度评价，大会通过了赞成报告的决议。

这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把邓小平理论明确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章总纲中明文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的行动指南。这一决定充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全党的共同心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五大选举产生了由 193 名中央委员和 151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由 115 名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这两个委员会中都吸纳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中年干部和一批年轻干部，显示了新老交替合作的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在大会后的 19 日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的成员。包括(1)由江泽民等 22 名正式委员和 2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七人组成的中常委；(3)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4)胡锦涛等 7 人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5)江泽民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张万年、迟浩田为副主席，傅全有等 4 人为委员；(6)尉健行任中央纪检委书记，韩杼滨等 6 人任副书记。

中共十五大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具有重要意义；会议肯定了邓小平理论，明确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前进；对跨世纪的发展作了战略部署。这次大会将是党和国家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九届人大和改革开放新举措

在深入学习和普及宣传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基础上，为了落实

党提出的跨世纪的各项战略任务，1998年3月5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第一次会议。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并提出1998年工作的建议。即：(1)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2)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3)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4)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5)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6)努力改善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8)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这个报告和同时提交大会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得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大会选举了中央国家机构，人员有较大变动。除国家主席江泽民连选连任外，国家副主席由胡锦涛接替荣毅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由李鹏接替乔石。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名，决定由朱镕基担任，接替李鹏。中央军委副主席，根据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提名，由张万年、迟浩田担任。同时，根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提名，决定由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为国务院副总理，迟浩田、罗干、吴仪、司马仪·艾买提、王忠禹为国务委员，组成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大会还选举肖扬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韩杼滨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就组成了一个领导12亿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府工作机构。

在大会闭幕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新任总理和四位副总理与600多位中外记者见面。朱镕基以他独特的风格、明确的语言、流畅地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他强调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是科教兴国。把科技和教育放在这样高的位置上，在建国后的历届政府中这是第一次。这是对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的强烈回应。对于本届政府的具体施政纲领，他概括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即：确保1998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

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贬值。在亚洲经济危机继续扩展的十分严峻的大气候下，作出这样坚定的保证，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气魄的。“三个到位”就是：国企改革到位，金融改革到位，机构改革到位。“五项改革”就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这些任务中没有一项是轻而易举的。所以，朱总理表示，要以勇闯地雷阵的精力，义无反顾地向前进。这样的记者招待会，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大会前后陆续出台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主要有：

（一）农村改革。一月上旬，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针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等情况，研究确定了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要做到“四稳一突破”，即：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稳定农产品总量，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突破”表现在“四新”即：农村改革有新突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新进展，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有新提高，农民收入有新增长。江泽民在接见代表时强调：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特别是在连续丰收后要谨防出现松懈情绪。要十分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为农村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农村改革的稳步前进增添了新的动力。

（二）国企改革。朱镕基总理组阁不久就亲赴东北三省考察职工下岗安置和再就业等工作。5月中旬，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江泽民主席到会讲话。他强调，要全党动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做好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这对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深化国企改革，引导、保护和发挥好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采取了一些具体而有效的措施。但这项工作涉及面广，人数多、难度大，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努力。

搞好企业管理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稽察特派员制度。选拔副部级以上干部担任稽察特派员。其主要任务是下派到国企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检查账目，查企业的盈亏和资产负债情况；同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估，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向国务院作出报告。1998年向500家大型企业派出了稽察特派员。以后计划陆续扩大到1000家。这是一个有力的具体措施。

（三）金融体制改革。当前的要求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大体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调控体系；强化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依法治理金融，严厉惩治金融犯罪和违法违规活动。1998年5月23日，全国有8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因违法违纪行为受到查处，并通过媒体向全国曝光。这种做法是建国以来的首次，显示了中央整治金融秩序的决心。6月，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任工委书记。从组织机构上加强了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降低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适当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以促进经济增长，并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针对旧体制管理落后，党政不分，人员膨胀，成本上升，经营亏损，仍没有摆脱“大锅饭”模式的状态，中央于4月底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作出全面部署。改革的原则是：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

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以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又陆续出台一些具体措施和条例，使改革逐步全面展开，并收到初步成效。

（五）住房改革。国务院决定，停止一切福利分房，通过房改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通过一系列政策刺激住房消费的增长，既可以使城市居民住房不断得到改善，又可以促进建筑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有力生长点。

（六）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根据九届人大的决定，国务院除办公厅外，组成部门由 40 个减少到 29 个，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 200 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 100 多项；部内设立的司局级机构减少 200 多个，占原有此级机构的四分之一。国务院的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到 1998 年 6 月底，国务院大部分部门的定岗分流工作基本结束。省、地、县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工作，陆续开始。

国务院通过这次机构改革，使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有所改善。首先是平均年龄下降。29 名部委正职，平均年龄57.4岁，副职平均年龄为54.6岁。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 48 岁，副部级干部 42 岁，均较为年富力强。其次是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部级正副职中，除 2 人外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 23 人。再次是加大了干部交流的力度，打破了部门、行业、中央与地方的界限，有助于领导干部知识结构的全面化，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另外，对打破干部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的旧观念，也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上述一系列改革及其它配套措施的实施，对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减轻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使中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都在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四十章

光辉创业五十年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隆重地庆祝共和国五十年的诞辰，既是亿万人民的强烈心愿，也是客观形势的要求，自然成为这一年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

国内外的三场大斗争

正当中国人民欢欢喜喜准备迎接自己的国家诞生五十周年这一个欢庆之年的时候，面临的并不是万事如意的好局面。国内国外总有那么一种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日趋繁荣和强盛，总要制造一些事端，找中国人的麻烦。因此，中国人民在喜庆之年，还不得进行一些并非所愿的斗争。概而言之，国庆之前，进行了三场大的斗争。

一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这是一场已经持续多年的斗争，而且进入新世纪也不会停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中美两国间的世纪之争。当然斗争的主题和形式是经常变化而有所不同的。比如，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

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围绕西藏问题的斗争，仅从达赖喇嘛叛逃算起，也已经 40 多年；人权问题，时起时伏；总之，只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按美国的价值观行事，就总会有各种事端被制造出来。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本来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就是有人横生事端，谈判一谈就是 13 年。如此等等。

而发生在 1999 年的大事，则是北约轰炸南联盟科索沃，特别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被炸。

科索沃地区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历史上科索沃曾是中世纪塞尔维亚王国的政治中心，是塞族文化的摇篮。后来被奥斯曼帝国占领 400 多年，塞族被迫外迁，而邻近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乘机迁入，成为居民中的多数。二次世界大战后，科索沃随塞尔维亚共和国一道并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80 年，铁托总统逝世后，在国际上某些势力的支持下，民族主义浪潮兴起。南斯拉夫联邦不断被分裂。随着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纷纷独立建国，科索沃的阿族人中的分离主义分子也被鼓舞而起，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并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97 年，一些阿尔巴尼亚族人拿起武器，组成“解放军”(UCK)，向塞族警察放冷枪，袭击塞族居民。这就引起南联盟政府的武装镇压，而南当局对阿族分离分子武装叛乱的镇压，又被西方称之为民族清洗，于是问题越闹越大。美国和北约以调停为名，压南当局就范。1999 年 2 月 6 日，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团，在北约的主持下，于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谈判。但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两度延期，均难以达成协议。3 月 18 日，阿族代表团单方在 6 国联络小组提出的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和平协议上签字，而南联盟政府代表团拒绝签字。这样就给了北约以借口，绕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

坚持人道主义，制止种族清洗为理由，从3月24日开始，先是用导弹，继之以战机，对南斯拉夫进行全面的大轰炸。

对待科索沃事件的态度，中美两国是截然不同的。3月24日，轰炸开始的当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我们现在采取行动，是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保卫我们的利益，推进和平事业"。"结束科索沃的灾难，是我们道德上不可推卸的义务"。明明在用炸弹屠杀和平的居民，却说是在"推进和平事业"，这大概是一种帝国主义的逻辑吧。

也是3月24日，正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伦巴第大区主席福尔米科尼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中国的立场。他说："在今晚欢乐的宴会上，我们听到了科索沃遭到空中打击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忧虑和不安"。他指出：象科索沃问题这样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靠外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是无法解决的。他重申中国一贯坚持的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主张，并呼吁立即停止空中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3月25日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袭击行动，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尽快平息事态，化解危机。

科索沃远在欧洲，距离遥远，同中国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什么我国一定要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呢？因为，它实际上涉及一个重大的国际关系准则问题，就是人权是否可以高于主权。朱镕基总理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时，曾尖锐指出：我们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不应该受到蔑视。如果允许以军事行动来干预所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人权问题，那将在世界上开一个很坏的先例。他说：在国际人权标准问题上，没有什么世界法庭或者世界警察。

中国政府坚持国际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

正确立场和态度,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可是也惹恼了国际反动势力。在现在还难以完全弄清楚的复杂因素支配下,出现了中国驻南大使馆遭美国导弹袭击的令举世震惊的重大国际事件。

贝尔格莱德时间5月7日(星期五)深夜,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从美国起飞的新型战机向中国驻南大使馆发射五枚精确制导的空对地导弹。中国驻南使馆顷刻浓烟滚滚,3名记者遇难,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噩耗传来,举国震惊,舆论沸腾。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到美国使领馆强烈抗议,这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以美国为首北约承担全部责任。外交部奉命紧急召见美驻华大使,当面提出最强烈抗议。胡锦涛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表电视讲话。应中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我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关系再一次被推入恶浪险滩,降到最低点。

面对着中国人民和政府举国一致的愤怒抗议浪潮,面对着国际舆论的强烈不满,北约各国首脑纷纷出面极力摆脱本国的责任。英国国防部说:可以肯定这次袭击中国驻南使馆是美国人干的。意大利总理达莱马要求北约彻底调查这次袭击中国使馆事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德国总理施罗德说,他将就这一事件无条件地向中国高层领导人道歉。法国外长韦德里纳说,中国使馆是这一"悲剧性错误"的受害者,他表示最深切的慰问。主持这一轰炸行动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也表示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承诺要展开正式调查。各国重要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英国《独立报》说:"星期五的轰炸是一种极端无能的表现。"另一家英国报纸《星期四邮报》说:"中国外交官或许还可以从被炸的废墟中站起来,可是北

约却从此声名扫地”。意大利的一份报纸署名文章说:“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是出了错”。日本《产经新闻》则肯定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决不是一个技术性错误,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事件”。西班牙《国家报》说:“如果排除蓄意行为的话,那么玩忽职守的罪名也是不轻的”[①]。如此等等。

在全球一片指责声中,美国虽然企图狡辩,编造出如使用了过期的旧地图之类不像样子的理由,但都难以自圆其说。在坚持并非事先有预谋,而是由于技术性错误造成误炸的这一底线的基础上,不得不由美国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公开道歉,并在电话中向江泽民主席亲自道歉。承诺要彻底调查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并向中国通报调查结果。美国和北约驻中国大使馆在北京举行追悼三位死难烈士大会的那一天,降半旗致哀。还同意向轰炸中的死难和受伤者提供一定的赔偿金。虽然没有满足我方提出的全部要求,但一个世界上头号的超级大国,能够被迫低头认错也是很不容易的。这场异乎寻常的国际大较量,不仅使我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峰,而且使全中国人民受到一次深刻地实践教育。正如路透社在一篇报导中所说:“从北京到曼谷,美国在亚洲的形象正在下降”。因而可以说,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这场斗争以我们取得胜利而告一段落。

当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使命,只能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正确方针,继续进行下去。

二是,同“法轮功”的斗争

对于李洪志和他创立与传播的“法轮大法”,本来社会上知之者并不多,知道者也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可是,4 月 25 日,万

---

①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世界知识》1999 年第 11 期。

人包围中南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法轮功大行动，却敲响了一次政治性的大警钟，引起上至党中央、国家主席，下至一般平民百姓的普遍关注。一连串大大的问号升上每个人的心头："法轮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从四面八方、人不知鬼不觉地聚众万余人包围党和国家领导核心的所在地，绝不会象他们自己声称的一般上访、讨个说法，那么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时逢国庆五十大典之年，这种做法不是同人们要求稳定和喜庆的愿望背道而驰吗？中央及时而稳妥地处理了"4·25"事件，各地来京的"法轮功"教徒们也被遣送回各地。但他们在李洪志及其骨干的调遣指导下并不罢休，继续聚众围攻各地党政机关，坚持对抗立场，使事端不断扩大。这就引起了领导机关的重视。认真一查，发现这并不是一般群众健身团体，也不是宗教组织，而是一个传播邪说，妖言惑众，组织严密，破坏法律，敛财作恶，残害生命的非法组织，而且信众多达200万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有的地方竟占10%以上，而且包括少数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还有个别颇有名气的哲学教授。这种种现象颇发人深思。

进一步地调查研究发现，"法轮功"符合国际上各种邪教的一系列共同特征，是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所以这场斗争的性质，也不是一般的群众上访或聚众闹事，而是关系到巩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肃政治斗争，又是关系到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法轮功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低级的、卑劣的、极端的变种）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大较量。

为此，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定；民政部发出取缔非法组织"法轮功"的通知；人大常委会也通过关于禁止邪教的专门法令。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随即采取了各项

有力措施，予以取缔。一批“法轮功”的首要及骨干分子已被拘捕，有的地方已经法律程序予以判处，并对已在美国的教主李洪志发令通缉。

经过半年多的斗争，“法轮功”作为一种邪教组织已被击溃，法律和正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斗争并没有完结。特别是对广大法轮功信奉者的思想教育工作，仍需认真的细致的去做，仍是长期的并不轻松的任务。至于从中认真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特别是实实在在的加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宣传，真正改变“一手硬、一手软”的领导工作中根本性的缺欠，认真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则只能说是才有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开端。

三是，反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斗争

李登辉自 1988 年 1 月蒋经国逝世后继任，在台湾主政后，便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抛出分裂祖国的谬论，挑起纠纷和事端。如：1990 年 7 月，李登辉召开所谓国是会议，提出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政府”的“一国两府”论。1991 年 6 月，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要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并策动收买一些小国，连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案。1994 年 3 月，李登辉在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公然胡说中国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声称要建立台湾人自己的国家。李登辉不但有言，而且有行。他主持多次“修宪”，“全面改选国会”、“总统公民直选”、“冻结省长和省议会选举”、“扩大总统权限”等等，以确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改体制”，一步一步地为台湾独立、分裂祖国作各种实际准备。

1995 年 6 月，在美国议会和政府支持下，李登辉利用“校友外交”的名义访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的演说中，他公然打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旗号，誓言要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气焰十分嚣张。

中国最高当局立即给予强烈地反击：召回中国驻美大使，中断了同美国的一系列高层互访，停止了多项专业合作；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地区进行军事大演练，并超越台湾试射导弹……给了美国反华分子、李登辉的分裂阴谋和台独分子以当头棒喝，暂时扼制了李登辉之流的嚣张气焰。

但是，李登辉分裂祖国的野心未死，本性难移，一旦他认为时机到来，就又大肆活动。1999年，中美关系由于美机袭炸我驻南大使馆而陷入新的低潮。李登辉却认为这对他搞分裂活动又是一个好机会。幻想利用中美关系低潮和美国议会内反华势力又盛之机，迎合西方反动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挑起事端拖美国下水，借机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使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法律化、固定化、永久化。7月9日，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随后，又在8月28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中，把"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正式写入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中，使之成为国民党对大陆政策的指导方针。但是，这次李登辉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对。美国接受了1995年康奈尔事件的教训，克林顿总统迅速出面声明，美国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表明不赞成，不支持"两国论"。给李登辉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李登辉的"两国论"一出笼，就立即遭到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愤怒声讨。党和政府的及时而有力的声明，报刊、电视、广播上一系列有分量的有理有据的批判文章，亿万群众的简短有力一针见血的口诛笔伐，人民解放军在沿海渔民支持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渡海作战演习……构成了一股代表历史方向的不可抗拒的伟大洪流。说明谁想在中国打民族分裂的主意，注定是要失败的。李登辉之流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碰得头破血流，留下一个千古的

骂名。

三场大斗争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虽然都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但也提醒我们，世界不平静，中国也不平静，绝不能因为喜庆而放松应有的警惕。

党内"三讲"教育的开展

欢庆建国五十周年，恰逢世纪之交。国际上面临难得的大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国内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共中央于 3 月下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决定集中一段时间，在党内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简称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跨世纪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为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一项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准备。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内容的提出，是有很强的领导干部客观状况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特征的现实针对性的。也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对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一环。

我国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总体状况是比较好的。在党的十五大强调要造就高素质领导干部的精神指导下，高中级干部的邓小平理论学习逐渐深入，思想理论水平逐步有所提高，陆续涌现出孔繁森、李润五、马恩华、李国安式的好干部、好党员。在他们身上

集中体现了党员干部队伍的本质和主流。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还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的需要。例如：有些人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甚至断章取义，片面歪曲，取我所需，搞实用主义；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辨别力，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是非不分；有些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甚至不择手段，争名夺利；有些人违反民主集中制，个人擅权独断，无视组织纪律，也有人放弃党的原则，搞庸俗的关系学，甚至包庇罪犯；有些人当官做老爷，挥霍浪费，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甚至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腐化堕落，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2 年 10 月到 1997 年 6 月，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共66.9万人，其中开除党籍的 121500 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 37492 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 20295 人，厅局级干部 1673 人，省部级干部 78 人。事实说明，如果听任错误的思想行为和腐败现象蔓延下去，将会严重破坏党的形象和威望，破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严肃对待。“三讲”的进行就是一种及时而有力的对策。

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4 年 12 月的《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是整个干部队伍的中坚，是实施党的领导的骨干力量。他们自身的状况如何，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理论修养、知识水平、领导能力和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在本世纪末实现改革和建设的目标，能不能保证我们这个伟大的党领导伟大的人民以更加主动的地位跨入 21 世纪。”他强调把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建设好，已成为当

务之急的一件大事。时隔了3年，在1997年12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21世纪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世纪。面对新世纪，我们党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我们广大干部首先是几千名高级干部、几万名中级干部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高中级干部首先要具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能够科学地判断形势，正确地把握大局，实事求是地决定政策，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正是有鉴于此，江泽民明确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到建国五十年前夕，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的单位陆续结束。在中央派出的巡视组的指导帮助下，开展"三讲"教育的单位一般都注意抓住了两个环节：一是用整风的精神开展"三讲"教育。整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个光辉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理所当然的应该在"三讲"教育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挥。这种要求，"三讲"教育必须始终立足于学习提高，以学习作为基础，并把用理论武装头脑，同思想整顿和改进作风结合起来。在学习理论时注意紧密结合新时期的实际，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创新。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收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效。

二是充分发扬民主，打开大门搞"三讲"。因为，无论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领导干部的状况，他们的优点和缺欠，本地区本单位的群众是最清楚，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把门打开，紧紧依靠群众，才能把领导班子的问题找准抓实，也才能揭

深摆透。有些地区和单位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例如，山东省委先后 3 次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一次是在 500 多名厅局级干部中发放 2900 多份征求意见表。第二次，请 1300 多人参加 62 个评议组，发放民主评议表 4000 多份。第三次，向市、地、省直机关和企业等 200 多个单位征求意见，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讲”，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教育和党的建设的一种创造，其成效已经开始显露。不少地区和单位已开始出现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的好趋势。相信随着“三讲”教育在全党范围广泛而深入地展开，这种好趋势一定会得到增强和扩展。总之，“三讲”教育已为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创造良好氛围作出了贡献。

国有企业改革的里程碑

建国五十大庆即将到来之际，1999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 189 人，中央候补委员 147 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既说明国企改革和发展问题之关系重大和紧要急迫，也说明经过 20 年的实践已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作出新的重大决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陆续展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扩权让利为中心，调整国家和企

业之间的责任、权力和利益问题；第二阶段，以推广各种形式的承包制为中心，从 1984 年开始，在一些行业发展很快；第三阶段，以制度创新、机制转换为中心，逐步深入，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在改革进程中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露，有待解决。从而使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不过经过多年的实践，已取得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党的十五大又在理论上作出新的贡献；我国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外部环境逐渐宽松；特别是党中央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动手，到全国重点地区调查研究，考察企业，听地方负责人汇报，召开多次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使形成国企改革的新的纲领性文件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分为十二部分。第一部分就明确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了国有企业在建国以来的重要贡献和今天的重要地位。强调：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同时，国企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作为我国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正是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出发，《决定》指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与指导方针；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

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做好减员增效，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快国有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等方面。《决定》最后强调，加强党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是一个重大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正如《人民日报》在社论《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中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穿了党的十五大精神，全面总结了二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阐明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意义，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决定》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无论在我国国有企业发展史上，还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会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样的评价和预期，应该说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能够得到实现的。

一个“三讲”教育，从政治思想方面为喜庆之年准备条件，增加气氛；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从经济基础方面增添活力，带来希望。全国人民终于在日益浓重的喜庆气氛中，迎来开国五十周年盛典。

隆重的建国五十年庆典

五十年大庆的准备工作，早在头一年即已开始。首都北京为迎接庆典而筹集超过千亿人民币的巨资，进行规模宏大的建设工作。天安门广场被从下到上彻底改造，王府井大街旧貌换新颜，首都机场新候机大楼赶造完成，平安大街克服艰巨的搬迁任务而如期开通，环境改造，水系治理，大气净化等各项工作成绩斐然。各大公园和群众欢娱的场所也整治一新。受阅部队的集中训练，群众游行队伍的演练，冒着罕见的酷暑，一丝不苟的有序进行。节日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各种大型歌舞戏剧晚会，无不加紧排练。缅怀开国领袖功绩，赞颂改革开放 20 年辉煌成就的各种专题文献片和大型纪录片陆续和观念见面。介绍各种英雄模范事迹，转介国外对新中国的有关评论等宣传报导工作，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图片、书刊等以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把节日气氛烘托得越来越浓。在万事准备齐全，万众翘首期盼的情况下，开国五十周年欢庆大典的庄严时刻终于到来了。

199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红柱子、红地毯、红宫灯，充满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彩旗飘扬，花团锦簇，一片欢乐的海洋。十万人组成不断变化的标语，呼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9 时 58 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正面的主席台上。10 时整，隆重的庆典正式开始。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上。随着五十响礼炮的轰鸣，盛大的历史性的世纪大阅兵正式开始。

“50 响礼炮的回声还在广场上空激荡，一辆红旗检阅车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上将驱

车迎上前去:'主席同志,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代表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编制构成的陆军、海军、空军、武装警察和民兵预备役部队共42个方队(其中步兵17方队,各种坦克、火炮和导弹的机械化方队共25个),整齐列阵东长安街,威气凛凛,气势雄壮。1000名军乐手齐奏激昂的阅兵曲。在李新良陪同下,江泽民主席乘检阅车徐徐向前驶去"。

"江泽民主席检阅完三军受阅部队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随后,在激昂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气势磅礴的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42个受阅方队,由东向西,浩浩荡荡走过长安街。那锵锵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那隆隆的马达声震撼大地。整个天安门,整个北京,整个中国,在这一刻,产生共振……"。

"11时5分,当压阵的最后三辆导弹发射车载着我国最新型远程导弹驰向天安门广场时,132架轰炸机、歼轰机、强击机、歼击机和直升机组成的强大机群超低空呼啸而来……11时13分,激昂的军乐声戛然而止。历时近一个小时的世纪大阅兵落下帷幕——作为浓墨重彩的华章,这一瞬间,将被载入人民共和国不平凡的史册"。这是《世界军事》增刊《世纪大阅兵》中对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的报道。

阅兵之后,则是分为"开国创业"、"改革辉煌"和"世纪腾飞"三大板块的群众游行和多姿多彩的花车,代表各省、市、自治区,还有香港、澳门的彩车也参加大游行。一直到时钟响过12时,五十万人的欢庆盛典才宣告结束。晚上又继之以数十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大欢聚和五彩缤纷的礼花,加上十里长安大街的各式彩灯,使天安门广场分外流光溢彩。

不过引起全国人民和国外舆论关注的还是大阅兵。值得特别

说明的是，这次参加检阅的部队中，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特种警察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均为第一次参加阅兵的新兵种。参加受阅武器装备多达409台件，不但数量大、装备新，而且技术含量高，品种配套齐全。其中首次亮相的新装备占90%以上。说明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此规模的大阅兵，在世界各国也并不多见。无怪乎外国新闻媒体发出惊呼。埃菲社说："中国今天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军事实力"。日本《每日新闻》的驻北京记者以"阅兵式炫耀高技术化"为题发表评论。而俄通社——塔斯社记者则说："中国今天展示了一些新武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主战坦克、新式歼击机及令外国军事观察家大为惊讶的可飞行8000公里的导弹"。[①]

不过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位台湾教授的观感，特摘录于下。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曾祥铎以《八国联军与北京阅兵》为题在《独家报道》周刊上发表文章。他说："1999年10月1日上午，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北京庆祝国庆50周年阅兵大典的实况转播，心情是激动的。我想，对于西方的反华分子，台湾的台独分子，以及从中国大陆落荒而逃，而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洋奴的那些叛国分子来说，这次北京宣扬国威，展示实力的国庆阅兵大典，会让他们茫然失措，黯然神伤曰：'这个样子的中国，还有可能垮台吗？'"曾教授在回顾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演变，特别是1900年在德国将领瓦西德统率下的八国联军杀进北京的种种兽行和惨状后，感慨地说：10月1日军容壮盛之阅兵大典，"与百年前八国联军在北京奸、淫、掳、掠的惨状相较，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啊！中国终于靠自己的力量

① 均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10月3日。

站起来了，而且开始起飞了！”[1] 真是民族大义之凛然，跃然纸上，令人感奋。

隆重而盛大的庆典已经定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册之中，定格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史册之中，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它既给半个世纪亿万人民的奋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又意味着一页历史新篇章的展开。世纪正在交替，但是世界并不平静，科索沃炸弹的轰鸣，告诉我们战争并没有消失。面对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中国人民有能力在下一个世纪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10月22日。

第四十一章

在战胜风暴中稳步发展

中共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发展，在出现亚洲金融风暴和特大洪水灾害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成功应对金融风暴

1997 年 7 月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事发突然，来势凶猛。东南亚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并迅速波及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拉美等国。对全球的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一些国家在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甚至引发政局动荡。

中国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这场金融风暴的波及和影响，而且个别行业一时影响颇重，但由于有所预见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早在 1993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开始针对国内金融秩序混乱等情况坚决实施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不良因素的扩展。1996 年 1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坚

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1]的任务。1997年1月，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切实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提高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2]并提出将1997年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年。1997年7月以后，面对中国周边许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给人民币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权衡利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1997年1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亚洲金融危机作出分析和评估。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决定对我国金融系统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目标是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1998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工委，实行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体制和金融系统的垂直领导。11月，宣布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市自治区分行，建立了跨省区9个分行。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出台。在改革金融体制的同时，中国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种政策，深入开展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避免了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出现大波动，外汇储备有所增加。由于中国政府采取负责任的积极态度，实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也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平稳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积极扩大内需，推进国企改革，不仅是抵御金融风暴的有力措施，而且是保障国民经济稳定而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1998年初，

---

①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今年将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见《人民日报》第1版，1996年1月16日。

② 《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快速增长物价涨幅回落，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目标》，见《人民日报》第1版，1997年1月1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比预料的更为严重。由于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回落和国内需求对经济拉动的力度不够，1998 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放缓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务院增发 1000 亿元国债，银行也相应增加了贷款，重点用于增加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中央直属粮食储备库等建设投资。这既解决了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又防止了乱铺摊子和重复建设，有效地抑制了经济下滑的趋势，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99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集中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长期稳定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加快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行村民自治等。1999 年 9 月，为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等。一批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对一些企业进行了战略性重组，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对一些小企业则采取联合、兼并、托管、租赁和拍卖等多种形式进行搞活。为实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通过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完善出口退税、严厉打击走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等；另一方面采取兼并破产、改组、债转股、技术改造贴息和加强管理等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问题，暴露出一些弊端，但经过不断地总结和调整，还是产生了相当的积极成果。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

业的亏损户明显减少，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大体上实现了三年脱困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胜特大洪水

1998年入汛以来，气候异常，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6月至9月，长江发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先后出现八次洪峰；嫩江、松花江发生了超历史最高记录的特大洪水，先后出现三次洪峰；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十分严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乡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受灾人口2亿多人，许多厂矿企业被迫停产，长江部分航段中断运输1个多月，这次特大洪水灾害造成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直接指挥了这场全国范围内的抗洪抢险斗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鼓舞士气、指挥战斗。根据受到洪水威胁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明确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大规模动用人民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在抗洪抢险最危急的时刻，中央审时度势，正确判断，科学决策，发出总动员令，要求广大军民坚定信心，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充分准备，全面部署，果断指挥，科学调度，争取了防汛抗旱的主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全力以赴做好动员组织工作，在危急时

刻和生死关头，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纷纷奔赴抗洪第一线，与广大军民一起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出动30余万官兵投入抗洪抢险斗争，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从将军到士兵，用血肉之躯铸起了冲不垮的坚强大堤。有的战士和干部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再次为人民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人民群众是夺取抗洪抢险胜利的主力军和真正英雄，他们舍小家保大家，舍局部保全局。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心系祖国，踊跃捐赠，表现了中华民族救危扶难的高尚道德情操。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终于力挽狂澜，取得抗洪抢险的最后胜利。

这次抗洪抢险正如江泽民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以自己的英勇行为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新的壮丽篇章，这将作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一个壮举载入史册。“坚苦卓绝的斗争，生死与共的考验，风雨同舟的经历，使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军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空前加强，全民族的大团结空前巩固”。

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举措

由于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这就给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解决这些关系人民群众疾苦的各种实际问题，及时采取若干重大措施。

一、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的从业人员规模由6.5亿人扩大到7.3亿人。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多数年份保持在3%左右。就业结构逐渐改善，特别是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稳步增加，由1990年的18.5%提高到2001年的27.7%。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3年共减少了2400万人，其所占比例由1990年的60%下降到2001年的50%。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领域。各地区和各部门积极开辟就业门路，给予优惠和扶持，加强就业服务和再就业培训。1998年至2002年6月，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其中1700多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全国稳定的重要环节。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又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重要过程，中国比较成功地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大量农民突然涌入而引发的种种城市病。农村劳动力比较合理有序流动的机制初步形成，管理服务机制逐步规范，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统计全国进城务工劳动者每年寄回家的劳务款在6000亿元以上。

二、实行“两个确保”，建立“三条社会保障线”。199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上作出了实行“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建立“三条社会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大决策。经过国家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从1998年至2002年6月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90%以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基本都能按时领到生活费。与此同时，为3000万左右的离退休人员发放基本养老金8296

亿元，其中补发历史拖欠 215 亿元。中央财政还对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资金给予了总额多达 1300 亿元的专项补助。2001 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有 1.04 亿人，四年累计发放失业保险金额 270 多亿元。目前，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已经全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两个确保”和建立“三条社会保障线”，有效地保障了下岗失业人员和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发挥了社会稳定安全网的功能，为促进发展，深化改革，保持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加大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力度，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这首先体现在养老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到 2001 年底，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达到 1.4 亿人，是 1990 年的 2 倍多。为减轻企业的社会事务负担，从体制上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地积极推行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管理，养老保险金由社会服务机构发放。其发放率由 1996 年的 2%提高到 2002 年 6 月的 99.3%，方便了离退休人员就近、便捷地领取养老金。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实现了社区管理的离退休人员到 2002 年底超过 1000 万人。同时，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金额也在继续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金额已从 1990 年的 129 元提高到 2001 年的 579 元。其次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 2002 年 8 月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覆盖人数达到 8200 多万人。与此同时，工伤、生育保险改革也在稳步推进。截至 2001 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达 4300 多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职工达 3500 多万人。

实现加入 WTO

为推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享受我国应有的权益，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前身为世界关贸总协定 GATT）是客观的必需，但实现之路颇为漫长。

从 1986 年 7 月 10 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钱嘉东照会 GATT 总干事邓克尔，正式要求恢复中国在 GATT 的缔约国地位，直至 2001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86 年 7 月到 1989 年 5 月，为申请、答疑和综合评估阶段。第二个阶段从 1989 年 6 月到 1992 年 1 月，为谈判停滞阶段。第三个阶段从 1992 年 2 月到 1994 年 12 月，为谈判重新启动和攻坚阶段。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尔反尔，要价越来越高，进行无理阻挠，致使在 1994 年 12 月 17 日至 21 日的第 19 轮谈判中，中国与其他缔约方未能就中国成为 WTO 创始成员国问题达成协议。第四个阶段从 1995 年 1 月到 2001 年 11 月之前，为“入世”谈判阶段。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美欧等主要缔约方进行了长达 15 年的艰苦谈判。2001 年 11 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揽子法律文件，从当年 12 月 11 日起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加入 WTO，将会对近远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是中国对外经贸在 21 世纪实现快

速、持续发展的一次重要机遇。从机遇角度和积极的方面看，通过加入 WTO，中国可面临如下机遇：第一，中国加入 WTO，有利于协调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扩大出口。可依照世贸组织有关法规和程序，维护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当权益。第二，中国加入 WTO，有利于改善和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第三，中国加入 WTO，还有利于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最后，中国加入 WTO，有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介入范围。不仅可以在政治上和国际事务方面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可以通过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中发挥作用、施加影响，来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及时调整和制定中国对外贸易战略。避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被歧视和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同时，加入世贸组织还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在全国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将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产品素质，提高企业竞争力。

加入 WTO 虽然能给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带来诸多好处，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入世”犹如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因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履行 WTO 的一系列义务。根据中国与 WTO 有关缔约国的谈判结果，中国在“入世”后应承担的 WTO 义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大幅度地削减进口关税；二是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如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外汇管理等；三是增加外贸政策透明度，如取消各种内部规定，公布外贸政策、法规等；四是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五是扩

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六是放宽对引进外资的限制,等等。承担这些义务,将不可避免地给我国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并在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走出去"的问题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第二,"走出去"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第三,"走出去"可以带动出口。第四,"走出去"更能贴近市场。第五,"走出去"能够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加入WTO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国经受住了入世后的冲击和挑战,较好地发挥了入世的积极作用,推进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200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851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4384亿美元,进口额4128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对外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172亿美元,都比上年有很大增长。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2月26日),见《人民日报》第6版,2003年2月27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200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出席广东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之后，21日至25日在广州围绕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两个题目进行调研。在考察期间，江泽民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①] 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党建工作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②]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高度精练的语言，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

---

①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强调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带领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见《人民日报》第1版，2000年2月26日。

② 《深入基层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党的建设》，见《人民日报》第1版，2000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新境界。对进一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进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历史使命，即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并向更伟大的目标前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十二章

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21 世纪头 20 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随后又召开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了政府换届。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勇前进。

中共十六大吹响奋进的号角

200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代表 2132 名，代表 6400 多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查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纪律委员会。

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告共分十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二、全面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四、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五、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六、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七、国防和军队建设；八、“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报告围绕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经过认真审议和讨论，报告得到大会赞同和批准。

11 月 14 日，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共选举中共中央委员 198 名，候补中央委员 158 名。其中，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 180 名，占一半以上。委员平均年龄 55.4 岁，50 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98.6%。在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上又前进了一步。另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21 名。

11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会议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原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七名常委中，只有胡锦涛一人留任。江泽民不再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仍保留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副主席为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吴官正。

十六大有如下重大意义：一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三是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四是确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强

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五是实现了新老交替，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特别是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小康是一个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内涵又十分丰富的概念。十六大提出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十分准确的概括，排序也很科学、合理。小康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按照惯例，2003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到会全国人大代表共 2983 名。这次大会的议程很多；包括：一、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查、批准 200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听取和审议财政部的报告，批准 2002 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03 年中央预算；四、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五、听取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六、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七、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八、审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九、审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草案）》；十、选举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十一、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十二、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十三、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十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十五、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十六、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七、决定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人选等。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央政府的换届，特别是选举新的国家主席和任命新的国务院总理。

在为期 13 天半的会议期间，2900 多名代表肩负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有益经验，作出了当年以及今后五年的工作部署。大会依法选举和决定任命了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会议选举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曾庆红为副主席；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胡锦涛等为副主席。选举吴邦国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兆国、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维族）、何鲁丽（女）、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女）、热地（藏族）、盛华仁、路甬祥、乌云其木格（女、蒙族）、韩启德、傅铁山为副委员长，盛华仁为秘书长。159 人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还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根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提名，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温家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根据新当选的总理温家宝的提名，会议决定黄菊、吴仪（女）、曾培炎、回良玉（回族）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永康、曹刚川、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女）为国务委

员。决定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肖扬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贾春旺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样，被称为“胡温体制”的新一届国家机构正式开始运作。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步阶段和开局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依法按时换届，体现了国家在法制建设轨道上前进的坚实步伐，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求真务实，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国际国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抗击“非典”的胜利

2003年春天，中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一种人类从未经历的新疾病“非典”(SARS)，出现在中国及邻近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内蒙古、天津等地成为重灾区，香港和台湾也包括在疫区之内。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果断地纠正了某些部门和官员的瞒报现象，研究和部署防治“非典”工作。及时发出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①] 的号召，确定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措施。4月2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工作，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会议。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出现在“非典”重灾区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表示全党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信心。回

①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见《人民日报》第1版，2003年4月30日。

到北京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各级党政机关不得瞒报、缓报疫情。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撤销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被任命兼任卫生部长。同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大学考察，强调“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并与北大学生共进午餐。这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管理，如实公布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群防群控。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成立防治“非典”指挥部，统一调度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确保预防、救治工作紧张有序进行。组织科研攻关，在诊断、治疗、防疫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对农民“非典”患者实行免费治疗等措施，严防疫情向农村扩散。

在抗击“非典”斗争的艰难时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钟南山、姜素椿等医务工作者挺身而出，为防治“非典”作出了突出贡献，邓练贤、叶欣等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抗击“非典”的战斗对中国的卫生医疗系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场无硝烟战争的胜利不仅锻炼了医疗队伍，促进了全国防疫系统的建设，健全了疫情报告制度，也对改革广大群众的不良卫生习惯起到了很大作用。

确立科学发展观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家喻户晓的邓小平名言。但如何发

展，什么才是最正确和最好的发展，则理解并不一致。建国五十多年的实践中也有不少经验教训。而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有关键性指导意义的大问题，也是当前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2003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①]；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在人的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总思路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思维，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只有认真地坚决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03 年 10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见《人民日报》第 1 版，2003 年 10 月 15 日。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持续发展。

向大目标迈出重要步伐

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要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自1997年到2003年，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4%左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380多元。而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2002年与1997年相比，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00元左右。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减少，必然影响到农民尤其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2年，粮食播种面积仅14.9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2亿亩。[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直接制约着农村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内需的启动，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限制。现实表明，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改善、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还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在2002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鲜明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也就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号文件9大部分22条内容，具体政策达37条之多，触及到很多深层问题，其中不乏创举和突破。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实施，较大地

① 韩冰洁：《中央一号文件的回归》，见《新华月报》第94页，2004年第3期。

促进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新一届中央，继续坚持立足国内的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宏观调控，努力扩大内需。调控政策着重注意六个方面。一是调整国债资金投向，推动结构调整，加强公共投资，促进协调发展。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基础教育及其他公共部门设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工程和环境保护建设，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建设。二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经济与就业协调增长。三是保持粮食长期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禁滥征滥占耕地；继续稳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尽可能地多吸收农民参加工程建设；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四是加快产业调整升级，扩大新兴产业对经济和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采取综合措施，遏制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五是加快推进公益和垄断部门的改革。六是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提高出口竞争力，优化进口结构。这样，就为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经济的发展同政治的保证是分不开的。为了创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十六大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署，积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从严治党方针、人才强国战略，继续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

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解决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起草《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广泛征求并充分吸收了专家学者、实际部门的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04 年 3 月 22 日由国务院印发执行。《纲要》是贯彻落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

事。同时，也充分表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认真贯彻《纲要》，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依法行政进程。

2002年以来，国务院对其所属66个部门所有的审批项目共有3600多项进行了清理。国务院分三批，一共取消了1795项审批项目。[①] 这表明国务院正在认真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工作规则》，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胡锦涛总书记2002年底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概括了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这个总体部署包括一个总目标、一个总方针、一个总要求和六项主要任务。总目标是：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的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方针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总要求是：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

① 《审批改革考验政府》，央视国际一央视论坛，2004年7月6日。

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六项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只有搞好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党内监督和纪律处分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将对从根本上提高党内监督工作水平、加强党的纪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到很大作用。

为坚决贯彻实施两个《条例》，中央政治局分别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向全体会议报告工作，中纪委常委会向中纪委二次全会报告工作，中央成立了巡视组开始对省部级领导班子进行巡视，中纪委开始对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中组部设立了 12380 举报热线，中央办公厅加强了督察工作等。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中，加大惩治力度，中共十六大以后，处理了有问题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20 多人、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 400 多人、县处级领导干部 6000 多人。两个《条例》的贯彻实施，让人民增强了信心。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中国的伟大复兴关键要靠各方面的人才。2001 年 3 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

准的国家“十五”计划纲要首次列专章提出了“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的任务，突出强调了人才工作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作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2002年，中央下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和《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标志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确立“四个尊重”的重大方针。大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赋予人才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2003年5月22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人才工作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强调，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要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人才市场、两种人才资源，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重点培养一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的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努力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颁布了这份文件。这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第一次专门就加强人才工作作出决定。《决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的人才观，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才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才工作的行动纲领。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大环境。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中国继续完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提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为：一是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二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三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中国政府沉着应对，开拓进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中国政府在反对恐怖主义、霸权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方面的积极态度，在联合国安理会、在朝核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表明中国政府的外交思路更趋广阔、更加灵活、更加务实。

简要的回顾与前瞻

“创业艰难百战多。”

这是陈毅元帅在著名的七律《梅岭三章》中写下的含义颇深的诗句。这里讲的“创业”，是指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样的伟大创业，需要经历百战和诸多艰难，付出生命和鲜血的高昂代价，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今天，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十五周年。五十多年对于每个人生的经历是个不短的时间了，但从历史的尺度衡量，特别是从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社会的宏伟目标来衡量，不过是暂短的一瞬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一百年，以后的路更长，按照党的十五大文件的估计，“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因此，从这个宏伟事业的大视角看，认为新中国虽已五十五年仍属于“创业”阶段，恐怕不为过吧。这个“创业”同上个“创业”，虽然内容和形式都有质的不同，但同属“创业”阶段，同样要历尽艰辛，经历“百战”，也可以算是一种共性吧！这两次创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创业，而且整整花费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时间。

回顾世纪之初的1900年，八国强盗闯进北京，烧杀抢掠，哀鸿遍野，中国遭到列强的肆意凌辱，处境是何等的凄惨。而今，中国以蓬勃发展的势头和全球举足轻重的地位居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比何等鲜明！中国经历百年奋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题为《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回眸》的文章中认为"五十年前，中国的情况与1700年没有多大差别。"而自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了七倍。"① 而发生这样巨大的历史性变化的转换枢纽，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数十年浴血奋战的最大胜利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②

回顾新中国半个世纪的历程，虽然并非事事尽如人意，但从总体上看，应该肯定是方向正确，成就辉煌。这是举世公认的不争的事实。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个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日益现代化的人民武装力量，结束了近代中国长期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基本上（除台湾外）实现了疆域行政的大统一。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实现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成为世界

---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7月18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9页。

上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其次，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小生产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占全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距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尚有相当遥远的行程，但其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意义是绝不可以低估的。

第三，经济的发展十分巨大，成就显著辉煌。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破败不堪的经济基础上，已经建立起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7万多亿人民币。按国家综合实力评估已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1400多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二位。不少重要工业产品总产量如钢、煤炭、布匹、谷物、棉花、水泥、电视机、发电量、化肥等已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不仅摆脱了数亿人糠菜半年粮的窘境，而且正在为实现小康而奋斗。多年困扰着人们的凭票供应日用必需品的短缺经济已一去不复返，丰富多彩的商品供应局面已经形成。在短短五十年里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有巨大发展。全民族的文化水准有显著提高，各类在校学生总量已达3.1亿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8%，文盲已大大减少正在逐步消灭。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举世公认的成就，有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多项体育竞技中获得世界级金牌和奖杯，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亚洲体育强国。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0多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五，外交方面成就辉煌。战胜了国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

立、封锁、干涉和挑衅。中国成功地恢复了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朋友越来越多，国际交往频繁，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六，特别重要的是，经过艰难探索和曲折的历程，已经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为中国解决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树立起一个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范例；而且把人们长期探索的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为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谱写了光彩的新篇章。

如果说前五点成就都是看得见的确确实实的伟大成就，而且是在继续不断提高和增强的伟大成就的话，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道路的理论贡献，虽然不那么形象、具体，但同样是确确实实的。它不仅广泛地深入人心，而且是更根本的长远起作用的重大因素。邓小平理论和继承发展了它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全党全民的普遍武装，成为不断地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讲到我国五十年成就的时候，以周边同我国条件相似或可比性较强的国家，作一点比较也许是需要的。因为有比较才能分出高下。那么，最适宜于比较的国家，可能是印度。其实印度也一直在同中国相比。下边是印度《金融快报》1998年8月13日社论中的一段话：“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是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如此。我们必须以那个国家为基准。到目前为止，中国已成为明显的赢家。在政治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已远远超过我们。在经济上也是如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我们的

三倍，发展速度比我们快，中国已使人口停止增长。虽然中国的铁饭碗最近几年出现了裂缝，但中国的贫困率低于印度。在社会发展的指标方面，如预期寿命或婴儿死亡率或识字率，中国的得分超过了我们。显然，我们可以从中国学习的地方很多。”[①] 英国的《观察家报》也持相似的观点。它说：“民主制度并不能作为衡量人权进步的唯一标准。印度在经济发展、贫困、平等、教育与卫生等方面的表现要比中国差远了。”[②]

新中国半个世纪多方面的巨大成就，多如繁星，举不胜举。上述六个方面，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代表着新中国发展的主流，保证着新中国继续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也是我们在欢庆建国五十五周年之际，必须充分肯定，足够估计，方能满怀豪情地充满信心地继续前进。

不过，任何历史进程总是复杂的曲折的，一帆风顺，只有成就没有错误、只有坦途没有崎岖、只有笔直没有曲折的历史进程，古今中外都是不存在的。新中国的五十多年，是处于人类新社会的创业期，曲折和失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因此，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既需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深刻分析缺欠，总结经验，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泱泱大国，处于创业阶段，又是走在全球性的人类理想社会探索的前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方方面面的缺点错误，是不难列举出长长一串的。但就其思想根源或主观动机方面考察，却常常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带有普遍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革命作用的夸大，对革命名义的迷恋，甚至可以称之为革命崇拜症。他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8月20日。

② 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11月2日。

们认为不论什么问题，何种困难，只要宣布它是革命任务，“以革命的名义”，动员亿万群众，那么不管客观实际条件如何，都可以迅速的迎刃而解。

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吗？只要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好了，亿万群众就会意气风发，大搞群众运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很快“超英赶美”。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大目标很遥远吗？只要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公有制成分越大越纯越好，资本主义让它“断子绝孙”。有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像架起一道金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本来是一项合理的但必须做长期艰巨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可是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狂热的红卫兵们，却以为“杀向社会”，用打人、抄家、焚书、改街名店号，砸寺庙，破坏文化古迹等粗暴野蛮的手段，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如此等等。不少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幼稚荒唐、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被不少人真心实意地崇奉为“革命行动”，而且笃信不疑、身体力行。

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名言：“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么他

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① 引文似乎长了一些，但它是那么深刻、透彻、一针见血，而且仿佛就是特别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总结的，实在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认真领会。再三咀嚼，充分吸收，牢记不忘。

当今，我们欢庆建国五十五周年之日，也是21世纪来临之初。新世纪对于中国，既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巨大差距，国际上某些敌对势力的活动，客观上形成对中国的沉重压力。而中国自身又存在着种种矛盾和问题，如经济结构不适应，国企改革成效不大，金融风险日益增大，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环境污染严重，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有日益加剧之势。这些都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头脑，绝对不可以盲目乐观。不过，总观全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仍然是主要的。第一，国际环境有利。虽然全球热战不断，但都是小局部的。从全局而言，和平和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仍在发展，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全球性科学技术继续突飞猛进、高速发展，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国内条件有利。建国五十多年的奋斗已经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了相当良好的环境，开辟了日益广阔的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资金和技术来源，有利于调动和发挥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年形成的可观的综合国力为我们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舞台。

第三，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明文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又增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所遵循。更加团结一心，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展望新世纪，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后　记

写书的人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的书有人看。看的人越多，就越能发挥书的社会效益，也说明自己为写书而付出的艰辛劳动得到了承认。因此，当这本书的出版单位中共党史出版社冯世平同志告诉我，准备把本书增订再版时，我是十分高兴的。七月初接到冯世平同志的电话，九月初就要交稿，满打满算不过两个月。而我与席宣同志合写的另一本书《“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修订再版工作正在进行，还需一些时间才能定稿。在这期间还有两次纪念邓小平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已承诺是必须参加的。何况我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又正逢酷暑，怎样才能如期完成本书的修订工作呢？这就使我既高兴，又紧张。看来只好求援了。幸亏我的学生，中央党校教授陈述博士，慷慨承诺代写增加的从建国五十周年到第十届人大的两章（即第四十一章和第四十二章）的初稿，这才使我不致顾此失彼。而立秋后，北京的桑拿天渐消，似乎老天也在为我帮忙。就在这样天地人和的好环境里，本书的修订工作终于如期完成。这里向陈述和冯世平两同志，还有为本书再版作贡献的有关同志，再次表示感谢。

金春明

2004年8月30日于

北京海淀区大有北里寓所

责任编辑：李亚平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闫　军
装帧设计：董奇娟

ISBN 7-80136-511-9



ISBN 7-80136-511-9/K·441
定价：28.00 元